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林有能(兼)	
编务主任	
黄荣显	

•学苑聚焦•

历史与现实的交融

——“鸦片战争与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 张 磊 5

•豪情迎九七 大笔写回归•

“一国两制”的基本特点和历史意义 吴奕新 7

香港回归后加强粤港澳产业合作的思考

..... 廖建祥 12

论粤港合作发展高科技产业..... 何佳声 15

爱国情怀与天朝观念

——试析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岭南知识界的文化

心态与社会舆论 赵春晨 19

50年代以来的香港小说创作 何 慧 24

香港学校公民教育的发展与前瞻

..... 石颢平 张倩苇 28

•邓小平理论研究•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与实践唯物主义

——论实践对于辩证法的首要地位 吴启文 32

坚持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 田 丰 3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双重贡献

..... 王振海 44

ACADEMIC RESEARCH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83815300—246

83846307、83846177

邮政编码:510050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排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M268 北京 399 信箱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经济•

论合作型企业员工关系的处理模式…… 刘 昕 48

对伪劣商品市场不合作博弈的解释及对策
…… 李新春 52

论中国外贸宏观结构长期趋势与发展战略选择
…… 谢 康 56

•历史•

纳粹德国为何对美国宣战…… 蒋相泽 61

从李之芳《赋役详稿》看清代赋税征课额的构成
…… 何 平 66

•文学·语言•

社会语用问题…… 何自然 71

论李商隐诗化情境的生成方式…… 熊国华 76

•书评•

流域:验证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区间
——延自《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的一段思想
…… 郑英隆 80

一部大长志气的好书
——读《广东通史》古代上册 …… 姜伯勤 83

老树经霜志不摧
——读《卢叔度集》 …… 吴国钦 86

-
- History and Reality in an Inherent Blend – – – A Review on ‘The Symposium on the Opium War(1840 – 1842) and Hong Kong’ Zhang Lei(5)
- ‘Two Social System in One Country’: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Wu Yixin(7)
- A Meditation upon th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fter the Return of Hong Kong’s Sovereign to China Liao Jianxiang(12)
-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Macao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es of High Technology and Science He Jiasheng(15)
- About the Cultural Manner and Social Opin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between the Two Opium Wars Zhao Chunchen(19)
- On the Story Creation in Hong Kong Since 1950s He Hui(24)
-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the Citizen Education in Hong Kong’s Schools Shi Xieping and Zhang Qianwei(28)
- Mr. Deng Xiaopi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Practical Materialism Wu Qiwen(32)
- The Unity of the Views of History and Value, in which Deng Xiaoping Persisted Tian Feng(39)
- Mr. Deng Xiaoping’s Twofold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Theory Wang Zhenhai(45)
- Treatment Models of the Relation among the Staff of a Cooperative – type Enterprise Liu Xin(49)
- An Explanation of and Countermeasures to the Uncooperative Games in the Forge – and – bad Commodity Market Li Xinchun(53)
- A Macro – structural Long – term Tendency of Chinese Foreign Trade and the Choice of Its Developmental Strategy Xie Kang(57)
- Why the Nazi Germany Proclaimed a War to the United States Jiang Xiangze(62)
- A Look in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x Amount in the Qing Dynasty(1616 – 1911) through Li Zhifang’s ‘The Detials of Tax’(《赋役详稿》) He Ping(67)
- Remarks on Societal Pragmatics He Ziran(72)
- On the Generative Ways of Poetry Feelings and Situations in Li Shangyin’s(813? – 858) Creation Xiong Guohua(77)
- A Conception Induced fro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Area’ Zheng Yinglong(81)
- A Proudable Good Book for Us: ‘A General History of Guangdong’(the 1st Vol. of the Acient Part) Jiang Boqin(84)
- As An Old Tree Standing Up after Frost – – – my impression of ‘A Collection of Mr. Lu Shudu’ Wu Guoqin(87)

历史与现实的交融

——“鸦片战争与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张 磊

由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政府承办的“鸦片战争与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5月30日至6月3日在深圳市宝安区举行。出席这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约120余位，包括祖国内地的一些省、市、自治区和台湾、香港、澳门的代表，日本、葡萄牙和加拿大的同行们也应邀参加了会议。研讨会收到了60余篇论文(提纲)，文章以及发言主要围绕着研讨会的主题——鸦片战争与香港展开。既有宏观的考察和综述，又有微观的个案的研究。所有这些，都将深化和拓展鸦片战争与香港的研究。

正值“七·一”即将到来的时刻，在毗邻香港的深圳市宝安区举行的这次研讨会，无疑兼具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特殊的现实意义。

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成为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课题之一。

许多论文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性质和特点。认为英国发动的这场战争，完全是为了扩大肮脏的鸦片贸易和殖民掠夺。“发财原则”是自诩文明的大英帝国的真正驱动力，它的卑劣凶残的行径显示了“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虚伪”和“野蛮本性”。对于被侵略的中国来说，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林则徐和广大爱国军民的禁烟抗英斗争，揭开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从这种无可辩驳的史实和论断出发，不少专家学者批评了一些有悖于实际观念。例如，詹姆斯·普拉契克在《内部的鸦片战争》一书中所表述的偏见：把战争的

原因归结为中国内部权力斗争，诬称林则徐的正义行为的动机是企图得到两江总督的职位。铁的事实是，战争的挑起决非中国方面所导致，正是侵略者使中国人民蒙受了灾难、毒祸、不平等条约和割地赔款，套上了殖民主义枷锁，成为被掠夺压榨的对象。

对于战争过程和有关问题的研究，占提交论文的相当篇幅，从国防经济的视角考察和评述，显然颇具新意。论者指出中英双方国防经济的差异，决定了英国国防政策的掠夺性、军事战略的主动性和最终取胜；同时，也决定了清朝政府国防政策的保守性、军事战略的被动性和最终失败，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条严酷的规律。其它有关问题——如清朝战船管理制度、英国强迫中国割让居留地的选择等等——也有助于更为深切地理解这场战争的本质和结局。

很多论文和发言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了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确认这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正气的表现。作为全国人民抗英斗争的前哨，广州和广东人民的反暴行、反租地和反入城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迫使侵略者有所收敛自己的魔爪，不得不在谩骂中承认“任何数量的武装登陆，都不足以抵抗已被激怒的广州市暴徒”。历史证明，包括爱国官兵在内的人民群众的斗争，是中国未被瓜分的主要原因。媚外卖国的民族败类，则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少论者还指出：历史研究当然不宜从属于政治，但研究者的思想、感情和所研究的社会历史则离不开政治。人民的、民族的立场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是一致和统一的。我们珍重

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决不能听任凝聚烈士鲜血的如斯代价被磨灭。

关于鸦片战争、香港和与之有关的历史人物，构成不少论文和发言的内容。对道光皇帝、林则徐、洪仁玕、王韬、耆英、郭嵩焘以及岭南知识群体的文化心态和作为的深入探索、评述，也颇有裨益于进一步了解这场巨大历史变革的内涵和意义。

二

关于鸦片战争后的香港——特别是当前香港的有关问题和回归，成为论文和发言中的另一主要课题。

不少文章研究了英国占领香港后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历史变迁、香港开埠初期的教育和报业、苦力贸易、香港及其邻近地区的海洋农耕文化以及香港与中国近代改革思潮的关系、在此期间的有关国际和国内形势的问题等等，对了解历史的、现实的香港大有裨益。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香港研究及有关资料问题作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述评，提出了重视挖掘香港、深圳人文历史资源的建议。

许多文章的焦点，集中在香港回归问题。不少论者在回溯旧中国各类当政者收复香港的活动后，着重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回归祖国的路标，即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到“一国两制”的构想，指出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保留香港作为“国际通道”的地位，无疑是符合当时国际、国内实际的正确决策，因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然，“暂不收回香港”决不是永远不收回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表示不承认旧中国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同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60 年代，毛泽东曾经申明：我们不动它——香港，并不是永远不动它。70 年代，他更具体指出：“香港在 1997 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中国政府，十分成

功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明确地向英国表明，主权（包括治权）“没有回旋余地”，1997 年，中国一定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解决香港回归的方案，就是“一国两制”的构想。即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50 年不变。对于这个创造性的科学的方案，撒切尔夫夫人也不得不承认是前所未有的天才构想。

不少专家学者认为，香港的回归是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经历了从 1840 年至 1949 年间的百余年的抗争，中国始终未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爱国主义高扬，却未能结出硕果。而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胜利，才为香港回归提供了基本前提。在以后的 40 余年——特别是近 20 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绩，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强国；“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则找到了解决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此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这样，香港回归的条件趋于成熟。事实证明，爱国主义只有和当代先进思潮和运动结合才能结出硕果，才能解决救亡和发展祖国的课题，完成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

今天，香港回归在即。我们在欢欣、鼓舞、振奋的同时，正如许多学者所提出的应当而且必须深化对香港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研究。如何保持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稳定，更好地发挥它的独特的作用，已经成为这次研讨会中多篇文章的内容。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自满，我们一定要深化与拓展研究工作，为祖国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让我们以饱满的激情、深刻的思考和优异的成绩，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日子吧！

作者张磊，广东省社科联主席、社科院院长（510050）

责任编辑：林有能

“一国两制”的基本特点和历史意义

□吴奕新

历史给社会主义中国留下了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和平解决港、澳、台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是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考察“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提出及其形成过程，到“一国两制”成为我国政府的基本国策，学习“一国两制”的科学涵义和基本内容，本文认为，“一国两制”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且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及其形成过程

古今中外，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方式方法，只有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两种，如果用非和平的方式方法，即用武力统一，必然会产生很大的社会震荡，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对有关各方面都不利。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等问题，邓小平创造性地继承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提出了用“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从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到“一国两制”构想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以及之后邓小平对香港问题的一系列讲话，都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

1、“一国两制”构想的积极探索。在新中国

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为解决台湾、香港问题作出过一些设想和探索，但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路线的确立，才使“一国两制”构想得以产生。而且，“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继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任务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79年1月1日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地宣告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指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将“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受损失”。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在向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解释我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时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可以说，这里头已蕴含了“一国两制”的初步构想，这也是我国领导人最早公开表示可以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台湾问题。

2、“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九条方针，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这九条方针已经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正如后来邓小平所指出：它“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2页）同年年底召开的第五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增加了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规定，为实现“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法律根据。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对“一国两制”的内容做了进一步阐述，他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页）至此，“一国两制”构想已经基本形成，载入我国宪法并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

3、“一国两制”构想由理论到实践。从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经过严肃、认真、慎重的谈判，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之后，邓小平多次就“一国两制”发表重要谈话，使“一国两制”构想系统化和理论化。在香港问题成功解决之后，中葡两国政府从1986年6月30日开始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并于1987年4月13日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这样，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都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获得圆满解决。“一国两制”从构想变成理论又从理论进入实践，并充分地显示用“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完全行得通的。可以预见，从1997年7月1日开始，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一国两制”的构想将进入实施阶段，它的科学性、可行性与成功性将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4、“一国两制”的科学涵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国家根据自己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本国的部分地区实行不同于其他大部分地区（国家主体部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但这些地区的政府是这个统一主权国家的地方行政单位或地方性政府，不能行使国家主权。具体地说，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的“一国

两制”的特定涵义就是，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提前下，大陆12亿人口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600多万人口、澳门40多万人口、台2000多万人口地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正如邓小平所明确指出的：“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8页）邓小平进一步指出：“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国两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找不到，在中外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它是邓小平创造性提出的一个全新的科学社会主义概念。

5、“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从“一国两制”的科学涵义来理解，它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一国两制”的提出和实施具有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依据和保证。在统一主权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部分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即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将在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稳定地实行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如果在实行不同政治、经济制度的地区，中央政府和港、澳、台的特别行政区政府之间发生某些矛盾和纷争，只要不损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就只能诉诸宪法和有关的法律，通过和平途径和法律程序来解决。

（2）“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统一国家内的不同地域实行不同的制度。它们之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乃至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明显的重大的区别。简言之，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个别地区如香港、澳门、台湾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不是这样，而只是在个别制度上的某些不同，或者只是

具体体制、政策上的某些差异，都不能视为“一国两制”。比如，中国大陆在经济制度上实行的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开办经济特区，开放若干港口、城市，吸收一些外国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等，都不是“一国两制”。

(3)“一国两制”是指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不同制度的地区，是这个统一国家的组成部分，不能行使国家主权，不能行使整个国家的外交、国防、宣战、媾和等权力，但它享有除国家主权等以外的诸多自治权利，并可以用统一国家的一个地区的名义，如“中国香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进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

二、“一国两制”的基本特点

根据“一国两制”的科学涵义和基本内容，可以看出，“一国两制”构想有其明显的基本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五点：

1、社会主义是主体。“一国两制”的最明显特点是“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这是指在实行“一国两制”后，不同社会制度地区行使的权力不是平行的，而是有主体、非主体之分。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主体，行使国家权力；香港、澳门和台湾三个特别行政区，行使地方政府的权力。邓小平在阐述这种关系时指出：“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9页）“‘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9页）强调在“一国两制”下，中国的主体部分实行社会主义十分重要。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才可以容许自己内部、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没有这个前提，资本主义就要吃掉社会主义，“一国两制”也就失去

了保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么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告吹的。要真正做到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8页）

2、四项基本原则是基础。“一国两制”的基础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邓小平有非常明确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略，哪一个党派都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7页）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强调“一国两制”的基础是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要求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也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要把大陆的社会主义强加给香港、澳门和台湾。而是说如果不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我们就不可能提出和实现“一国两制”这一科学构想。

3、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是核心。“一国两制”的核心是实现祖国统一。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邓小平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对此，邓小平明确回答：“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9—220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

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其核心就是实现祖国的统一。因此，对香港、澳门和台湾来说，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国”。所谓“一国”，就是要实现祖国统一，中国的主权必须收回，国家的主权不容分割，中华民族只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背离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立场，也就不存在“一国两制”了。

4、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一国两制”构想一提出，我们党和政府就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是基本国策。针对有些人总担心“一国两制”会变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采取这个方针“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概括地说，“一国两制”之所以是一个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是以下面三个事实为依据的：（1）“一国两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方针，是法律，而不是个人的主张。既然是通过法律形式确定的方针，那就不可能轻易变动。问题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对，就谁也变不了。（2）提出对香港的政策 50 年不变，是同中国需要 50—60 年才能实现现代化联系起来考虑的。港台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是有利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如果到下一个 50 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因此，“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 50 年不变，50 年之后还会不变。”（3）“一国两制”方针不变的根本保证，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只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就不会变。“一国两制”方针也就不会变。

5、解决国际争端的新途径。“一国两制”也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一条最佳出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国际范围内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和广泛。在这样的时代里，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局部范围内的重大事变往往影响到整个国际局势。因此，寻求最佳方案解决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或争端问题，就成为摆在

人类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就是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考虑到了一些重大国际争端的解决。对港、澳、台问题，中国政府作为主权国家，有权随时以任何方式收回自己的领土，但是，考虑到历史和现实，考虑到港、澳、台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我国政府采取了理智的和平谈判方式，妥善地解决了争端。正如美国《华盛顿邮报》所评论的那样：“中国本来可在一个下午收回香港，居住着中国人民的中国领土，任何英国部队都不可能获胜。然而，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安排有条不紊地收回香港的价值。”这表明，对于国家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要双方都能以理智和冷静的处理态度，双方都具有解决问题的求实精神，采取互相谅解与合作的态度，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是完全能够得到解决的。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具有十分深刻和丰富的涵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它的伟大意义和巨大作用，必将在更广阔的领域中显现出来。

三、“一国两制”的历史意义

十多年来，“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在香港问题的初步实践中，已经显示其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世界意义。

1、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强盛。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和政策指导下，香港、澳门的问题已获得圆满解决，港、澳人民将由此结束处身于殖民统治下二等公民的屈辱地位，享有作为强大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港、澳同胞将再也不会那种政治上孤悬海外的不安定感受。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团结统一，将极大地激发全民族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推动港、澳、台经济文化的继续发展和繁荣，这必将更有力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向前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强盛。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紧密相连，实行“一国两制”，双方在可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不仅可以促进港、澳、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可以保障以及促进港、澳、台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大陆方面可以通过港、澳、台地区更好地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有利于加速祖国的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

2、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对外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方针。我们对港、澳、台地区实行“一国两制”,允许在这些地区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我国发展对外经济的一个窗口。香港被誉为世界性经济中心之一,最开放的自由港,又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世界第三大黄金市场、第四大国际银团贷款筹集场所。而台湾自1949年以来同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同美、日、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发展了对外经济和贸易,并已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开放的、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地区之一。实施“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可以消除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疑虑,使它们在港、澳、台的经济交流能继续进行,这不仅有利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利于我国经济文化事业的对外发展。

3、实行“一国两制”对妥善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有深远的意义。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发展,国际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和广泛,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重大事变,往往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局势的平稳协调发展。因此,寻求最佳方案解决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我国通过同英国、葡萄牙多次的和平谈判,选择“一国两制”的方式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港、澳问题,这为和平解决世界争端提供了

新的经验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对此,国际舆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前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1984年就指出:“在紧张和对抗不幸地笼罩着世界许多地区的时候,对香港未来地位的谈判取得成功,将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有效的、静悄悄外交的一项极为突出的范例。”“一国两制”提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将促进世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各种政治以及各种性质、各种发展水平的经济之间的和平竞赛,从而促进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一国两制”的理论和经验表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地区、不同性质和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可以在一个国家内长期共存,和平共处,互相竞赛,共同发展。既然如此,那么按照“一国两制”的理论和经验来解决世界范围内的类似问题,必将促进世界各国之间、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不同性质的经济之间、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之间的和平竞赛。在整个世界处于和平的局面下,各个国家、各种政治力量都注意发展自己、加强自己;各种性质、各种发展水平的经济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整个世界就能够出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局面。至于将来世界上政治力量的状况如何,是否都能实现一种社会制度,而实现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否经济都能发展到同一样的水平,这将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各国的具体情况,由世界各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和选择来决定。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确信世界的进步和人民的进步,确信整个世界将走向光明的前途,也相信世界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

作者 吴奕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
(510082)

责任编辑:童 轩

香港回归后加强粤港澳产业合作的思考

一、粤港澳经济合作的新时期

97 香港回归,由于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粤港澳产业合作有如下特点:

1、从过去的民间和企业间主导合作转到以政府为主导的合作。香港过去在港英政府统治下,粤港澳产业合作主要由民间和企业之间进行,不可能在双方政府及其所属有经济管理部门之间进行有计划的合作。香港回归祖国后,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在“一国两制”原则下,产业合作将以政府为主导,结合民间和企业进行有计划的合作、协调和发展。

2、从局部性的分散合作转为全面性的整体合作。过去产业合作主要在加工业合作,以后逐步扩大到基础设施和第三产业,但总是分散性和局部性的合作;香港回归后,两地产业合作,将在政府主导下,对一、二、三次产业的合作,扩大规模和范围,向全面性、整体性合作发展。

3、产业界、科技界、政府经济部门的人员为产业合作的交流和协商将更频繁,在沟通信息和进行生产要素重组,实现资源配置合理化方面提供决策。

4、随着内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粤港澳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将加快,互相间的产权转让、兼并及资金、技术、劳务的交流将进一步发展。

5、面对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猖獗,粤港澳产业合作将组建现代跨国集团企业,在跨国经营和开拓国际市场上取得突破。

6、粤港澳产业合作,将促进港澳深(圳)珠(海)在内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并将大大增强经济区综合经济实力,在亚太

经济发展中崭露头角。

二、粤港澳产业合作的布局

从粤港澳经济的互补、互利、互惠、互促的原则出发,三者的比较优势相结合,围绕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统筹兼顾,合理制订产业合作的布局,是搞好粤港澳产业合作的定向措施。

1、新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是在粤港澳产业合作的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聚集到三次产业的主要部门,进行分工协作。粤港澳三方各有其不同特点和发展计划,这就要寻求产业结构调整的汇合点,进行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重组,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2、粤港澳第一产业的合作。由于地理条件、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是加强第一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加速发展第三产业,香港、澳门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是,加强发展第三产业,优化第二产业。港澳的第一产业微乎其微,香港虽有少量渔农生产,但长期都靠广东供应蔬菜和猪、牛、鱼、禽、蛋鲜活副食品。近年来广东着力发展高质、高产、高效的农业,也吸引了港澳不少投资。港澳的资金、技术、国外优良品种等引进与广东的土地、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资料结合,是优化第一产业资源配置的主要道路。97 香港回归后,第一产业的合作,主要是大力发展“三高”(高质、高产、高效)农业,发展反季节蔬菜、菇类、水果(沙田柚、糯米糍荔枝等)以及饲养菜牛、肉猪、乳鸽、鸵鸟、鹧鸪、三蛇和其它珍稀禽畜;水

产养殖龟鳖、蟹类、生蚝、鲍鱼、龙虾、对虾、瑶柱、海参、珍珠等。近年来广东省各市在香港举办“三高”农业招商洽谈会，引资合作项目取得较大的进展。今后第一产业合作除生产领域外，还可在珠江三角洲滨海地区围垦造田以及其他水利设施等方面进行合作。

3、粤港澳第二产业的合作。改革开放以来，由“三来一补”开始到“三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合作，形成“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促进了资金、技术、物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组合

优化，使制造业的资本循环 $G-W \begin{cases} A & \dots\dots \\ PM \end{cases}$

$W'—G'$ 顺利实现，第二产业的合作对合作的双方都取得效益。但是，第二产业在发展中越来越暴露它的缺陷，一是合作主要集中于纺织服装、家电、食品、塑料制品、玩具、钟表、箱包鞋帽等轻型行业，这些行业在全国沿海地区以至东南亚国家都有同构性，在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二是这些行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大都档次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小，缺乏名牌产品和拳头产品；三是技术开发能力差，产品的创新和升级换代少。这些都是粤港澳第二产业合作面临的严重问题。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规律和标志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在第二产业产值中占有显著的比重，在这方面，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产业结构调整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重化工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足为粤港澳第二产业合作的借鉴。广东省已有茂名 1000 多万吨炼油能力，30 万吨乙烯工程已经投产，广州市 15 万吨乙烯工程在建设中，石化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减少原材料进口，且将带动相关下游产业的发展。广东在“九五”计划和 2010 年发展目标中已突出发展重化工业钢铁、石化、机械、汽车摩托车、船舶等行业，将成为基础性、支柱性产业，这些都为粤港澳第二产业合作开辟了宽广的领域。

从以上粤港澳第二产业的合作，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上，将改变以“前店后厂”为主的垂直型分工合作模式为多元的分工合作模式（垂直分工、水平分工、混合分工并存）。（1）“前店

后厂”以轻型产品为主的加工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还有一定比较优势，今后主要是提高产品技术档次，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双密集型），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和提高附加值。目前广东省不少电子科技产品就是技术设备先进，同时又是劳动密集操作的产品。（2）重化工业主要是资金密集不够，需要较多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研究试验创新，港澳是筹措资金引进技术的重要渠道。（3）根据粤港制造业的具体条件，对电子、机械等工业的主部件、零配件的生产和组装，分别在广东境内和港澳进行，从过去来料加工装配的垂直型生产转为双向加工装配的水平型和混合型生产，这对于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都有好处。

4、粤港澳第三产业的合作。主要是金融、科技、信息、旅游、承包工程与房地产合作。

（1）金融合作。粤港澳金融合作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而逐步发展，在广东引进港澳资金发展加工贸易和“三资”企业的扩大，粤港澳金融机构提供各种金融服务，港澳和外国金融机构陆续到广东设立银行分支机构和财务公司，广东的金融机构也向港澳发展。广东目前需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引进港澳及外国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财务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扩大其经营范围，尽快给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构建以香港为龙头的粤港澳区域金融市场，形成香港、深圳、广州的金融网络，把外汇、证券、期货等交易联成一体，促进粤港澳经济一体化发展。

（2）科技合作。加强粤港澳技术合作，是推进粤港澳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关键。广州市有几十所高等院校和近 200 个科技机构，近 3 万自然科学的研究人员，科技研究取得较大成果。据国家科委最近公布的全国科技进步综合评价显示，广东科技综合实力名列全国第三，科技产出和高科技产业两者均排第一位，经济增长和效益提高两项指标均排第二位。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很早就把特区作为“技术的窗口”，经济特区和全省引进先进技术取得显著成效，这实际上是粤港澳产业合作中技术合作起了重大的作

用。但粤港澳技术合作目前层次较低,97后需要加强深层次的合作,广东现有天河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山火炬科技实验区以及星火计划、软科学研究计划等,都为粤港澳技术合作提供广阔的天地,粤港澳合作兴办科技企业,如微电子及电子医疗器械等,都有较好条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关联性大、效果明显的如机电一体化,其次如精细化工、新材料、生物工程、仪器仪表等,合作攻关研究、开发应用,也会取得大的成效。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创新结合,是技术合作的重要策略。

(3)信息合作。广东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已有较好的基础,在国际信息合作与交流方面进展较快,城乡电话交换机总容量已达1000多万门,全省邮电、经济、教育、科技大网络雏型已初步完成,金桥、金卡、金关、金企、金科、金税工程成绩喜人,广东电子工业产值连续6年居全国第一位。粤港澳信息合作,还要大力加强信息设施的功能,合资合作生产高质量的电子产品,合作研究和开发先进的电子信息产业和产品,加速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

(4)旅游合作。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旅游合作发展迅速,三地的旅游业在经济发展中均占重要位置,香港是国际旅游中心,旅游是香港支柱产业;澳门的产业结构中旅游业占有首要地位,而广东的国际旅游入境人数和旅游外汇收入都居全国榜首;三地的旅游企业旅行社、旅游团的对流旅游日益扩大,港澳到广东及内地旅游和广东及内地到港澳及星马泰等旅游人数越来越多,特别是粤港澳台同胞和华侨探亲、度假、商贸、文化交流等旅游活动频繁,旅游合作促进了粤港澳改进顾客服务、商品营销等,促进了对外政治、经济交往,改善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5)承包工程和房地产合作。粤港澳在承包工程和房地产合作方面有很大发展,香港、澳门从60、70年代经济增长的加快,城市建设公

用设施和房地产业迅猛发展,房地产业已成为香港经济的“晴雨表”。广东和内地的建筑工程公司在80年代也向港澳发展,承包不少大型工程,广东省随着经济特区和广州市及珠江三角洲的崛起,公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不断发展,港澳投资房地产的大大增加,粤港澳承包工程和房地产合作促进了城市建筑设计施工和装修水平的显著提高,培养了一批国际先进水平的建筑人才,今后要进一步向前发展。

三、粤港澳产业合作前景展望

97后加强粤港澳产业合作,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大大增强它们的综合经济实力,从而进一步促进南中国海粤、港、澳、台、闽、琼、桂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在亚太经济合作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但由于受到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粤港澳产业合作发展的前景将沿着波浪式前进的轨道运行。

1、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粤港澳产业合作的发展将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港澳的经济国际化水平高,特别是香港的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特别深刻,这就会对粤港澳产业合作带来连锁反应

2、粤港澳经济发展有各自的规划和打算,有不同的对外经济关系,在加强产业合作的主流下,也会在某些产业发展上存在利益矛盾和竞争,这就可能影响某个部门产业合作的推进。

3、经济体制的不同,将不同程度地影响产业合作的发展。广东的政府主导型的体制与港澳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全面接轨,产业合作会受到一定阻碍。

作者廖建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510620)

责任编辑:谭湛明

如何抓住“九七”回归这一历史机遇,推进粤港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科技界、工商界和政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80年代人们普遍把粤港合作概括为:“唇齿相依的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由于这种合作模式层次低、技术含量不高,小企业居多,大量为香港产业转型中把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从80年代末开始,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粤港两地的经济合作应从过去“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提高为“结构性、整体性”的合作模式。其基础和核心是制造业,要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本文试从这一角度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

一、粤港合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潜力和前景

1、广东经济持续发展应走“跳跃式”的发展路子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广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装备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粤港经济一体化已显出雏型,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益、粗放型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轻型加工业的路子。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原有特殊

政策逐步淡化,加之广东自身产业结构的失衡,已显示出再走这一条粗放型的增长的路子,难以为继。从1994年开始,就广东如何增创新优势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的学者囿于仿照“四小龙”中韩国、台湾省和新加坡的发展经验,认为从轻型化向重型化发展是发达的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必由之路。如韩国,1970年轻重工业的比重为31.2:42.6;1981年为26.1:46.6;1983年为24.8:52.8;台湾省1975年为51.8:48.2;1989年为45.7:54.3。因此,广东也必须走重型化这条路子。然而,实践说明,广东的制造业结构,要从轻型化向重型化发展,似乎步履维艰。这是因为广东发展重型化工业,受资源的严重约束,且在全国来说,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单元,没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要发挥广东消费品轻工业优势和外向型经济特色,似应在轻型工业结构基础上,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走发展内涵的路子,是最佳的选择。

由此说明,在当代世界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只有落后的技术,没有落后的产业和产品。而“21世纪持续不衰的竞争优势主要是来自新的加工技术,因此,转换工程技术已成为一种艺术形式”。这事实也说明,广东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必走从劳动密集型轻型加工业——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的传统老路,而应有发展的超越思路,直接从劳动密集型跨入技术密集型的发展路子,把电子信息产业、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工程、海洋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战略发展的重点。并以高新技术改造、渗透传统的轻型产业,走高、新、精、轻的、具有广东特色

论粤港合作发展高科技产业

□何佳声

的产业发展路子。

2、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先行实践

深圳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有效地发挥其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率先承接香港以劳动密集型的、“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制造业的转移,在短短的几年内打破以往单一农业结构,建成了以电子工业为主的、以轻纺工业、食品饮料、机械建材、化工医药为重点传统产业的外向型工业体系,到1990年,三次产业的比重为4.8:49.6:45.6,完成了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到工业化、现代化的根本变革,赢得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但随着深圳经济发展、土地价格和工资的飚升,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低增值的工业结构,难以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赢得“深圳效益”。深圳人在实践中认识到,在当代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谁掌握了新技术、集聚着高科技人才,谁就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进入90年代以后,深圳市政府制定科教兴市的发展战略:提出以高新技术为先导、以先进工业为基础、以第三产业为支柱,实行跨越式的发展思路,致力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以实现“二次创业”,再创“深圳的速度和高效益”。

从近几年深圳特区的资料显示,截至1996年深圳市工业总产值为1062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实现的产值为3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8.24%,占全市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540.5亿元的55.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10多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的产销率为97.4%,出口额占产品销售额的67.9%。全市278家企业共开发、生产高新技术产品498种,14种名牌产品的产值增长16%。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分布在电子、计算机、通讯、生物工程等新产业,并用先进的技术改造了化工、建材、纺织制衣、轻工、玩具等传统产业。其具体表现如下:

(1)机电一体化初露头角。其起步虽晚,但起点高,初步显出既有规模,又有发展潜力的、有自动化办公设备、数显仪表、电子医疗仪器、

微电机、数控机床、模具及其加工设备。全国机电产品出口创汇在1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有39家,其中有13家在深圳,全国有13家机电产品出口创汇在2亿美元的企业,其中有5家是深圳企业,1996年深圳机电产品的出口占全国半壁江山。希捷公司出口创汇5.16亿美元,居全国同类企业的第二位,其产品如磁共振成像系统和彩色多谱勒血流成像系统,填补了国内空白。伽玛刀为国际领先的大型医疗设备,前几年只有瑞士能生产,现在全世界能生产此产品也为数不多,而深圳年生产能力为20台;数字仪已形成规模化生产,产量占全国的80%。机电一体化,正从模拟量向数字量化、音像化、智能化、多功能化和系统化发展,规划在未来15年内把深圳建成我国在南方的机电仪工业的生产基地、新产品开发基地和出口基地。

(2)微电子产业高速发展,并形成产业的配套体系。1996年深圳市微电子及元器件产业占电子行业的24%,初步形成了微电子和元器件配套生产体系,包括集成电路、磁头、硬盘驱动器、液晶显示器、晶体管、光电元器件、敏感元件、片状元器件等。1997年将年产4亿只半导体集成电路器件,2000年前年生产量达20亿只的生产能力。深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基地之一。

(3)通信产业崭露风采,实现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生产。深圳的通信产业已形成了一支咄咄逼人的新军。1996年全市程控交换机的产量达到470万线,约占全国的30%。电话机的产量占全国的1/3。一批初具规模、生机勃勃的企业正在崛起。如华为公司的C&CO8程控交换机已成为全国名牌产品;泰丰电话机的产量列全国第三位;光通公司的光纤、光缆年生产能力分别达5万公里和6000公里,名列全国前茅。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有华为、中兴新、信诺、泰丰等十多家,1996年全市通信产业的产值达56.3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5.2%,占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20%以上。整个通信产业已形成了终端机、程控交换机、光纤光缆、光通仪表、光电器件、光端机和通信网络的各种微

机、元器件的配套体系。有许多企业还在国内外建立了自身的开发和科研基地。技术支撑从被动的自发引进变成主动地走向国际市场,站在世界先进的通信技术的前沿,开发自己的产品。

(4)迅速崛起的朝阳产业——生物工程。深圳市在“九五”计划中把生物工程确立为七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是有远见的战略决策。从世界产业发展史来看,在本世纪,带动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增长,分别是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石油化工、电子工业,而世界科学家比较一致地认为“21世纪是生物工程世纪”,预计到2000年,世界生物工程产品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深圳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生物工程虽起步晚,但发展迅猛,从1992年到1996年生物工程产业的产值从0.76亿元,猛升为5.3亿元。现有企业30家,其产品包括生物工程药物、生化诊断试剂、生物食品、生物保健产品以及生物农药和兽药等。许多产品技术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二、粤港合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思路和策略建议

1、战略思路

21世纪是高新技术争霸天下的世纪,谁拥有高新技术的实力,谁就能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因此,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动力。广东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继续走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路子,难以为继;转向走重型化工的发展路子,既无此可能,也无此必要。故明智的战略选择应有超越式的发展思路,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直接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过渡。尤其应借香港回归之历史机遇,站在当代国际高新技术发展的制高点,采用市场引导、政策推动,点带结合、全面推进,合理分工、形成特色,运用科学技术之力,改造传统产业,兴适用的高新技术产业,求强国富民之路。

2、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对策与建议

(1)以国际、国内市场为导向,以政府的政策为推动和协调。从各地区的实际出发,按国内外的市场需求,选择适用的高新技术为突破口。如广东珠江三角洲中部地区应以机电一体化和电子信息技术为重点;西部地区以精细化工、原材料、汽车工业零配件、生物工程和海洋产业为重点;东部地区以电子工业的零配件、生物工程、服装、海洋产业为重点,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群。政府行为重在政策引导、生产力布局和产业协调,防止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和再现结构趋同。

(2)广东要为香港制造业升级作出新贡献。在香港制造业的80%以上转移到广东以后,加上港府采取“积极不干预”政策,面临制造业升级乏力的局面。后在香港各界和舆论压力下,港英政府提出若干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建议,但已是夕阳政府,其实质是“港英政府请客,特区政府付钱”。城市经济发展史说明,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不能没有工业支持,香港经济起飞是由工业带动;香港经济向多元化发展成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也得益于内地改革开放,把制造业某些工序转向内地生产,降低了成本,从而增强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促进金融、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瑞士是金融、旅游相当发达的国家,而其钟表工业也是世界一流的。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纽约、华盛顿、日本东京、大阪等现代化城市,第三产业虽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制造业仍长盛不衰。关键在于加大产品的科技含量,使制造业走高科技、高附加值之路。对香港发展高科技产业,经过前一个时期的讨论,比较一致地认为应重点放在多媒体科技、通讯科技、微电子的元器件开发和电脑软件的开发。近几年在港产品出口萎缩和下滑的情况下,1995年香港电子工业类的产品出口额仍达2040亿港元,比1994年增长30%。有鉴于此,香港和内地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要有效利用内地科技实力“这座金山”和大型的国有工业企业,通过资产重组推进香港制造业转型,发挥“虚政府”的作用;而港商应该从前段和内地合作互补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内地雄厚的科技力

量,加强两地在发展高新科技、高增值工业产品方面的合作,才是提高两地合作层次的方向。从80年代低层次“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提高为“结构性、整体性”的合作模式。

(3)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多渠道筹集高科技发展的资金。这除了过去传统的直接投资、银团贷款外,应有效地利用香港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和驻港中资机构,采取多种融资工具和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为高新科技企业筹集资金。如最近深圳市驻港机构深业公司和高速公路公司,在香港发行H股获得成功,其经验值得借鉴。这相应要求中央似应放宽广东在香港筹资的政策限制,允许广东在服从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下,有一定的对外融资的自主权。

(4)粤港两地合作共建科技工业园。目前,广东省共有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多年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但从总体上来说,多数的开发区,以一般加工业为主,因此,对这些高新技术开发区,也同样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开发区应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有效地筛选外资,尤其要吸引国际上生产同类产品的国际跨国公司加盟,吸收具有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园区,对一般加工业逐步转到区外其他地区。同时创造条件,在地理位置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再建若干个高新技术产业区。如有人提出在深圳福田保税区与香港落马洲建立自由关税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人提出,从香

港的西贡到九龙塘,延伸到深圳的南山区,中间用规划中的深圳湾大桥联在一起,形成高新技术走廊;有人提出粤港合作共建珠江三角洲“硅谷”。这些“异曲同工”的建议,共同的思路就是利用内地雄厚的科技实力、充足的科技人才、门类齐全的学科领域、科研机构林立的优势与香港资金充裕、信息灵通、市场网络广泛的优势结合起来,以补各自劣势,共同开发高科技产业,推进两地的产业升级,为香港的持续繁荣和内地现代化建设服务。

(5)借鉴台湾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经验,聚集英才。发展高科技产业,关键在于人才。台湾吸收一大批华裔科学家和在欧美的留学生,发展高科技产业。于1986年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占制造业的80%,到1995年已下降为26.8%,而科技密集型的工业则从占24%,提高为35%。台湾的资讯产业已超过德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其做法就是设置科技工业园和出口加工区,招揽在外国的留学生和华裔科学家,采取免税优惠、财政贴息、给予专利、银行贷款、奖励和技术参股等办法,为他们安居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研究和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占领国际市场。

作者何佳声,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教授(510632)

责任编辑:谭湛明

爱国情怀与天朝观念

——试析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岭南知识界的文化心态与社会舆论

□赵春晨

岭南知识界^①和社会舆论对于鸦片战争的结局作何反应？战后对于时代变迁和中外大势作何认识？从中又表现出什么样的文化心态？以及这种文化心态对于岭南社会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弄清这些问题对于认识近代初期岭南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状况很有必要。本文拟根据有关资料对此作一些考察和剖析，时间则限定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即19世纪40至50年代前期。

一、天朝观念

鸦片战争结束后，岭南知识界对于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予以了强烈的谴责。1842年11月，由士子钱江、何大庚所草拟的《全粤义士民公檄》里，历数英国侵略中国的行径，愤然写道：“英夷之窥伺天朝，其所由来者渐矣！……三年以来，逆夷恃其船坚炮利，由粤入闽，历浙入江。据我土地，戕我文武，淫我妇女，掠我资财，致使四省生民，惨罹锋镝，九重霄旻，备益焦劳，盖暴其罪状，罄竹难穷，洗我烦冤，倾海莫尽，实神人所共愤，覆载所不容。”文章还呼吁人们警惕侵略者的新阴谋：“逆夷性等犬羊，贪得无厌，和之真伪，不问可知。……况其向在海外，尚多内奸，今乃逼近榻前，益增心患。窃恐非常事变，诚有一言难尽者；若他国群起效尤，将何策以应之？”认为“英夷不平，诚为百姓之大害，国家之大忧”，因此必须“结同仇以明大节”、“伸天讨而快人心”。^②林福祥的《平海心筹》一书，对英人也进行了强烈谴责：“英夷犯顺，其猖獗则古今所罕见，其悖逆则覆载之所难容，比复夜郎自大，边海为灾，凡我同胞，不胜愤懑。”并且指出和之不可长恃，认为应当“以和议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毋忘昔日之辱，共

为后兴之图”。^③与钱江、何大庚、林福祥等普通士子相比，学者名流的言辞要含蓄一些，但愤慨之情与雪耻御侮的要求却是相同的。被称作“岭南两大儒”的朱次琦和陈澧，在鸦片战争后所作的诗文里曾分别写道：“卖国通番贼[琦中堂]，天津起祸胎。乱离民似草[百姓流离，不堪触目]，远近炮如雷[日夜惟闻大炮声]。江海含冤气，烽烟逐劫灰。楼船诸将帅，[水师之失痛甚]何日得生还？”^④“英吉利今虽议款，其患未已”。^⑤另一位岭南著名学者梁廷楠所著《夷氛闻记》一书，详细记述鸦片战争的历史，揭露“英夷狡焉思志于内地久矣”，^⑥“夷意主争市侖利，倾国以求尝试，先定旷日持久之谋，不得逞于粤，则肆毒于闽浙”，认为“我军之北，不尽关武备之废弛，与将帅之无谋也”。^⑦诗人们则以充满感情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悲愤。张维屏在《书愤》一诗里写道：“汉有匈奴患，唐怀突厥忧。界虽严异议，地实接神州。渺矣鲸波远，居然兔窟谋。鰕生惟痛愤，洒涕向江流。”^⑧谭莹在《庆清朝·题草檄图，为徐铁孙司马作》里写下这样的词句：“开辟未曾见此，但锦帆毡闪，风鹤频惊。游魂海外，中原偏任纵横。”“愿挥神笔，便斩长鲸。”^⑨

岭南知识界对英国侵略者的这种仇恨情绪和雪耻御侮的急切愿望，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10余年里一直存在于岭南社会中，并且随着英人在岭南侵略活动的扩大而更趋激烈。1846年广州反入城斗争中，以“广东全省水陆乡村志士义民”名义发布的公檄写道：“英夷生化外刁毒之乡，狼心兽面，虎视狐疑。在彼之不敢凯觎我粤省，惟不得进城探实地势与消息矣。今公然奉示入城，不

但强悍霸占、欺凌百姓，其害更有不可胜言者。是以我粤士民，虽三尺孩童，无不奋臂而起，曰：与其遵示而受野夷之荼毒，不若遗示而顾国家之旧制。今公议遵俟该夷进城、毕命之日，内则斩诛丑类，外则焚毁其巢，同心合力，尽剿根株，以彰天讨而申公愤。”^⑩1847年在广州出现的揭贴《中国士民公白》里写道：“尔英逆，化外之凶顽也，本不可以至理化。数年前因事称兵，扰乱中国各省，……今又肆其无厌之请，陡率兵船，潜入内河，希图挟制。噫嘻，何其不自量哉！中国仁义待人，尔则专事凶横，此仁暴之分也；中国天府沃饶，尔惟借蚕食以自肥，此贫富之异也；中国林林总总、人尽知兵，尔不过夜郎自大、乌合为雄，此强弱之势也；中国战守裕如，尔则数万里劳师而来转运难继，此主客劳逸之形也。不过略举数端，而胜败之机已显然矣。”^⑪1849年，广州的反入城斗争达到高潮，升平社学众绅耆发布公启，号召“不共戴天、誓灭英逆”。1852年，听闻英人在长洲上庄买地准备起建洋楼，广州又出现署名“阖邑公启”的揭贴，声明“华夷杂处，圣人严中外之防；唇齿相依，乡里切同仇之志。盖逼处恒虞乎他族，而思患必贵乎预防”，警告有敢将地方私卖夷人起建房屋者，定即予以攻毁。^⑫

从上述岭南知识界的言论和社会舆论来看，其中充满爱国的热忱和对民族、对乡土的深厚感情，表现出不畏强暴、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十分可贵。在对英国侵略野心的认识和警惕性上，也比鸦片战争前有所提高。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些言论和社会舆论也充斥着陈腐的天朝观念。在文士们的头脑里和笔下，英国人不过是化外穷荒的夷狄，其人“贪而无信”、“未受教化”，如同禽兽一般；而中国是君临天下，为四夷所“共仰共尊”的“皇皇天朝”，“土地最广，人民最众”，文化和道德水平最高；英人侵犯中国，乃是对君主权威的挑战和对天朝的大不敬，是叛逆和“犯顺”。钱江、何大庚草拟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里讲：“钦维天朝大一统，岂容裂土以与人，而草野效忠，但知杀贼而报国。我大清抚有区夏，二百年来，列祖列宗，以

圣继圣，举凡食毛践土，久浹帝德而洽皇仁；即在化外穷荒，亦戴天高而履地厚。四海澄镜，万国梯航，距中国数万里外，西南诸夷，亦莫不候风占月，输诚效顺。乃独英吉利者，其主忽女而忽男，其人若禽而若兽，凶残之性，甚于虎狼，贪黩之心，不殊蛇虺。”^⑬梁廷楠在其所著《粤道贡国说》中写道：“我朝威德覃敷，远无弗届。……由广东入贡者，惟暹罗、荷兰、西洋所属意大里亚、博尔都噶尔雅，以逮英吉利诸国。……彼世沐皇仁，所为感激欢欣，当不知如何鼓舞。其有吐蚩尤之雾而煽鲸鲵之波者，使天良未泯，静念将何以为心？”^⑭都反映出这样的观念。从天朝观念出发，势必不能清醒地认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目的、侵略实力和侵略危害所在，也势必不能清醒地认识世界大势和中外之间业已变化了的关系。英国被看作天朝唯一的假想敌，只要制服英人，中外间的关系仍然可以而且必须回到鸦片战争前的老样子。正是这种陈腐的天朝观念，使得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岭南发生的多次反英斗争，尽管有着抵抗侵略、爱国爱乡的积极意义，却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落后性，有的斗争非但未能击中侵略者的要害，反而予人以口实。

二、忠奸之辨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岭南知识界和社会舆论对于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也多有所论。它们所得出的结论虽然不尽一致，但共同之处是都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军备废弛的状况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英勇抗敌的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并为反侵略战争不能进行到底而深深惋惜。钱江、何大庚在《全粤义士义民公檄》里写道：“夫英夷不过荒外一岛夷耳，其来动劳数万里，其众不满数万人，我天朝席全盛之势，灭其跋浪么魔，何啻长风扫箨？奈何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顾国仇民怨，遽行割地输金，有更甚於南宋奸佞之所为者，诚不可解者也！”^⑮佚名所撰《英夷入粤纪略》一书指斥琦善卖国，谓战争中“广东险隘尽失，都为英逆所据，逆船直造羊城，皆琦善撤去各处兵备，掣肘将官，有以

致之。所谓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①⑥梁廷楠在《夷氛闻记》中评论道：“夷之伎俩，全在恫喝以取虚声。……明明势已穷蹙，久将益乏。”认为中国之所以未能取胜，关键是由于林则徐被罢免，“去之稍速”，而接任的琦善“事事务与相反，而卒为所挟至此”。①⑦1847年署名“闾省各社学同启”的揭贴则将谴责矛头对准代表清政府同英人和谈及签约的耆英，指耆英是中国受辱的根源：“前者，不过英夷以数千人逆命而已，非大有难戡之乱也，竟向之求和立约，其为辱已甚矣。然从此以后，能责令守约，犹未至长其轻侮之心，何乃欺君上而献土地，残民命以媚凶夷。……食君之禄，而残君之民奸为君守土，而辅敌占地。哀哉！痛哉！自有权奸以来，未有丧良心无廉耻若耆英之极也。”①⑧林福祥在《平海心筹》中论鸦片战争期间的粤东战事，认为有三大可惜之事：一是1841年3至4月间，“英夷兵船已入省河之大黄窖，而兵头义律及马礼逊俱在澳门，其所服役之沙文（即汉人跟班）及买办、厨子皆汉人也，使贿通其沙文等啖以重赏，俟澳门礼拜之日鸠杀之，……而省河一面纵火，烧其兵船，此乃第一机会，可以永绝后患。时有进是说者，并已与其沙文、买办，关说允协矣，而当事者首数两端，致不果行”；二是同年的三元里抗英之役，“义勇协同乡民杀死夷兵二百余名，时在四方炮台上者，只有兵头义律、马礼逊及夷兵数十名，而数万名乡民，围如铁壁，所以有义律欲拔剑自刎之信。使非当事出城弹压，则一鼓歼绝。彼在海外者不知内地虚实，必致心寒胆落，焉敢再寇江浙？唯放走义律、马理逊二人，彼已窥透官兵之不足畏，于是舍粤东而向江浙矣。是一日纵敌，万世之患也”；三是英军主力北犯江浙后，“所有钱粮辎重俱屯在香港，而所留以守香港者，只有三百夷兵，且精兵俱已调去，所留在香港者皆羸弱之卒，且又无兵头统摄，只留管事一名监守。……若于此时收复香港，烧其积聚，则彼进无所食，退无所据，将不战而自溃矣。当事又计不出此，使彼毫无畏忌，任意攻取，多方需索”。①⑨

岭南知识界的上述思想认识和所形成的社会舆论，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一方面它热情讴歌了为民族利益作出贡献的爱国者和爱国壮举，另一方面它又大胆地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某些封建官僚对外妥协的行为。因此，它们对于民族正气的宏扬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它们也加深了人们对封建主义腐朽统治的怀疑和不满，促使人们去寻找新的出路。从这方面讲，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岭南地区爆发多次农民起义，与上述思想和舆论的影响可以说不无关系。

然而，岭南知识界的上述思想认识和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偏颇与不足，主要是：第一，将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权奸误国”，认为如果当初不是琦善、耆英之类的奸佞小人在朝廷中作怪，而让林则徐等忠义之士继续主事的话，战争局面就会根本改观，中国就不会被英人所打败，这实际上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忠奸之辨的政治观，似乎一切问题都只出在道德层面上，与国家制度的优劣、文化的短长是没有丝毫关系的。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妨碍了人们去深究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性原因，而仅仅满足于从旧有社会模式和政治理念中所得出的简单化、表面化的结论；第二，过分地渲染和夸大了自身的力量，而低估了英国侵略者的实力。例如当时广为传颂的三元里抗英斗争事迹，无论是歼敌人数还是此役对整个中英战局的影响，实际情况都和文人们的描述渲染有着很大的出入。至于根据这样一些并不完全属实的传闻而断定“夷自是始知粤人之不可犯”、②⑩“逆兵一无所能，唯我退一步，他所以进一步，若我进一步，他即退一步”，②⑪甚至声言英人“以无多之兵船，有限之军饷，而欲与天朝抗，犹以卵击石，其毙可立而待”②⑫等，更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外之间力量对比状况的无知和不肯承认自己是落后、弱小一方的文化心态；第三，未能摆脱忠君思想的束缚。战争的失败和受辱全部被视为臣子们的过错，而君主是没有任何责任的。粤东和江浙战场上的失利，要么被说成平日臣子们不能尽心王事、勤修武备，要么就是

琦善、奕山、奕经之类奸臣、庸臣所致；求和签约则是耆英等人“欺君误国之愆”，或者被解释为“圣天子英明神武，洞照诸臣之无能，念士民之忠愤，暂为羈縻于目前，而亟图振发于事后，将示天下以不测之神威也。”^⑳这种自觉或不自觉地粉饰、美化封建君主的心态和舆论，又使人们易于得到心理上的平衡和安慰，将恢复天朝秩序的希望寄托于圣明天子身上，实际起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三、制夷之策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如何对付英国人、即“制夷”的策略问题，是岭南知识界和社会舆论所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主张。陈澧认为，“为今之计，中国贵乎崇廉耻、核名实，刑政严明，赏罚公当，则可战可守，外夷自不敢欺”，“内守诚固，则彼技无所施，不得不仍求通商，此时虽绝其贸易可也，许贸易而禁绝鸦片可也”。^㉑梁廷楠也认为，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㉒此可谓“循本内守”之策；岭南士绅潘仕成、许祥光等认为，中国没有能够“出洋攻剿”的海上武装力量，英国战舰“驶行数省洋道，如入无人之境，……锐意直进，毫无顾忌，屡胜之故，端在于斯”，因此提出：“今宜创造坚大战舰百艘，艘各配以弁兵百人。于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四省外海水师营分，各选精锐二千五百人。多储水食炮械以实之。……西界越南夷洋，北抵盛京，无论内外诸洋，咸责巡哨。而江南以西，迄于钦廉，尤不时梭织游历。每出以二十船为一队，衔尾联行。”“遇英夷兵舶轮船，审定旗帜，不骤燃炮轰击，但随所向紧蹶其后。设彼炮先发，我亦应之。彼船帮单寡，我合队环攻，无不得志。候其炀窳内港，而后从外击入，本地防兵亦闻声自内迎出，首尾势难兼顾，出路既已断绝，自可令片帆不留。”^㉓此可谓“造船巡洋”之策；社学首领和民间揭帖的作者们则多持“以民制夷”之见。1847年以“闾省客商公启”名义发布的《告谕英商大略》中写道：“英人动恃其船坚炮利，任意横行，亦当自知古无不破之敌。汝恃大皇帝及大宪宠待之隆，将百姓欺藐，尤为拙甚。盖人心即

是天心，人心愤，天心之所怒也。汝试思，英兵能有多少，即使一以当百，亦不能我敌也。”同年的《粤东全省商民直白》中写道：“我粤东四路社学，壮勇团练，不下数十万，智谋之士，不下数千，岂无人物耶？……倘英夷迷而不醒，仍蹈前非，粤东一省，先绝其贸易，火食，在彼处雇工者，立即一应搬回，有如婴儿在抱，绝其乳食，立死掌中矣。”^㉔这种“以民制夷”的主张对当时的地方大吏也有很大影响；还有人倡言“以刑制夷”，认为：“逆夷最畏我朝刑法，……夫制人者必中其所畏，苟获得逆夷，无论兵头水手兵役，立即处以极刑，梟示海滨，一则以生逆夷之畏，二则以夺逆夷之气，此亦制逆之一法也。”^㉕林福祥在《平海心筹》中提出的对付英人的具体办法更是林林总总，包括“募乡勇”、“招汉奸”、“招海盗”、“埋伏守险”、“防后路”、“筑炮台”、“用小船攻大船”、“用木排水寨”以及“抚绥澳门西洋夷人”等。^㉖

这些“制夷之策”的提出，反映了人们爱国御侮的急切愿望，其中一些主张对于进行海防建设和反侵略斗争也不无可取之处，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岭南知识界在探求“制夷之策”的过程中，对西方事物的求知欲大为增强，开始睁眼看世界，其意义更非比寻常。梁廷楠在鸦片战争后搜集有关世界史地和宗教方面的资料，陆续撰成了《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粤道贡国说》和《兰仑偶说》，于1846年合刊为《海国四说》，其中不仅较准确地记叙了英、美等国家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而且介绍了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还有一些士绅目睹英人“船坚炮利”的事实，萌发了“借彼之矛，攻彼之盾”、“不妨以逆夷之物，还逆夷之身”^㉗的想法，购求或者仿造西洋火器。潘仕成、潘世荣、易长华（广州知府）等人认真研究和仿制西式战舰、水雷，潘仕成还写成了《攻船水雷图说》一书，介绍水雷的制造方法和性能。丁拱宸在岭南积极进行西式火炮和炸药的研制，著有《铸造洋炮图说》、《西洋用炮测量说》、《西洋炮台图说》、《西洋制火药法》等。所有这些都显示

出岭南思想文化领域发生变化的端倪。

但是从这些“制夷之策”中也可以看出,此一时期无论是岭南的知识界还是社会舆论,由于受封建天朝观念的束缚和对中外力量对比的真实状况缺乏认识,基本上未能脱出中国传统的对付“夷狄”的治术范畴。这些治术在面临资本主义侵略的新形势下,显得迂腐而不切实用、浮夸而难奏其效。而且,即便就一些稍具新意的策划和主张而言,也都欲进又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在对待西方事物的态度上,基本仍停留在了解敌情、即“知夷”的思想水平上,并未进一步上升为向西方学习、即“师夷”的思想认识。非但如此,由于受鄙夷西方文化的心态所支配,岭南知识界还相当普遍地对当时业已出现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和时代号召采取了否定态度。陈澧在阅读完《海国图志》后,虽对该书的诸多内容都作了肯定和赞扬,却唯独不肯就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之策置评,因为他所强调的是“内守诚固,则彼技无所施”、“国威已振,大患即除”等。^①以“知夷”著称的梁廷楠更直接对“师夷长技”的主张提出异议,《夷氛闻记》评论道:“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与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反求胜夷之道於夷也,古今无是理也。”^②在专门研究英国的著作《兰仑偶说》里,梁廷楠也轻蔑地表示,对付英人的“飞炮”、“弹子”等火器,只须“内地备水车待之,即无能为”。^③可见他们仍旧抱持着文化上的自

我中心主义,自然难以产生“师夷”的自觉。而此一时期岭南出现的若干仿制西洋火器的个案之所以不能成为引进西方科技和机器生产的先导,相反一遇技术上的难题,便戛然中止,不复受到人们的重视,原因也正在于此。

①本文所言知识界范围限定为有一定文化而又未在政府任要职的人士,包括当时的学者名流、中小官员、城乡士绅、士子生员等(担任要职的高级官员,属于统治集团成员,其言行多具有政府行为性质,故不列入知识界)。他们亦是造成社会舆论的主体。

②⑬⑮⑯⑳㉑㉒㉓㉔㉕《鸦片战争》(三),第353—355,353,354,1,22,354,23,591—5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③⑱⑲⑳《鸦片战争》(四),第603,588—589,605,589—590,590,603—604页。

④陈永正主编《岭南文学史》,第583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版。

⑤⑳㉑陈澧《东塾集》卷二,第23,24,23—26页,光绪壬辰刊。

⑥⑦⑰⑱⑲⑳㉑梁廷楠《夷氛闻记》,第1,169—170,170—171,76,172,143,172页,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

⑧《岭南历代诗选》,第66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⑨钟贤培、汪松涛主编《广东近代文学史》,第15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

⑩⑪⑫⑬⑭⑮⑯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稿》,第270,281,176,311—312,290,281页,(日)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4年版。

⑰⑱梁廷楠《海国四说》,第164、104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作者赵春晨,广州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510400)

责任编辑:郭秀文

50年代以来的香港小说创作

□何 慧

一

与内地文坛具有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相异，独立发展于自由资本主义殖民统治地区的香港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至少可以归纳出三个特点。

第一，它保留了与内地主流文化相异的另一种观察世事的视角。1949年以后，内地的文学从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自主，变成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充满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文学。而五四以来所开创的文学的优良传统——批判现实的功能和启蒙的功能则还保留在香港作家的创作中。香港作家夏易、阮朗、舒巷城的作品，就以理想的尺度烛照出香港社会的黑暗。香港文坛还容纳了像张爱玲和徐痞这样一些曾被革命阵营视为异端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在政治对垒相对减弱的今天，更显示了不灭的社会价值和人性价值，张爱玲的作品很严肃地向我们提出了法治的问题，徐痞的作品向我们显示了一个雍容、平衡、和谐的世界。

第二，香港文学的偏于大众化和偏于民间性的特点，与内地文学的精英取向、教化特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满足了读者不同的审美趣味，这为文学如何争取读者提供了经验。人的思想意识和传媒的影响密切相关，读者在不加思索地享用别人的思想成果的时候，实际上也接受了被反复重述过或被汰选过的经验。根植于香港民间的通行文学更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总是追求新艺术趣味，继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之后，又出现了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更有一些作家以“怪论”的形式说出了自己对香港社会的新感受。在取悦读者方面，香港文化商人也作出了许多新尝试：先是搞报纸促销，然后推出不同包装的小说明星，最后是以生产商品的方式来经营文学，以便获取更大的名利双丰收。

第三，现代化、国际化、都市化把香港文学推向前卫，小说所采取的语言文字和体裁形式都有了创新，小说的内容更是表现出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及生活形态的变迁，给内地文坛灌注了崭新的精神与活力。50年代，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就已经开始从人本的角度反观政治与经济，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作品；60年代刘以鬯等人的创作更是以“技巧即观念”的姿态表现出不向流俗低头的美学力量。以后，西西、也斯等人不断探索新的形式为都市化的香港塑造形象，造就了一批面貌全新的小说。90年代，也斯的《布拉格的名信片》，很好地实践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主张。

由于香港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明显，香港作家总能按照自己的艺术趣味实践自己的艺术主张，香港文坛看来比内地文坛更活泼多姿。

二

香港处在中国和西方的交接地，一直以来就受着双重文化的影响，香港文学是一种边缘性的文学，这种文学有着流动的特点。就创作的主流方向而言，半个世纪以来的香港文坛，大致可以分作几个阶段。

50年代以“内地文化的回顾”为主流。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香港与祖国的关系开始处于相对隔离状态，香港文学也走上了自立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的影响使香港发生巨震，香港出现了工人罢工、政治骚乱等事件，港英当局面对这一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过和公布了多项法令和条例，这些法令和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香港政府对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抵制态度。这样的政治背景，大致确定了当时香港作家的阵容。正如黄维梁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之后，大量左派作家返回内地，很多非左派

作家则离开内地，到了香港、台湾和海外。50年代香港，成了逃亡作家的庇护所。”（黄维梁《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原载1989年《香港文学》）这批南迁作家的到来，为沉寂的香港文坛的复苏贮存了巨大的力量。

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抗美援朝，美国开始改变对华政策，由消极的静观到积极部署，台湾在香港的活动变得活跃起来。他们建立基金会和文化协会，资助出版社，以高稿酬买稿子。一批南下作家趁机抒发战乱后内心的创痛，作品题材多为对故国山河的眷念，战乱流离的飘泊，与抗战前后人物事迹的描述。

这个时期，新中国政府也开始在香港做文化工作，创办了一些有规模的文艺期刊，也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

50年代的香港文学，政治壁垒分明，政治观点不同的作家以小说的形式打政治仗，各为其所依附的政治权力服务。然而，当作家透过自己的头脑“再次呈现”生活的时候，作家往往会被政治观点以外的因素所左右，作品虽然包含有一定的政治观点，但浩瀚的生活决不是狭隘的政治观点所能包容的。正因如此，我们才在有政治倾向的作品中，读出更为丰富的内容。与此同时，在南下作家沉迷于政治、怀乡、爱情的时候，香港一批较年青的作家创办了《文世新潮》，现代主义文学开始在香港生根。

60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学的萌发期。随着美元文化的撒退，香港文坛上的喧哗逐渐沉寂，处于从怀念乡情转向面对现实的低温期。由于香港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毫无建树，香港文学便出现向民间化发展的倾向。作家们的写作速度开始加快，作品思想容量开始减少，流行成分开始加强。也就在此时，梁羽生、金庸等人为报纸促销开始了武侠小说创作的尝试，大获成功。依达的新派流行言情小说也取代了杰克（黄天石）、望云（张吻冰）的旧鸳鸯蝴蝶派小说。三苏针砭时弊的怪论也大受香港市民的欢迎。

在国外，流行小说一直被视为低层次文化需要的较次等的文体。60年代后越来越盛行的香港流行小说，似乎打破了这一说法。这不

仅仅是因为香港的阶级文化冲突不如欧美明显，没有真正的文化主导力量鼓励人们读高雅的文学作品，更因为香港是个鼓励流行小说创作的地方，从事流行小说创作的都是些较高层次的文化人，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是它主要的运转环节。香港文化因此也就主要是消费文化、流行文化、俗文化，它首先以迁就广大消费者的需要为目的，受消费者的审美趣味所控制。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香港的不少文化人作出了妥协。

然而，此时一些不甘随俗的作家，高举着现代主义的大旗，对流行文学作了不屈的抵抗。他们创办了《好望角》杂志。刘以鬯也在此时出版了他极具艺术技巧创新的《酒徒》，以意识流的手法，道出了香港文化人的悲哀。

70年代，香港小说表现出“向往内地文化”和“向往海洋文化”的双向选择。六、七十年代，香港逐渐摆脱了经济上的窘境，获得了初步繁荣。社会逐渐走向富裕，生活秩序也得到了恢复。50年代香港作家笔下那种“本来是五湖四海的英雄，而今宝刀只能当作白铁卖”，以及原来的名门闺秀只能在欢场中操皮肉生意的状况已经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个人决断性较强的对不同生存方式的自由选择。基本生活有保障，使得对立阶级处于劣势一方的穷人，在处理阶级矛盾时，也不采取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态度。一种本阶级优越的自信存在于出身下层劳动人民的作家的作品中，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

70年代的香港，处于西化不断加深，同时内地的影响也不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西方意识形态得到香港年青一代的仰慕和接受。外国电影开始在香港抬头，披头士文化也乘势卷进香港，这种新的文化潮流孕育了香港年青人共同的思想观念及价值模式，模糊了原有的阶级和传统规范。民主化作为一种文化潮流，开始不为某一特权阶级所垄断，而广及社会大众。另一方面，内地的“文化大革命”，也因被误解为民主化与反传统，和某些西方观念吻合，因而扩大了内地的影响力。陈宝珠与萧芳芳主演

的《泛工厂妹主义》粤语片被广泛接受,就证明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潮流,被社会广泛承认。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崛起了海辛、金依、张君默、陈浩泉等一批“打工仔”出身的作家,他们以工厂、渔村、小镇生活的纯朴古风,对抗资本主义生活的厚颜无耻、冷酷无情、伪善行为等等。

与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北望倾向不同,西化教育、留洋热潮、大量译介西方文学作品与理论,也培养了一批香港现代主义作家。如西西、也斯、吴煦斌等,他们作品的体裁形式、主题笔触、表现方式等,均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强烈影响。

80年代的香港小说创作,有着更强烈的沉浸在自由资本主义既得利益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流行作家们明确地肯定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性解放的观念。在香港,由于没有主流意识形态,个人主义便更加张扬。这种新型的人格,要求人们在庞大的政治和经济的运作之下,明确而清晰地自觉到自己需要什么,从而毫不畏惧地表达出来。大众文化恰巧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作毫不犹豫地结合在一起,鼓吹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以挽救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于是,各种潮流引导着大众的消费取向。个人品味及价值判断被纳入到一种共同化的趣味中。潮流的周期性变换经广告宣传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个人似乎只能宿命地接受,不然便会与时代、大众脱节,被孤独与虚无的恐惧所困扰。流行小说中极尽铺陈的奢华,也成了人们生活的范本。拜金主义、强者人格、开放的性观念及有品味地生活,构成了香港此一时期流行小说的主流。而亦舒、林燕妮等人的作品,无疑是最典范地反映了这一点。他们不仅迎合潮流,而且有计划地把自己包装成符合潮流的人物,为出版商或某个利益集团创造出一个个流行小说明星的神话。

另一方面,一批新移民作家完成了从社会批判到社会认同的过程。大凡在内地受过教育的人回到香港,都会感到思想观念上存在极大

落差。70年代初从内地到香港的作家,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看到了中国因政治制度不完善而造成的种种恶果,但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经济平等、人格平等、精神第一的产物。这批在海外出生、回祖国受教育、又返回香港的作家,一旦离开了原来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及文化心理的撞击与振荡。他们首先经历的是失落:理想的失落、精神的和情感的失落、事业和信念的失落。继而,他们会在失落中寻找,重新建立新的人伦关系和道德观念。这批作家的早期作品,都带着明显的内地文化的烙印,对香港社会因看不惯而愤怒,因愤怒而有所批判。他们的中期作品大多诉说伸张人格和顺从生活的两难。他们的后期作品则较为超脱,以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叙述社会的丑恶现象,他们一改以往南下作家不认同工商社会的“士大夫”特点,成为社会的弄潮儿。他们是东瑞、陶然、白洛、颜纯钧。

随着女性教育程度的提高和职业女性的增多,原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关系受到了冲击,不少女作家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对原有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颠覆。而个性极强、风格各异的小说创作蔚为大观,又形成了香港小说多元化的后现代特点。

90年代,香港文坛在自我省视的同时,也高奏回归的凯歌。从1982年年底起,香港进入了一个历史转变期,1984年9月中英两国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意味着香港前途的转变,意味着600万香港人几十年来已经被物质形态固定了的生活方式将会改变。这就有一个逐渐理解“一国两制”精神和习惯新变的过程。从“前九七”的恐慌、混乱,到面对现实,再到“后九七”发现回归祖国的价值,并积极行动,香港人走过了从游移到坚定的过程,此一时期的香港小说创作也记录了这一过程。与关注主权回归的同时,香港人开始有意识地流露出对过往共同经历的缅怀,希望为香港将来的高度自治提供经验与保障。一批追索香港历史

的作品也因此产生。

“梁凤仪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流行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梁凤仪是以全新的姿态闯入文坛的商人。她的整个写书、成书、行销书籍的方式,都不是作家式的,而是商人式的。80—90年代的香港,作家早已失去了神圣的身份,所有有新闻价值的人全都有成为作家的可能,他们以开专栏的形式挤进了作家的行列,像梁凤仪这样亦商亦文的文人似乎更能成为这个时代作家身份的标记。梁凤仪以排炮式的出书方式进攻书籍市场,创造了文化界的奇迹。梁凤仪现象把精神生产和工业产品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经济是生活,文学是情趣,把经济与文学、生活与情趣结合得天衣无缝。从作品的思想内容看,梁凤仪的小说并非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认同者,相反,深知资本主义社会黑暗,同情弱者,张扬独立自主的人格,都消解了资本主义的流行观念。

三

与香港文学的纵向发展相伴随的是香港文学的边缘性、都市化和民间特点。

说香港文学是痛苦的精神放逐并不为过。从香港沦为殖民地开始,尤其是1949年以来,香港文化一直处在模棱两可的尴尬地位,身受港英政府统治,北望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台湾,身受多重文化的冲击。他们在语言文化上有所认同,却摆脱不了殖民地的特点。香港文化一方面表现得很开放、自由,而另一方面,港英政府在文化建设上并没有作出更大的努力。多元化下缺乏统一的文化精神,这是香港小说的一大特色。“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稍留……向北风而开襟”,这是许多香港作家的共同情怀。即使在70—80年代最能代表香港文化意识的作品风行一时,我们依然能感到这些文化意识的无根飘遥:金钱至上,醉生梦死,虽然奢华,但终究是要醒的梦。

香港是中西贸易和文化关系的桥梁。开埠

以后的100年中,来谋生的人虽多,但真正以香港为家,在此地植根的人却不多。香港居民的文化背景,以市井文化为主,工商次之,其次为士。人们的价值观念、态度和处事方式,都和中国传统社会以“士为四民之首,商为四民之末”的程序很不一样。

都市密集的人群成为最新资讯的追随者,他们赶潮流,重包装,慕虚荣。迅速流动变化的一次性消费文化,空耗了人们的精神和精力。城市文化由沉重变得轻飘。爱情被功利主义和瞬间离合的人际关系分解得肢离破碎,痴情被挤得无处藏身。人们仅仅可以抓住的是朝秦暮楚的欢情。

由于港英政府并不积极支持文学事业,香港文学只能生长在民间,接受商业化的操纵。香港有大量的报刊杂志,每天都刊出为了促销而创作的流行文学。流行文学以取悦读者,迎合市民的猎奇心理为首要目的,不同于严肃文学对人性作深入的挖掘和对社会作深刻的批判。虽然在某种层面上反映了普罗大众的愿望和要求,但也揉杂了国民劣根性的许多糟粕,黑幕小说、鬼怪小说、黄色小说就是其代表。当然,由于优秀文化人的参与,香港流行文学也有它辉煌的一面,诞生了一些内容健康、思想深邃的作品。

华洋杂处,国际化大都市的特点也影响了香港小说的创作,香港是西方文化接受得比较快的地方,不仅有风格各异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而且流行小说也表现出有别于小农经济文化——保守、谨慎、勤俭的价值观的前卫倾向——对金钱和物质生活热烈追求,女性也从从属地位变为以自我为中心等等。这些倾向,提醒我们对人性和社会作出新的审视,为将来的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作者何慧,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510630)

责任编辑:陶原珂

香港学校公民教育的发展与前瞻

□石勰平 张倩苇

香港学校公民教育的发展

现代香港地区学校公民教育的发展以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发表和香港教育署《学校公民教育指引》的颁发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殖民地时期的公民教育和过渡时期的公民教育。

(一)殖民地时期的公民教育。

百余年来,香港政府在执行殖民地政策的影响下,从不鼓励和推行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受重视的。这一时期,公民教育虽然存在,但是以灌输英属殖民地宗主国的意识形态为主,淡化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的教育。1951年12月港府发表的有关香港教育政策的《菲沙报告书》就明确指出:香港政府要为每一学童提供关于“英国人的理想与习俗”的“基本教育”。据此,港府在当年就在中小学校开设公民科。其课程内容主要是灌输一些殖民国的观念,如英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英国政治有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的协调、大英联邦促进世界和平,等等。课程纲要还强调香港的城市生活与中国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不同,公民(特指香港社会的人民)和顺民(特指中国内地的人民)的区别等,带有一定的政治偏见。到50年代后期,公民科的政治教育内容明显减少,而侧重公民责任感的培养。

7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建设的发展,青少年社会问题日益增多,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需求也有所增强。于是,原来的公民教育课程《公民科》作了相应调整,改为《经济及公共事务科》,偏重认识香港的经济,淡化政治教育,但仍然强调香港的殖民地属性,公民的责任是

守法和服从。1971年港府颁布《教育则例》作为香港重要的教育规章,更是明文规定教师和学生不得在校内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活动,从此公民教育步入低谷。

(二)过渡时期的公民教育。

自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的发表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香港进入过渡时期。为了适应香港政制改革的需要,香港教育署于1985年8月颁发《学校公民教育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向全港所有中小学校及幼稚园全面推行公民教育。《指引》提出了公民教育人人有责;公民教育实质上是政治教育,但不赞成政治灌输;应鼓励学生根据资料自由讨论,而不赞成强加结论等一些新观念。同时,它还建议学校成立公民教育委员会,从正规、非正规及辅导课程、课外活动三方面来开展全校的公民教育。

随着“九七”的临近,香港教育署又对《公民教育指引》进行了修订,从1996年9月开始实施。新《指引》突出民族教育概念,建议学校从“认知、反思及行动”三个层次去培养学生的爱国民族精神,初小阶段讲授国旗、国徽、国歌等;高小则讲解主权问题、香港行政区及基本法问题;高中讲解国民社会等。新《指引》还提供“渗透法”、“独立的公民教育科”、“综合性科目”三种模式供学校选择。

《指引》的意义在于,(1)它首次以教育行政部门规章的形式确立公民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变了学校长期以来忽视公民教育的倾向;(2)它提出了公民教育实质上是政治教育的观点,打破了长期以来统治学校教育的政治禁条,直接导致了1990年对《教育则例》中有关限制学校进行政治教育内容的修改;(3)它

制定了从幼稚园到大学预科公民教育的大纲，为香港公民教育逐步走向规范化、序列化、制度化的轨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在肯定《指引》的意义和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香港教育界人士对它提出的不少批评和建议，比如说它强调国家、民族意识不够；要求把公民教育列为必修科；培训专门的师资等。这些意见在新《指引》中得到采纳。

为了推动公民教育的实施，港英政府于1986年5月正式成立了一个公民教育委员会，成员包括11名非官方委员和多个政府部门代表。1989年该委员会还成立了公民教育资料中心，作为其附属机构，专门为推动公民教育服务。教育署为推动学校公民教育，也采取了积极态度，每年举行系列公民教育活动。如1986年，教育署相继组织举行公民教育研讨会、公民教育联谊日、公民教育设计比赛、学校德育展览等系列活动，为此还提供部分活动经费。1996年港署就拨出120万港元资助推行公民教育的学校。1986年12月香港教育署发表《“学校公民教育指引”实施情况评估报告》，对所有中小学及幼稚园推行公民教育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该报告表明，(1)参加公民教育在职训练的学校及教师：中学86.2%（教师2328人），小学86%（教师3242人），幼稚园57.9%（教师933人）；(2)该学年曾组织公民教育活动的学校：中学60.2%，小学59.3%；(3)有95%的中学和91%的小学认为《指引》对他们有实际的效用。这些情况表明，公民教育在香港中小学校逐步受到重视，中小学校为推进公民教育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香港学校公民教育的宗旨、内容和途径

（一）学校公民教育的宗旨和目标

香港教育界认为，从狭义上说，公民是指个人对政府的关系；从广义上讲，则是指个人对社会的关系。因此，公民教育是一种既将个人培养成有高尚道德而又能改善个人与政府、社会关系的教育。香港公民教育的实质就是要协调

个人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从而加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

基于以上认识，香港确立学校公民教育的宗旨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了解政府及辅助机构的性质及其工作，明了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及价值；(2)培养社交和参与政治活动的的能力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3)养成在自由讨论时的判断能力；(4)通过态度和行为的塑造，认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其公民教育要求达到以下几个目标：(1)对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个人的人际关系需要得到合理的满足；(2)对香港文化传统及目前生活方式的欣赏和重视；(3)时刻关心社会及国际事务；(4)社交技能与政治批判能力的增强；(5)对影响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有一定的认识。

（二）学校公民教育的内容

香港学校公民教育的内容一般是以个人、个人与社群、个人与社会（香港）、个人与国家（中国）、个人与世界五个方面为主线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法律、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以初中课程为例，个人部分是讲如何了解自己，包括个人成长、个人卫生、成熟前的准备等。“个人与社群”部分是通过家庭、社会、邻里三个单位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懂得社群生活，搞好社群生活。“个人与社会”主要介绍香港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知识、市民的权利与责任等，鼓励学生参与适当的社区活动，从而加深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个人与国家”部分，讲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的基本知识，中国近期的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和香港在各方面同中国的联系，以此培养学生的国家、民族观念以及对中国的认同感。“个人与世界”部分，介绍香港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以及与世界的关系，教育学生要为繁荣香港经济作贡献。

香港在推行公民教育方面，注意从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教育实际出发，在教育内容的选择和课程安排上有所区别，也有所侧重。《指引》从知识、态度、技能三个层面为中小学提出了一个全面推行公民教育的大纲。在幼稚园课程方

面,重在引导学生认识个人在群体关系中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小学阶段侧重于促进学生在社会中的成长,在对高年级教导“香港与中国历史、社会、经济上的关系”时,使学生了解“互惠互惠”的概念以及培养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在初中阶段,指导学生思考如何客观地评估政府的工作表现,鼓励学生参与公益活动。在高中阶段,分析中国近期经济发展的因素,分辨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差异,认识代议制。预科课程则注意培养学生评估政府政策的能力,了解中国政策以及中英联合声明等。

(三)学校公民教育的途径

香港学校公民教育一般是通过正规课程、非正规课程以及辅导课程、课外活动、校风建设等多方位全面推行的。

正规课程是学校实施公民教育的主要途径。《指引》指出:“中学教师应利用各科课程内每一机会促进公民教育,以培养学生积极的态度,并改变其个人技能与人际关系的技能。在社会、健康教育、语文科等课程方面,采用设计教学的形式提高公民意识,使学生明了处世自律的需要。可以说,学校课程中的许多主题内容都是进行公民教育的好素材。据1986年香港教育署的调查表明,跨课程和通过某些科目进行公民教育的中学占83.5%,小学占92.7%;把公民教育作为独立科目或独立课程讲授的中学占1.5%,小学占1.3%;以两种方式混合进行或以其它方式推行公民教育的中学占15%,小学占6%。”

非正规课程和校园建设也是香港学校推行公民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1986年的调查表明:89%的中学、93%的小学是通过学校集会进行公民教育的;85%的中学、81%的小学通过班或级的主任课来进行;65%的中学、42%的小学利用社区活动、兴趣活动及康乐活动等来进行公民教育。在校园建设方面,中小学主要是通过搞好师生关系、学生参与、校长的领导等方式、以及课室管理、照顾学生的需要、家长教师会等方面来提高学生的公民意识。

1997年后香港学校公民教育的发展趋向

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面对未来,香港学校的公民教育将会与香港的前途相适应,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

(一)香港学校公民教育充分体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本精神。

《中英联合声明》表达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基本看法。它确定主权回归后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精神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香港今后公民的社会行为和制订各项法规的基本法律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讯、罢工、职业选择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香港教育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有关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及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承认学历及技术资格等政策。这些是香港推行公民教育的法律基础和政策背景,也是今后香港公民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二)从殖民主义的教育到国家观念、民族意识教育的转变,是“九七”以后香港公民教育的根本性变革,认识祖国乃时势所趋。

以往香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英国统治香港和工商业的发展培养人才的,因而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教育色彩。1985年港署颁发的《公民教育指引》和1993年颁发的《香港学校教育的目标》对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教育讳莫如深。

“九七”以后香港学校公民教育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首先是教育宗旨的变化,公民教育的目的是为未来的香港社会培养港人治港的人才和特区的公民。其次是公民教育内容亦有所调整,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教育将得到加强。港署于1996年3月成立了检讨学校公民教育指引工作小组,从9月份起向学校提供新

的公民教育指引及课程范围,其中较大篇幅就是增加国家民族教育的内容,加深学生对基本法及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认识,培养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香港教育评议会建议,1997年至2007年这10年间,公民教育的重点应先着意于民族情感和国家情怀的培养,以及强调“一国两制”的体制观念;第二阶段则应开始让学生深入学习祖国的宪法,多了解祖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以便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

(三)公民教育作为独立科目开设并且列为中小学必修课程的条件日趋成熟,公民教育可望有较大发展。

由于1985年《指引》不主张把公民教育列为独立的必修科,学校在推行公民教育时在时间、人力、物力等资源上得不到保证,往往流于形式,随意性大。为此,香港14个教育社团曾发表联署声明,建议把公民教育列为必修课。香港教育评议会在1995年发表的《公民教育意见书》中建议港府逐步将公民教育列为中小学校的必修课程,首先应将公民教育定义为“中国国民教育”,在此基础上拟定《中小学公民教育科课程大纲》,并据此编写独立的公民教育课程。1996年年初,香港教育署举行了三场公民教育研讨会,并在会上发出问卷调查,结果是多数赞成公民教育设独立科或综合科。6月28日的课程发展会议正式通过在初中开设公民教育科,并立即成立科目委员会办理有关事宜。新的公民教育指引亦提出学校可自行编订公民教

育课程作为独立科目或跨课程科目。

(四)学校公民教育实施的策略:循序渐进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委会小组对“九七”以后香港推行公民教育情况的初步研究报告显示,公民教育应循序渐进,资源与师资应逐步加强。1997年以后,公民教育首先要注重的是“国家观念及民族意识”强化的问题,因为以往这一内容往往被忽略。另外,现今课程引进的基本法教育并不积极,在今后内容上应予以改进和加强。推行公民教育是长期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要考虑到港人承受力的问题。从原则上说,公民教育应贯彻在所有学科内容上,但从长远来看,发展成独立一科较为理想。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横空出世,而是脱胎于原来的香港社会基础上的。未来香港学校推行公民教育要充分考虑到香港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一国两制”的现实基础,循序渐进,这是比较明智而有所作为的选择。

主要参考资料:

1. 香港教育资料中心编《香港教育手册》,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2. 香港教育联会等编《香港教育剖析》,广角镜出版社。

3. 史深良著《香港政制纵横谈》,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石颢平,广东省教育厅科长(510035);
张倩苇,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讲师(510631)

责任编辑:陶原珂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

与实践唯物主义

——论实践对于辩证法的首要地位

□吴启文

实践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基本要素,但它们并不处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本质是改造世界,只有实践才能最充分地表达这一本质,实践比之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基本更本质的要素,辩证法从属于唯物论,从属于实践,作为实践的工具为实践服务,只有实践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又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因此,用实践唯物主义来称呼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更充分的理由。这并不简单地只是一个名称之别,而是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更深刻更正确的理解,更好地表达了时代精神的精华。我国哲学界达到这一新的理解是与邓小平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不开的,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实践唯物主义。

一、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是实践还是辩证法?

传统的观点主张,辩证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它形成在先,然后把它推广去说明社会历史,于是才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占有首要的位置,在哲学史上造成革命性变革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建立辩证唯物主义。那么辩证唯物主义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一种解释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在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基础上产生的,虽然细胞是在1838年就由德国

人施莱登发现了,但恩格斯是在1858年研究生理学、比较解剖学时才知道的(见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而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是在1850年被公认的,进化论是在1858年由达尔文和华莱士共同宣布的。马克思是在1864年阅读格罗夫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时才知道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见马克思1864年8月17日给莱昂·菲力浦斯的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公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1845年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奠定基础的,当时只有细胞已发现,但他们还并不知道此事,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知道三大发现之前就诞生了,它不可能是在概括自然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产生的,三大发现是它的后证,而非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已有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是什么原因和力量推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去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呢?是源于建立唯物史观的需要,由于在实践中碰到的问题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都不能解决,于是对二者进行了批判的改造。所以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是在根据社会历史现象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为解决社会实践中的问题而制定的,就如同牛顿为解决物质运动的瞬时速度的计算问题而发明了微积分,微积分是与牛顿力学同时产生的情形相似,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辩证唯物主义是为建立历史唯物主义服务的,从因果关系来看,建立唯物史观是因,辩证唯物主义是果,所以说两者同时产生比较合

乎实际。辩证唯物主义首先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得到验证,后来才在自然科学方面得到进一步的验证,这并无任何悖理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一直关心用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来验证自己的哲学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有很多记录。马克思在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后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说,“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来看,推广说是不能成立的,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毫无疑问,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但马克思并未提出新的辩证规律和辩证范畴,因此,这只是哲学中的一个发展,并不能构成哲学革命。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总结了马克思一生中在学术上对人类的二大贡献,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是发现了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特殊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这可说是盖棺论定的了。在《反杜林论》中也是这么说的,可见这是马克思生前所认可的。他没有提到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这二者才是马克思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在哲学上众多贡献中的最高成就。把辩证唯物主义抬高到首要的地位,这不合乎实际,也非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愿,这就犹如把爱因斯坦的哲学放到首位,而把他的相对论放在从属的地位一样。

推广说之不能成立尚有另一根据,那就是唯物史观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实践发展到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抗阶级的斗争,已使经济利益对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暴露得清晰可见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显示了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马克思早年的社会实践使他认识到经济利益对政治、法律、国家的基础地位,并开始认识到黑格尔法哲学的谬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进一步批判黑格尔的基本哲学观点。所

以,真正使马克思把实践引进哲学的是社会实践,而非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异化、外化而又复归的辩证法仅仅起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思想资料的作用。可以断言,即使马克思没有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助,也将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来。一个有力的旁证就是写作《古代社会》这一名著的美国人摩尔根,恩格斯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②

推广说把辩证法置于实践之上,充当了实践的指导者,由此而产生了“辩证的”教条主义,我们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详加论述。

上面已经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辩证法而是实践,下面我们将进一步阐明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地位的仍是实践而非辩证法。实践在以下三个方面引起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1)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范围,由自然存在扩大到社会存在,即由自然扩展到人,从自然的人到社会的人,由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人,包括劳动、情感、意志、欲望等全面发展的人。社会存在不同于自然存在,它既受必然性支配又受目的性支配,由此发现了支配社会存在的新规律、研究的新方法。在现代科学发展史上,科学家进入新的领域,往往导致新规律地发现,从而引起科学革命,如当科学进入高速运动和微观领域时,就出现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引起了物理学的革命,这道理是一样的。实践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没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就不会有整个社会的存在,马克思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迳直称之为社会存在,而把国家、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等称之为奠基于其上的上层建筑,从而使社会历史成为可以从经验上观察研究其规律的对象。实践确立了物质利益在哲学中的地位,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哲学就远离人们的实际生活,直到费尔巴哈,仍把实践、物

质利益排斥在哲学之外,马克思把实践引进哲学必然要同时肯定物质利益的地位,物质利益及其特殊形式的阶级利益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实践为认识论提供了认识发生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真理的标准。回答了休谟、康德都未能解决的认识与其对象怎能符合一致的问题。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在功能上也进行了一次革命,过去的哲学远离现实生活,从事彼岸世界的上帝、理念、灵魂、物质等抽象范畴的研究,而马克思的新哲学却强调哲学要反映时代的需要,要自觉地为社会实践服务,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

(2)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了一次伟大的综合。马克思在实践范畴中一方面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又批判地吸取了唯心主义关于意识、思维的能动性、创造性原则,消解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绝对对立,而把两者的长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马克思说,“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一方面赋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有形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③唯心主义片面地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一面,而旧唯物主义则片面地发展了受动的一面,马克思在实践中看到了它既有能动的一面又有受动的一面,所以实践可以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统一起来。他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能动和受动……理论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途径,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的力量,才是可能的。”④马克思通过实践既克服了唯心主义的片面性又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片面性,所以他的哲学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旧唯物主义,同时是把两者统一起来的真理。⑤这是说,在承认自然界优先地位的前提下,在实践的范围内,思维与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的解答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实践包括认识和改造世界这两个方面,在认识过程中存在决定思维,人是受动

的,但思维也有能动性,表现为选择性、建构性。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思维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这也是受动的,但思维决定了对存在如何改变以便使它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又是能动的。过去认为人们只能按客观必然性规定的唯一方向行动,因而即使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处在被客体决定的地位,人是必然性的工具和环节,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最被人诟病的观点之一。其实不然,世界上还存在着偶然性与可能性,各种不同的必然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形成多种可能性,在人的主动设计下可以形成更多的可能性,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最有利的那种可能性。⑥我们必须坚持在最终根源的意义上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何者为第一性的答案只能有一个,即前者决定后者。决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成为一种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的“超越哲学”。

(3)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了哲学的主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表明过去的哲学是以本体论认识论为主的,这二者都是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问题,仅限于说明世界。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现代哲学就离开了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尽管他们仍不时要涉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已不再作为自己研究的基本问题了。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中就包括本体论的世界本原问题和认识论的认识的本质、来源、能力、界限、真理的标准等问题,但并不包括改造世界的问题。全部哲学主要是指古希腊哲学和西欧近代哲学,就这两种哲学而言,恩格斯的概括是十分准确的,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它们。但超出这个范围就不适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基本问题就已不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应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了,因为思维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主体,“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⑦只有人的肉体的力量才能改变物质

的对象,只有人的欲望、情感、意志协同作用,才能推动肉体行动起来。所以,改造世界的主体,实践的主体应当是现实的完整的人,而不是仅有思维的抽象的人(黑格尔的观点)或思维加上情感、意志,却仍是抽象的人(费尔巴哈的观点)或仅有劳动的抽象的人(苏联哲学模式)。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中仍包含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主体改造客体是以正确认识世界为前提的,所以必须正确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这对于解决实践的任务来说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还有一半是要靠欲望、思维、情感、意志、劳动的协同工作来解决的,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中是包括不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的。当主体以物质的力量与对象相互作用时,就可以看作是两种客体在相互作用,那就只有主动和被动之分,而无何者为第一性之别。

在马克思之后的现代哲学进一步离开了以哲学基本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他们把这称之为“形而上学”,采取了我们并不赞成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当然,现代哲学中仍有少数人搞本体论和认识论,但已不是主流,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不论是英美的语言哲学还是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哲学都并不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他们研究的基本问题,而是把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交流作为研究的中心。

由此可见,人、完整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才是哲学研究的中心,只有人与世界的关系才能成为全部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总课题的子课题,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的经济文化水平不同,科学技术水平不同,决定了哲学家们侧重去解决不同的子课题。这些子课题标志着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哲学对人本身认识的深化,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的深化,每一发展阶段中的积极成果都将保存在人类知识宝库中供后人利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一次哲学上的重大变

革,开创了现代哲学的先河,现代哲学正是循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进一步改变了研究的主题,把研究的中心转移到了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上来。哲学发展中的这一变革并不意味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已不重要了,它仍然是现代哲学都要经常涉及的重要问题,但它已不再是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了。

二、实践对于辩证法的首要地位

推广说认为是马克思引进了辩证法才使旧唯物主义发展成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我们就必须解决实践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二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各占何种位置。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由于不受事实的制约和实践的检验,常常导致歪曲事实,因而引起19世纪的自然科学家们的普遍的厌恶和唾弃。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内是很难得到纠正的,因为辩证法在他那里是绝对真理。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来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就是否定了辩证法的绝对真理的地位,其真理性要受到实践的检验,辩证法要为实践服务,充当实践的工具,从而确定了两者相互关系中实践比之辩证法具有更基本的首要的地位,实践是第一位的,辩证法是第二位的,是从属于实践的,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辩证法才能成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恩格斯说辩证法是“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马克思作出剥夺者被剥夺的结论时依据的并非是否定的否定规律,而是依据历史的和经济的规律,但杜林却说马克思的这一革命结论是依据否定之否定规律作出的,这是对马克思的歪曲。恩格斯指出辩证法不是证明的工具,而在探寻新结果的方法。^⑧也就是说,根据辩证法来研究现实问题,可以得出不止一个结论,它们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何者具有真理性。恩格斯的思想很明确,辩证法不能充当“指导”,只能充当“向导”。这是恩格斯提供的唯物论第一,辩证法第二,实践高于辩证法的一个范例。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在改变辩证法与实践的关系上起了微妙的影响深远的作用。他倡导的推广说把辩证法提高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位,辩证法由工具提升为“指导”,认为一切实际工作都要受辩证法的指导,否则就要犯错误。在“辩证唯物主义”中辩证法已成为类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或我国的“最高指示”那样的东西,辩证法实际上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人们常常在否定某种观点时说它“不合辩证法”,而对肯定的东西则冠以“辩证的”赞词。

斯大林违背恩格斯的思想,把辩证法当作论证的工具。他在解释如何把辩证法推广去解释社会历史时举例说,“既然世界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中,既然旧东西衰亡新东西生长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没有什么‘不可动摇的’社会秩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替代。”又说“既然发展是通过内在矛盾的揭露,通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对立势力的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就是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⑨斯大林在此不仅是把辩证法当作论证工具,而且是把它当作指导一切的万应灵药。开创了“辩证的”教条主义的坏榜样。一些年轻的革命者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却以此为榜样,用辩证法的公式到处乱套,这是教条主义在前苏联和我国长期盛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实践与辩证法的关系出现了颠倒,实践要接受辩证法的指导,而辩证法(包括其运用)都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在毛泽东的前期,他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提倡实践的首要的决定性作用,提出矛盾的特殊性概念,矛盾的特殊性是不能靠演绎推理来认识的,而要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来认识的。这是毛泽东把实践、唯物论放在辩证法之上的明证,他有力地抵制了“苏联哲学模式”的消极影响。但毛泽东的晚年过多地强调了辩证法,减少了对实事求是的提

倡,削弱了实践的首要地位,忽视了实践对辩证法的主导和制约作用。从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始,几乎每次重要的讲话中都要不厌其烦地提倡学习和运用辩证法,他说“关于对立面的统一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⑩在他的倡导下,全国各界铺天盖地一片学、用辩证法之声,翻来复去用几个辩证公式套到各行各业的具体工作中去,用辩证法的抽象原则来作演绎推理,有打乒乓球的辩证法、有造船的辩证法、有种田的辩证法、有××的辩证法……那里出了事故则一定是有阶级敌人捣乱,不如此就不合辩证法,辩证法不受实践制约而被滥用了。辩证法一方面是被神圣化,另一方面又被简单化庸俗化了。当时往往有人这么干时说这是符合辩证法的,而相反地干时也说是符合辩证法的,以至于到后来辩证法的声誉大降,老百姓把辩证法戏称为“变戏法”!毛泽东在晚年加强了由斯大林开创的使辩证法不受实践制约的趋势。

不受实践制约的辩证法不仅导致教条主义的学风和文风,而且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产生了严重后果。前已提及运用辩证法是可以导出不同结论的,因而必须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而不能以符合辩证法来确定其真理性。中共八大决议分析当时中国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但不久后,毛泽东就仍然认为是落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是当时的基本矛盾,要求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两者都运用了矛盾分析法,其结论在没经过实践检验之前都只能算是假设,其真理性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但在当时却由于毛泽东的权威,他运用辩证法成功的极高声誉,被人们普遍接受为真理,并加以推行。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不仅辩证法的运用应当受到实践检验,辩证法理论本身也应受到检验,例如斯大林只讲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在发展中的作用,毛泽东就曾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纠正了他的偏见,但毛泽东晚年却提倡“斗争哲学”,重新陷入斯大林的偏见之中,实践已再一次否定了这一偏见。

自1978年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否定了绝对权威、本本主义,理论作为真理的标准,实质上已经蕴含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理解上的重大进步:否定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地位,重新确立实践的首位。

三、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实践唯物主义

我们在阅读毛泽东的晚年著作和邓小平“文革”后的著作时,会发现他们在哲学上有一个显著的差别:一个是不断提倡学习辩证法,运用矛盾分析法,一个却极少谈到辩证法,却是苦口婆心反复提倡实事求是,提倡用实践来认识和检验真理。从这一差别中我们当然不能说前者只要辩证法不要唯物论,后者只要唯物论不要辩证法,因情况不同而侧重提倡一个方面是正常的现象。但辩证法讲多了可能会丢了实事求是,因为辩证法并不能必然引向实事求是,多讲实事求是却不会丢了辩证法,因为辩证法既为客观世界所固有,故实事求是必会导致辩证法。邓小平复出后面对的是经林彪、“四人帮”十年破坏的满目疮痍的中国,问题成堆,错综复杂,如何引导中国从如此严酷的困境中走出来,迈上康庄大道?邓小平首先大力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这个讨论的关键时刻,他重新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肯定实事求是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首要地位,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又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

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⑪这与上引毛泽东要求全国上下都要学习辩证法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不同十分耐人寻味,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邓小平主张“摸着石头过河”,主张“不搞争论”,没有主张依靠辩证法的指导来解决问题,这完全符合恩格斯关于辩证法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的论点。当时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邓小平不提出一整套理论来指导工作,而是要人们摸着石头过河呢?其实,这是贯彻了实践第一位的思想,是自然科学中常用的试错法。不搞争论而一切通过试验来解决问题,这是确立实践对辩证法的首要地位,因为辩证法包括多方面的因素,各人可以各执一面,各自称自己是合乎辩证法的,从而争论不休,耽误了搞现代化建设的大好时光。

邓小平关于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比喻,关于检验是非的三项标准的观点,都是指出了我们的实践不仅仅是要符合客观规律,而且要符合实践主体的需要,符合人民的利益。这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遥相呼应,马克思要求把事物、现实从实践的主观的方面去理解,就是指出不要从纯客观方面来把握事物,而要从它与主体的关系中来把握客体,把它看作实践改造的对象,实践的主体既要顺应和符合客观规律,又要使客体的改造顺着符合主体需要的方向进行。在“苏联哲学模式”中过分强调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把实践仅看作是顺应客观必然性的活动,从而把人看作是必然性的工具,使人丧失了改造客体的主体的地位。

就像我国古代的大哲学家爱用寓言、比喻来表达哲学思想一样,邓小平白猫黑猫的比喻表达了深刻的哲学思想,表明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唯一的一种必然性,而是有多种可能性可供

选择,为什么我们要把黑猫看作是唯一的无法拒绝的必然性呢?在搞高级社时说这是必然的,在搞人民公社时又说是必然的,在搞“文化大革命”时仍说是必然的。对这些虚假的必然性,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有能力加以阻止,即便是真的必然性,只要它有害于实践主体的需要、利益,我们也能找到另一些自然力与之抗衡,限制、缩小乃至消除其危害。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说,三项是非标准说中蕴含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就在于此。

实践高于辩证法,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占有首要的位置。这决不是说,辩证法是不重要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可有无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缺少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由于“苏联哲学模式”片面夸大了辩证法的作用,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我们才需要再度高扬实践的首要地位。我们在研究问题时需要辩证法作向导,但一旦得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结论,辩证法就完成了使命,不再在科学结论中作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而出现。就如大厦一旦建成就拆掉脚手架一样。

我们也决不能认为邓小平不重视辩证法,甚至认为他不熟悉辩证法。邓小平对辩证法高度熟练的运用,可以从他在一些重大决策中看出来,他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用以解决四个现代化中激进趋向与保守趋向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制约,使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在稳定中得到发展;他用“两手硬”来解决精神文

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中的矛盾;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办法来解决由于长期的平均主义所造成的普遍贫困;他用一国两制来解决港澳台的问题;用市场经济来解决供需矛盾和资源配置中的矛盾。他对辩证法运用之精微奥妙并不亚于毛泽东。邓小平只是继承马克思和前期的毛泽东把实践、唯物论置于辩证法之上罢了,并非不要或不重视辩证法。根据以上理解,我们认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和宣传实践的唯物主义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

③④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0、80、120页。

⑥参见拙作:《自由是认识 and 实现一个可能的世界》,《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⑧《反杜林论》第132页。

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75年人民出版社,第122—12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⑪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4、143页。

作者吴启文,江苏无锡轻工大学教授
(214036)

责任编辑:冯 生

坚持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论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思想

□田 丰

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邓小平同志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个思想不仅融贯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部分,而且体现在我党新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深入阐发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将使我们更深刻认识和自觉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

一、社会主义是历史选择和价值选择的统一

人类社会进步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价值的选择。唯物史观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生产力运动发展决定的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同时,它又指出社会规律是人的活动的规律,社会发展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的不同动机的活动形成的合力所推动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的需要看作是历史的前提:“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①因此,在唯物史观那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与人的需要是统一的,历史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人的受动性和主动性是有机统一的。邓小平同志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凡是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必须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反映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生产力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同时反映主体的内在需要和利益,为主体的物质文化生活改善和能力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价值的选择。唯物

史观创始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已容纳不了在其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它必然要被更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而且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人的异化,造成了广大劳动者被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境况,造成了社会道德的沦丧。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人重新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他们自身的主人。在唯物史观创立者那里,资本主义不仅受到冷静的历史批判,而且受到愤怒的价值批判。历史发展规律与人的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由于唯物史观的创始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拨去笼罩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用抽象的人性阐释历史的唯心史观的迷雾,因而他们更着重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邓小平同志则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的阉割和扭曲阐发社会主义对人民的价值,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的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②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更要重视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这两大任务。他说:“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富裕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一定要以人民富裕为目标,合格的社会主义,应是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改革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价值的选择。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标志着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但并没有结束这个过程,当已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利于人的积极性发挥的时候,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就成为第二次革命。邓小平在1980年就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但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造就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改革越深入,社会主义的多重价值目标越不能偏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是正确的,因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④同样,改革开放之所以不可逆转,改革开放的政策之所以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也在于改革开放把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兼顾起来,适应了强国富民的历史要求。

二、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思想是邓小平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是我们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是他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战争和生产结合论”是邓小平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思想初步表述。从1941年到1945年,邓小平同志先后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务,在抗战最艰苦阶段,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提出了要把抗战、生产、教育结合起来的思想,他说:“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抗战、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是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⑤因此,他在抓好对敌战争、军队的思想教育的同时,高度关注减轻人民负担问题、救灾问题和粮食、食盐、棉布等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等问题,在极其残酷艰苦的斗争条件下念念不忘人民群众生活和福利的改善,正如他所说的:

“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⑥

“猫论”是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思想深刻而形象的表达。由于革命胜利和解放初期三大改造、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党的领导中逐渐产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使农村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加上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人民群众生活极其困难。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一员的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遭到的挫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当1962年许多农村的干部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他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提出了这样一个原则:哪种生产关系的形式在那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那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那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用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四川土话来表达这个思想。根据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选择生产关系的形式,是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性质和水平的客观规律出发,根据群众的意愿选择生产组织形式,这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的价值取向出发,从客观规律出发与从人民的价值取向出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体现这种一致性才是正确的,应在实践中推行和贯彻下去。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邓小平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思想进一步发展并且系统化的时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确定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发展战略和衡量标准时始终坚持了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三步走战略”、“三个有利于标准”等论述中。

在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上,坚持从实际出发和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统一。邓小平同志认为,无论搞革命和搞建设,都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然而中国底子薄,人口多,社会主义仍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仍很低,改变这种落后贫穷的状况,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因此,他果断提出要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提出要通过允许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全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出现政治风波,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倒台时,小平同志处变不惊,坚持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那就是把经济搞上去,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事实证明,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由于坚持从实际出发和人民利益出发，唤起了广大群众的改革和建设热情，从而成为亿万人民自觉拥护、参与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在逆境中奋起提供了宝贵经验。在这个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精辟地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现代化发展战略上，坚持经济发展目标和人民生活改善目标的统一。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构想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使之完善。这著名的“三步走”战略就是：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可见，每一步都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目标。为了实现“三步走”的宏伟蓝图，邓小平同志强调在政策措施上要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

一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邓小平不仅逐个规定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方针，而且从整体战略上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目的，是改变落后贫穷状态，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因而是硬道理；稳定，包括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稳定、人民生活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一定的阶段，“稳定压倒一切”。现代化建设每前进一步都遇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使三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三步走”的战略就能逐步推进。

二是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正如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没有一定的速度就谈不上效益。特别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起步较晚，国民生产总值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追赶原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前提，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抓住历史机遇发展自己，“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同时，小平同志又强调加速发展“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⑦任何时候都要把效益放在第一位。他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几次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盲目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的供求失衡和比例失调，严重影响人民生活的教训，指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⑧把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辩证

地统一起来，速度和效益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是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然而由于“左”的影响，我国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尽管发展速度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改善不大，生活的需要在“革命”、“政治”的名义下被漠视、被压抑。邓小平严厉批判了“穷过渡”、“穷革命”的谬论，强调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要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每走一步都要给人民看得到、摸得着的实惠。他在1980年针对干部队伍中思想解放不够的状态指出：“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应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在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⑨为了使生产和生活相协调，必须安排好经济建设中的各种比例关系，包括农业和工业的比例，农林牧副渔之间的比例，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交通能源通讯与其他产业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此外，特别要处理好经济发展和教科文卫事业发展的比例，多年来教科文卫的费用太低，不成比例。在强调搞好人民生活的同时，他又提出要长期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反对急于搞福利国家的政策。“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⑩

在衡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是非得失上，坚持历史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真理观向历史观再向价值观的延伸，是邓小平同志指引我党对现代化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进程。70年代末，为了冲破“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把人们从思想僵化、“个人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发动和引导了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党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观。进入80年代后，改革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部改革向包括城乡的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深入，为了澄清在改革得失成败看法上的各种困惑，推动改革开放迈开大步，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在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党的十三大文件中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察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个标准反映了实践的客体尺度，是实践标准在历史观领域的体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随着改革向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产权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

存”的分配制度的深入,随着公平问题日益成为社会注目的热点,改革的性质是“姓社姓资”议论不绝于耳,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否继续推向前进的实践问题。已退休的邓小平同志带着这个问题,以近90岁的高龄视察南方,从南方特别是特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吸取了理论升华的激情和源泉,系统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标准中的一项,从而使标准完整地体现了实践和实践标准的本质特点:主客体的统一,反映在社会历史领域就是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把价值标准补充到衡量改革是非得失的标准涵义中,是邓小平同志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1980年他就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⑩1983年他又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⑪如果说,生产力标准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那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则为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阶段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于解放思想的强大作用,不仅在于它是判断、检验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工作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否有利的标准,也是判断改革开放对不对亦即姓社姓资的标准。就是说,不仅判断得失,也判断是非。理由在于:(一)小平同志南巡发表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是为了解决这个困惑的,他开宗明义地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二)“三个有利于”的内涵与小平同志阐述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是一致的。“三个有利于”的论述中提出的“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实质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三)“三个有利于”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割裂“三个有利于”的内在联系,从中孤立抽取一个方面的标准来衡量事物,既把握不准标准的内涵,也说明不了事物的性质。只有用联系的观点来理解“三个有利于”,才能在当前产权制度改革等难题上走出困境。

三、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于人民主体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

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⑫不能只从客体方面,而要从主体的方面、实践的方面去理解事物、现实,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实现哲学伟大变革的奥秘所在。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继承发展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坚持了实践的观点,人民主体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实现了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科学统一。

实践是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的基础。列宁说过,生活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第一的观点。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贡献,首先是恢复和验证了实践的权威;用实践的观点冲破思想迷信,提倡解放思想;用实践的观点总结历史经验和群众经验,创立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用实践的观点制定和完善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排除各种“左”和右的干扰,使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正如他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的:“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⑬首先,坚持在实践中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和价值。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不是靠本本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是通过“试验”不断总结经验形成科学认识的。他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很大的试验”,把广东等地建立特区说成是“杀开一条血路”,提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当然,试验不是蛮干,而是摸着石头过河,“要探索前进”。在试验中难免有错误,关键是“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正是这样,我党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从知之不深到形成理论体系,大大丰富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之后说过:“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⑭其次,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政策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使之造福国家和人民。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来自实践又

必须回到实践,在付诸实践中检验它是否正确,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由此修正理论和政策,不对的赶快纠正,该完善的把它完善起来,正确的有效的要坚持下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①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长期坚持不动摇,因为它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效的。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①⑦}再次,坚持实践检验的过程性和辩证性。由于实践检验受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条件、程度的限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以及它对主体的效用的显现有一个过程,而主体对它的认识和利用也需要一个过程,因而实践检验具有相对性、不确定性的一面。对于改革实践中一时还看不准的新生事物,邓小平同志主张不要急忙下结论,更不要因噎废食,而要继续“试验”。比如证券、股市,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小平同志认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点,也可以慢点,也可以留一点尾巴。”为了让“试验”有一个宽松的氛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不争论”的原则:“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①⑧}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充分展示了他尊重实践,深刻把握实践本质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思想。

人民群众是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的主体。人是实践的主体,是社会历史运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统一的承担者。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挥了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思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认真体察人民的意愿,高度关注人民的利益,充分发挥人民的历史作用,牢固确立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人民的利益既是历史规律的反映,又是历史运动的动因和目的,在这个交汇点上,真理和价值结合起来了。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①⑨}人民是认识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主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正确,就因为它是亿万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他对十四大报告

送审稿的意见时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②⑩}人民又是对现代化建设价值判断的主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只有反映亿万群众的利益,得到他们的认同,才是好的方针政策,才能坚持下去。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的鲜明的革命风格就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群众这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的地位,决定了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②⑪}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无非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就是正确反映群众的意见,然后正确地领导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要做到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引导群众和依靠群众的一致。

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是一个辩证的矛盾运动过程。邓小平同志过人的智慧,就在于他从世界的高度、历史的高度把握历史观和价值观的辩证关系,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效率和公平统一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之中,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互相促进的发展观,提出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带动全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公平观,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既以超常规的速度发展,又在总体上避免了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早期出现的道德危机,两极分化的痛苦过程,使中国终于走上了以生产力迅速发展为基础的共同富裕、文明进步的康庄大道。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33页。

②③④⑦⑧⑫⑬⑭⑮⑯⑰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10、142、373—375、139—140、23、382、91、28、83—84、374页。

⑤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5、80页。

⑨⑩⑪⑲⑳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6、258、314、148—149、45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⑳《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21页。

作者田丰,广东省社科院博士研究生(510620)

责任编辑:冯生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双重贡献

□王振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近20年里，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产物——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作为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作为运动着的社会主义理论，究竟如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真谛？如何昭示未来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新的更大发展？在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新情况大量涌现的今天，对之加以科学把握，显得尤为重要。

一、从现实到原则而非从原则到现实，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贯穿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

认识自然和社会是自人类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的。不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之前的认识方法多是本末倒置或孤立片面的，因而，结论不可能是客观准确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后，人类才真正开始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把哲学从“天国”拉回“人间”，把事物由“孤立”视为“联系”，而且确认，哲学，是从现实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它不是上苍或灵魂的杰作。据此，他们开始了对当时社会的艰难剖析，并进而构画出未来社会的蓝图。对当时社会的剖析，由于他们方法论的正确及亲身履历与实践，可以说淋漓尽致，维妙维肖，但对未来社会，他们却不肯作出详细的具体描述。因为，他们的科学方法论提醒他们，在历史未发展到为理论提供可供论证的充分的素材之前，设想得越详细，差错就越多。尽管如此，今天看来，他们所设想的仍然与现实存有出入。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任何思想都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对客观

世界的一种认识，在一定条件下，它只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不能穷尽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层次。黑格尔说过：“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①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的必然发展阶段，当然更不可能是一两个哲人头脑的产物。社会主义的构建决不会像盖楼房那样，可以按照工程师事先拟好的图纸不折不扣地进行。如果硬要把活生生的现实纳入原则的巢臼里面，把历史和社会当成随意折腾的玩物，就必然使社会主义的路子越走越窄。恩格斯针对杜林“原则在先”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指出：“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要想让理论真正成为指导实践的好理论，就必须花大力气深入到现实之中，本着为现实服务的宗旨，去挖掘顺应时代潮流，促进历史发展的真理。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系角度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的一个基本环节，确切地说，它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形势下的科学社会主义。中国要发展，要前进，必须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少走弯路，必须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②由此，邓小平树立了自己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实事求是的活灵魂，而不是死记硬背经典词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学习他们如何对待社会，如何发现真理，学习他们的治学态度，学习他们认识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仅仅背诵其个别词句；马恩的已有结论只是我们作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而不能仅仅是照搬照套；实事求是的理论只能用实事求是来维护，唯物辩证法只能用唯物辩证法来捍卫。即是说用发展的观点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提倡的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贴近现实、指导现实的活理论。在这方面，可以说邓小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传。

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社会主义理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发展的理论。它固有的本质要求就是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反对任何形式的凝固化和教条化的倾向。恩格斯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指出：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非常重视这句名言，并且告诫人们，谁要忽视这一点，“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③社会主义理论的这一本质特征，是其在实践斗争中永远保持青春活力的源泉。

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我们已经提出了十多年，可以说，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开始了。应当说“再认识”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在这一科学态度指导下，我们突破了一系列理论误区，并在实践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再认识中产生、发展、壮大起来的。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

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④进行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目的和意义，是按照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针对变化了、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对社会主义的特征作冷静的、客观的、透彻的、科学的、全面的分析研究，使其适应时代的发展并指导时代继续发展，以恢复社会主义理论的真正权威。在这里坚持和发展主要包括三层意思：其一，要把过去被误解和扭曲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纠正过来，结合当代实践，探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其二，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以新的实践新的经验，充实和丰富原有的基本理论，使其更加完备、更加符合时代精神，把坚持与发展结合起来；其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改变某些已经过时的旧传统旧结论，代之以新的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观点、新结论。坚持与发展二者是不能分离的。首先是要坚持，坚持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坚持就不可能有发展；但只有发展才能坚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⑤可见，能否坚持特别是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根本。

现实究竟为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哪些条件与内在的动因呢？首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崭新的事业，本本上没有现成答案。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注定是没有出息的。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解放思想，就如同让一个捆绑着的人快跑一样，是不可能奏效的。历史选择了邓小平。邓小平以其伟大战略决策家的胸怀，在关键时刻作出了决策，使伟大的实践活动有了明确的理论指导。其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模式可以借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

建设进程中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去回答、去解决。用什么思想原则指导经济、政治和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怎样处理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怎样理解计划与市场的作用与关系？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与技术？等等，如果坚持旧的一套理论体系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遭到各种阻力，就会困难重重，就不可能取得新的进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实践性、战斗性，马恩如此，列宁如此，毛泽东如此，邓小平更是如此。邓小平的理论不是在书斋里推导出来的，它的每一条都具有强烈的实践烙印，是其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或者是在实践之后总结出来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特区建设思想、一国两制思想都是如此。这也是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动性、亲切性和可操作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邓小平同志在理论上倡导不崇拜经典的求实精神，在实践上倡导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引导着中国的改革一浪高过一浪地推进。理论与实践遥相呼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力标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与交往，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产权制度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既是理论的突破，也是实践的结果。可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科学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所取得的一些重要思想理论成果，而且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理论勇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突破性地发展了他们的理论。

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方法。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社会主义

理论发展的结果，又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前提，它不仅不会终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内含着的突出价值——方法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导向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从来都没有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不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多少现成的答案，而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科学的目标、道路与方法。同时，必须敢于解剖自己，改正错误，不断纠正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不适当的理论原则，从而建立起理论的自我更新机制。

——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是伟人，但不是圣人，他们的思想与理论观点也有失误与缺陷，如果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囫圇吞枣就必然陷入教条主义、凡是主义的泥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泉，活生生的社会实践是创造理论的大学校，来自实践的理论才最有说服力，最能指导实践。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冲破“条条、框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一切进步的科学成果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吸取的营养，一切思想与流派都可以给它以启发，马克思主义不拒绝任何对自身、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学说与观点。

——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本国实际、本地实际结合起来，掌握本质，灵活运用。社会主义不具有统一的模式，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也不是封闭的、凝固的，它没有穷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没有终结真理，而是“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和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是当今人类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科学理论,就是因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产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整个理论体系,还是其中的每一条具体理论,其提出、形成、完善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如此。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以说只是作出了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初步”就表明了大有向前发展的必要和可能。现实的确如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在不断向前发展。在推进改革开放,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正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我们研究解决。譬如,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好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问题,如何做好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体制建立问题;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中有效地抵制国外腐朽东西的侵蚀问题;如何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分析研究,提出正确答案。即使当前遇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解决了,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继续深

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还会出现更新的情况和问题。对此,我们应继续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加以研究解决。这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发展的不断推动下不断地向前发展,从而永葆其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方法。其方法论的价值主要在于引导改革思路,拓宽发展视野,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循着这一思维方式创造新的理论。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一科学的方法重视还不够,研究还不深入,必须重申,邓小平给予我们这个时代的,不仅仅是几条冲破条条、框框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而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武器,它不仅可以在指导当今,而且可以昭示更久远的将来。这一理论为实践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也为理论开辟了发展的空间。邓小平从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方法论的贡献价值更大,影响更久远。

①《法哲学原理》第12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第398页。

④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143页。

作者王振海,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50002)

责任编辑:冯 生

论合作型企业员工关系的处理模式

□刘 昕

企业性质理论的发展使得经济学的触角从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市场深入到了企业内部,该理论揭示出,由于企业实际上是不同资源所有者之间的一种合约,因而在企业运转的过程中,企业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不可避免地会有牺牲企业利益追求私人利益的倾向,因而监督和激励就成为企业保持高效率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不过,在有关企业性质的讨论中,通常强调的是企业家的地位以及对监督者的激励问题,对他们的主要激励手段一般认为就是使他们成为剩余索取者。对其他企业劳动者的激励问题,企业性质理论未作过多的论述,但隐含的假设是依靠监督者的计量和监督功能来解决这一问题。很显然,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将企业家或经理人员之外的其他企业劳动者看成是被动的激励对象,激励的手段不过是根据劳动成果支付不同的报酬而已。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企业中除企业家或经理之外的其他企业员工的激励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企业能否对员工实施有效的激励,成为决定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其一,随着资本市场的发达与完善,人力资本的相对价值大大提高,所以,能否充分动员和发挥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将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市场竞争地位。很显然,这种人力资本不仅仅是指企业家或经理人员的人力资本,还包括其他企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这一点在现代高科技企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力资本价值的提高通常是与创造性劳动的增加联系在一起,而对创造性的劳动往往比对简单的重复性劳动更难以实施监督。其二,现代经济正在经历一个由产品型

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的过程,而服务型经济与产品型经济有两点很大的不同。第一,在服务经济中,雇员的工作活动对企业的经济效益所产生的影响更加直接,因为他们是在与顾客进行面对面的接触,他们的工作质量不仅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当前经济效益,而且会对企业的长期市场竞争力产生进一步的作用。第二,对服务性雇员的工作活动监督起来更为困难。因为服务是一种过程,因而对服务往往不可能像对产品那样经过检验之后再拿到市场上去,要对服务进行监督就必须监督整个服务过程。这样,在服务经济中,如果继续强调监督的效力,以监督作为提高生产率或服务效率的唯一手段,那么,监督的成本也许是企业难以承受的。

总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管理人员的监督、计量活动实现对企业员工进行有效激励的观点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了。这也同时意味着,建立在计量和监督基础之上的简单的物质奖励的激励效用也变得越来越小。要想对企业劳动者实施全面的激励,企业就必须制定出一整套的制度安排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的应对措施。这种制度安排就是企业员工关系处理模式的制度选择。

企业员工关系处理并不是一种对付不良事件的善后措施,而是一整套以协调、调整企业内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一系列契约(这种契约可能是有明文规定的,也可能只是一种心理契约)安排。从理论上讲,劳动生产率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而劳动生产率有赖于工作的有效组织以及素质一定的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因而,企业管理方的主要任务是争取使员工的努力程度得到最大的发挥。要使企业员工能够做出最大

的努力,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强迫,二是引导。对员工激励手段的选择形成了两大基本的企业员工关系处理模型,一种是冲突模型,一种是合作模型(罗勃特·布切利和杰恩斯·科瑞斯坦森,1992)。

冲突模型是以劳资对立为基本假设的。该模型认为,劳资双方有着根本的利益冲突,劳动者总是“懒惰的”,如果不加以“强制”或“施加压力”,劳动者是不会自发地努力工作的。由于在劳资关系当中,资方往往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资方总能以强迫的方式迫使劳动者提高生产率。这一模型的基本逻辑是,劳动生产率来源于工人的工作努力程度,而工人的工作努力程度又是从他们害怕失去工作的恐惧心理中产生出来的。在失业率较高、工人的权利比较小的情况下,工人失去工作的成本较大,工人一般不愿意失业,因此,在这些时候,他们的工作会更加努力,劳动生产率就会比较高。反之,在失去工作的成本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比较低。

冲突模型的批评者认为,对企业员工采取强迫这种反向激励手段是得不偿失的。其一,失业的威胁一般仅对次级岗位上的工人有效,企业重要岗位上的员工往往都享有就业保障权(这种工作保障权可能是由工会的资历政策决定的,也可能是因为企业特殊培训或员工的特殊技能所导致的)。其二,在现代生产过程中,个人的努力或个人努力的总和对企业总生产率的影响已经不那么大了。生产率的关键在于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工人工作努力程度的提高再加上对企业各部门工作活动的合理组织与协调才会导致最终产出的增加。

合作模型则认为,对企业员工的激励宜以正向激励为基本原则。其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企业的资方与一般员工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纯粹压力式的监督和激励根本不可能杜绝员工在生产活动中的偷懒现象,因而减少怠工现象的最好办法不是压制和惩罚,而是正面的引导和激励;另一方面,现代企业的生产活动(广义上的)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对工作的组织

与协调,而工作的有效组织只有在工人参与与合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合作模型的基本前提是,工人参与与生产的组织有关的决策会大大提高生产率的增长率。

当然,员工参与企业生产活动的组织方面的决策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它要求至少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使工人能够从企业的长期成功中获得相应的利益,从而使员工不仅有参与的机会,还能有参与的动力。第二,必须使工人不会感觉到因为参与而受到报复。在实践方面,这两个条件通常是通过利润分享和长期雇佣来实现的。

从企业管理实践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的状况比较类似于冲突模型,在当前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模型则似乎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劳资关系更类似于合作模型,而美国的劳资关系更类似于冲突模型。^①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往往是同“血淋淋”、“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语)即使是泰勒的科学管理也同样是以强制和简单的物质奖励为主要激励手段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人理论被社会人理论、复杂人理论以及自我实现人理论所取代,X理论被Y理论、Z理论所取代,企业在管理实践上越来越趋于人性化管理,和谐的企业员工关系成为贯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与实践的一根主线。

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日本是以劳资关系和谐而著称的,日本企业员工对企业各种决策的广泛参与、劳动生产率之高也是举世闻名的。不过,应该看到,这种广泛的劳资合作是有其制度基础的:终身雇佣实际上是企业和员工之间订立的一项长期雇佣合同(尽管这种合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一种隐含的默契),是企业不在困难时期解雇员工的一种承诺,这不仅使员工个人的经济状况与企业的长期竞争结果联系在一起,而且消除了员工可能产生的对参与管

理的不利后果的后顾之忧；年功序列、利润分享则使得员工可以从企业的长期发展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分享参与的成果；各种培训计划、工作轮换、内部晋升、员工建议制度以及质量圈、全面质量管理计划等则从实际措施方面保证了工人参与制度的有效实施。此外，日本独特的企业内工会对于劳资关系的和谐和员工参与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日本经济学家伊丹敬之将日本企业的总体特征概括为“人本主义”，^②以区别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企业，笔者认为，这同样可以作为对企业员工关系处理的合作模型的基本概括。

与日本相比，美国的劳资关系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较差的献身精神、较短的工作稳定时间、较高的流动频率是美国企业员工的真实写照。在美国历史上，劳资矛盾激化甚至流血冲突的情况都并不鲜见。^③尽管在不同时期，也都有劳资合作的提法或某些做法（如工人参与管理、利润分享等），但由于缺乏完整配套的制度保障，往往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合作式的劳资关系尚可以维持，一到了衰退时期或萧条时期，这种关系便转为对立和冲突关系。

从最新的发展趋势来看，合作式的企业员工关系处理模式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主导趋势。尽管日本的传统雇佣关系处理模式受到了社会文化变迁、劳动力人口结构变化、国际经济波动对本国经济影响增大、国际竞争压力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企业仍然没有放弃原有的员工关系处理模式，而是力图通过更多地雇佣临时工、季节工、非全日制工等措施对付经济的波动。不仅如此，日本企业在世界各国的合资或独资工厂中也较为成功地推行了本国的企业员工关系处理模式，从而使日式企业员工关系处理模式向外国移植的前景更加看好。

即使是在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上台之后，也提出了在企业劳资双方之间建立“伙伴关系”的主张。这种主张的基本内容是，工人和企业应本着平等和信任的态度，共同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分享信息和福利；利用工人参与的伙伴关系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人的利益要求，以充分

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通过工人的参与来加强企业内部的民主化。这种劳资合作的主张实际上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现实（劳动生产率长期低速增长、就业压力增大、国际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大量裁员以提高竞争能力、集体谈判呈下降趋势等状况）的一种迫切要求。^④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边提到的，合作式的企业员工关系是一种双边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要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作保证，而且要靠长期的合作实践才能建立起来，缺乏系统的配套制度或任何一方的不信任或不合作都会导致合作关系的毁灭。

上述对企业员工关系处理模式的分析对我国的改革实践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随着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我国的企业员工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大量的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之后，原来建立在利益一体化假设基础之上的旧的企业劳动关系已经完全失去了其意义。在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之后，国家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关系也已经不再是那么直接和具体了。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更多地同其所有企业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旧有模式已被打破而又无章可循的情况下，企业内部员工关系的处理就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在我国目前的体制转轨时期，一些企业在员工关系的处理上采取的是对立和压榨式的做法，但是，无论是从现代市场经济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要求来看，还是从我国的社会文化传统、劳动者的企业归属意识方面来看，合作式的企业员工关系管理模式无疑都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但是，在建立这种合作模式的时候，必须解决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必须转变对经济发展中劳动者个人的看法。尽管可以把劳动当成一种生产要素来看待，但不能忘记，人力资本是一种特殊的资本，这种资本因其特有属性而需要全面的积极的激励才能发挥最大的生产力。其二，必须建立合作与员工参与的完整的制度保证，应将其放在战略地位上去考虑，而不能仅仅把它当成是一种临时性

的应急措施。这里还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假设，那就是，企业制度本身首先是要符合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企业目标和企业行为是端正的。

最后，笔者想要强调的一点是，即使是日本的合作式的劳资关系也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它也是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劳资冲突之后才成为劳资双方的理性选择的。^⑤我们希望中国的企业一定不要在劳资双方发生普遍的大规模冲突，闹得两败俱伤之后，才想起来合作的好处。国外的经验应当能给我们一点借鉴。

^①罗勃特·布切利和杰恩斯·科瑞斯坦森(1992)将员工在企业供职时间、监督人员和生产工人的比例以及奖金占劳动报酬的比例等三项因素作为衡量企业员工关系的标准，然后把它们合成为一项指标，以观察各国企业员工关系是冲突的，还是合作的。最后得出的结果是，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七国中，美国的企业员工关系是最接近冲突型的，而日本的是最接近合作型的。原文出处请参见参考文献。

^②伊丹敬之，《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体制》，见《现代日本企业制度》中文版第43—6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

^③在几乎任何一本关于美国劳资关系的教科书上都可以见到这方面的内容。

^④苏拉恩·肯泽尔曼·史密斯(1995)在对美国小型钢铁企业的成长和联合钢铁企业的衰落进行对比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内部合作，即灵活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合作性的劳资关系体系(长期战略和制度性的安排，而非临时性的措施)，促进了小型钢铁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而大的联合钢铁企业在竞争中

的失败主要应归咎于僵硬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历史性的劳资冲突逻辑。原文出处见参考文献。

^⑤例如，在20年代和30年代，日本曾发生过多起反对集体解雇的罢工。二战之后，日本劳工运动也曾迅速增加。在1959年和1960年，还曾发生了米科煤矿流血罢工事件。

参考文献：

1、Keisuke Nakamura and Michio Nitta, “Development in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in Japan”,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Economy*, The MIT Press, 1995, P325 – 357。

2、Robert Buchele and Jens Christiansen,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ons to Labour Studies*, Academic Press, 1992, P77 – 97。

3、Suzanne Konzelmann Smith, “Intern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ve success: the case of the US steel minimill sector”,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9, P277 – 340。

4、Tatsuro Ichiishi, “Elements of the theory of the firm”, *The cooperative nature of the fi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 – 23。

5、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P71—79。

6、今井贤一、小宫隆太郎《现代日本企业制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

7、青木昌彦《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商务印书馆，1994年。

作者刘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100872)

责任编辑：谭湛明

对伪劣商品市场不合作博弈的解释及对策*

□李新春

我国的消费品市场严重缺乏竞争的秩序，“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侵犯消费者权益。本文从合作博弈和信息经济学的逆向选择角度以及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合作行为分析“假冒伪劣”产品存在的原因，“假冒伪劣”产品的外部性将部分或全部地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必须有一系列的市场补偿机制和组织来完善市场，阻止“假冒伪劣”产品对市场的侵害。

一、逆向选择——市场失灵的问题

信息经济学中给出一个次货市场的模型，这是由 G·阿克诺夫 1920 年在《经济学季刊》发表的“次货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一文中提出的。由于消费者对产品信息了解远比厂商为少，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服务上难以区分优质品和劣质品。

假设货架上有 A、B 两个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A 为优质品，B 为劣质品；A 的边际成本为 C_1 ，B 的边际成本为 C_2 ， $C_1 > C_2$ ，A 希望售价为 P_1 ，B 为 P_2 ， $P_1 > P_2$ ，这是合理的，因为 A 质量高，但由于消费者不掌握信息，不能区分 A、B（设消费者在买回 A、B 使用后方能辨出优劣），这时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为 P ，如果 A、B 各出产的量占市场的份额分别为 q 和 $(1 - q)$ ，则：

$$P = q \cdot p_1 + (1 - q) \cdot p_2$$

这是次品市场在严格抽象下的结论。这时的均衡点何在呢？因为 $P_2 < P_1$ ， $0 < q < 1$ ，所以， P 是小于 P_1 而大于 P_2 的。而 A 优质品在 $P < P_1$ 的售价时的供给将为零，而 B 产品则在 $P > P_2$ 的价格下获得额外利润： $W = Q_2 \cdot (P -$

$P_2)$ ，其中， Q_2 为 B 产品的销售量，这是通过次质产品的外部性所获取的超额利润。

这时，显然只有 B 愿意在价格 P 下提供产品，这也就意味着，消费者在这时获得的只能是次品，所以，高于 P_2 而低于 P_1 的均衡价格 P 是不能起作用的，因为，这时价格 P 无疑区分开了优质品和次品，在只有次品在市场上出售时，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为 P_2 ，因此，最终的市场均衡结果是只有次品供应，优质品被排挤出去，从而，形成了“劣品驱逐良品”的现象。H·范里安在《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中指出：“……这种逆选择可以变得十分严重，以致完全摧毁市场。”

现实的市场上，大多是优质品和劣质品并存的情况。而现在的问题是，消费者与厂商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劣质产品所散发的外部性就可能使得市场竞争的价格机制失灵。因而，现代经济发展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修正市场失灵而可能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如各种认证机构和质量检验机构，这在信息经济学中，可以认为是一种“贴标签”的工作；还有通过立法来确立市场竞争的规则和惩罚机制等等。在我国目前的消费品市场上，“劣品驱逐良品”的现象尽管没有完全地摧毁市场，但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竞争的秩序和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二、短期行为下的不合作战略

如何理解我国目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的现象呢？仅仅把它解释为缺乏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恐怕很难说明问题。因为，如前面关

于次品市场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所表明的：在“劣品驱逐良品”的外部性问题上，竞争的市场是部分或完全失灵的。把它归罪于法律不完善或执法不严甚至归结为一些执法、检察部门的腐败（如接受贿赂等），显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用法律或政府部门的其它强制性措施来解决“假冒伪劣”不仅成本高，而且只能是事后的控制（惩罚）机制，另外，法律总是可能有漏洞可钻或在利润丰厚时，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者认为冒违法的风险是值得的。这提醒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理解劣质品现象的原因。下面以合作博弈模型来分析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将市场上进行交易的买卖双方看成是对策博弈的伙伴，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行为可以认为是双方的合作问题。卖方的选择是在市场上出售真的产品。或出售“假冒伪劣”产品，而买方的选择为购买或不购买。进一步简化为：卖方出售真产品为合作行为，而出售“假冒伪劣”产品则为不合作；买方购买为合作，不购买为不合作。这样，问题就变成买卖双方在市场交易中的合作问题。支付矩阵为：双方合作时，各得1分（各得所需），交易完美实现；在买方合作，而卖方背叛（不合作，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时，卖方占便宜，得2分，而买方因为买进了“假冒伪劣”产品，遭受损失，而得-1分；买方不合作时，不能完成交易，双方都是0分。这里，卖方可以是罗伯特·艾克斯罗德合作进化模型中的“小人”（参考：艾克斯罗德，1996（1984）），在他选择“背叛”而对方合作时，可获得高分2分。而买方选择不合作，将对对方并不造成损害（假设有无数的购买者和供应者）。因此，买方并不能选择“小人”策略而占对方的便宜，他至多能在多次（连续）博弈中选择“一报还一报”策略，即：在第一次买进“假冒伪劣”产品后，下次将选择不合作战略（不购买），而转向选择其它厂商的产品或服务。

在双方都具备产品或服务的完备信息的情况下，博弈就没有意义。因为，这时，定价将是确定的（上一节已说明）。实际上，这里，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卖方具备完备的产品或服务

的信息，而买方则不具备。显然，这属于信息不完备下的博弈问题。假如，市场上，获取特定产品或服务有关信息的成本太高，则买方要么购买（合作），要么退出交易，而重新在市场上寻求其它的供应商。这样，尽管市场可能是买方市场，但卖方完全可以通过信息偏在而“以假充次”来背叛与消费者之间的合作，以获得背叛对方合作的高分。艾克斯罗德的进化模型实验结果表明，在连续博弈下，双方的合作将是最优策略，在双方都可以对对方的“小人”背叛进行惩罚（在下次采取背叛）的情况下，“一报还一报”的善良策略将战胜其它策略而得以生存进化。但在博弈双方的数量都足够大的情况下，合作就很难形成，因为，这时，实行“背叛”策略而逃脱惩罚就是可能性很大的，不合作的得分就会明显高于合作的得分。另外，艾克斯罗德的模型还指出：在博弈次数很小时，不合作将是最优策略。

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的“假冒伪劣”产品现象。对照我国市场秩序的状况，可以认为，“假冒伪劣”现象是我国产品市场上存在着有利于厂商与消费者之间不合作行为的利益驱动机制，其隐含的意义在于，就消费品市场来说，任何一种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数量和厂商数量都足够大，产品的质量、性能或其它特征高度同质化，从而，使得购买行为近似于“一次性交易”，即：博弈次数很小，这时，卖方利用自己信息偏在的优势而实行“背叛”顾客的策略就是最优的。另一方面，消费者也缺乏有效的惩罚卖方“背叛”行为的力量，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诉诸于法律显然成本太高，仅在极少数场合下是值得的。

如果这一解释是合理的，则经济地解决假冒伪劣市场的途径在于提高卖方“背叛”合作的成本，在背叛的边际成本高于或等于他在博弈支付矩阵所得的边际收益时，“背叛”就会消失，这也就等于提高了合作的激励。这里，“背叛”的成本不仅仅等于对背叛的法律或其它行政惩罚，而主要还在于其市场地位的丧失，即：失去消费假冒伪劣产品或服务的市场。

三、对付次货市场——区分自己

在阿克洛夫的次货市场模型中,假定消费者不能区分真次商品,由此产生的逆选择行为将导致“次品排斥良品”的现象,严重的情况下,还将完全摧毁市场。现实中的市场总是不同程度的良品和次品的组合(次品率不可能为0),因此,现代的市场制度安排中,厂商将市场中次品的外部性可能带来的风险部分地或全部地内部化进来,如企业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售后服务就是这样一种补偿机制,这使得消费者在购买合作中不必承担次品的风险,这是企业采取合作态度的转移消费风险行为。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是,在真品和“假冒伪劣”产品并存的情况下,生产真品的企业将由于次品的外部性而遭受损失,因此,生产真品的厂商就存在一种动力将其产品与“假冒伪劣”产品区分开来,在信息经济学中,采用的方法被称之为“发信号”(signaling),最常见的方式如:企业给用户购买的产品提供一定时期内的保修或替换准许(如果质量、性能上有问题,则可在一定时间内替换),出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厂商显然无法提供这些保证,这尤其是对于耐用消费品来说,无疑是向用户发出了一个信号,将自己与“假冒伪劣”产品区分开来。这里,特别提到耐用消费品,这是因为对于易腐品和服务则难以提供这种“保险”,另外,通过发信号来区分自己还受信号的质量以及用户由此所产生的事后成本有关,信号的质量是指信号在多大程度上可信,而事后成本是指如果用户购买了劣质品后,进行保修或替换所需花费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因为,“假冒伪劣”产品常常也能一定程度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在用户(即便是在购买后)不能完全分辨产品之间较为细微的质量差异的情况下,提供产品保修或替换的信号的作用就是很微弱的。现代市场机制中为此而建立起另外一些信息机制,以帮助消费者识别产品或服务的质量等信息。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贴标签”和“有形证据”。另外,现代的企业组织如大的连锁销售网络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途径。

四、贴标签、有形证据和现代企业组织

给各种产品按照一定的技术性能和质量要求进行鉴定并评定等级,实际上就是将产品按其质量优劣“贴标签”而提供给用户的信号,在我国是国家和地方的技术监督局以及各种质量认证机构负责这项工作。由于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拥有的信息不完备,“标签”(具体表现为各种认证机构的认证图形标记)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就起到帮助消费者识别产品优劣的作用,这不仅使得在存在次货市场的外部性情况下,弥补可能的市场失灵,另外,也降低消费者的信息搜索成本,从而,增进社会福利水平,这显然是现代复杂的信息社会下的一种有效的补充市场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还可以从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和细致化的专业分工来考虑,专业化分工增加了人们知识的深度,但也加大了各种知识之间相互沟通的障碍,因此,专家的作用就愈发重要。当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变得如此多样化时,对其性能和质量的评定就只有专家才能完成,这些专家就成为专业的“贴标签”者,为市场运行提供识别信息的支持。显然,由于专业“贴标签”的作用,“假冒伪劣”产品的活动空间将会大大缩小。

就服务产品来说,人们无法给它贴上有形的“标签”,因此,“贴标签”的方法对此是失灵的。但在服务领域,人们可以通过“有形证据”来初步评定服务质量之优劣,这是指,消费者可以通过服务的人员、场所、方式、技术、气氛等来识别服务的质量。

不可忽视的是,现代企业组织结构也为企业区别自我提供了很好的组织安排,由几家大的零售连锁店组成的覆盖面很广的商业网点按照消费者的收入和需求层次而区分开来,不同的商店(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出售一定质量和价格的产品,这样,就使得消费者很容易地区分开不同质量的产品。而且,这大大减少了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与之博弈的对手的数量,尽管并不是每一厂商都在今后长时期地与每一顾客进行交易,但网点铺展很广的连锁商业网点却几乎永远面对着相对固定的顾客,这就意味着,买卖双方将保持长期的交易博弈关系,双方的

合作将是最优的选择,这样,提供“假冒伪劣”品的背叛行为将受到抑制。

这几方面说明,现代市场机制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可以补偿市场在次货市场逆向选择问题上可能导致的失灵,这些都是我国在对付“假冒伪劣”产品上值得考虑的制度建设问题。

五、标签的真伪问题

首先,标签不能是政府通过强权发行的证明文件,因为,一个标签的质量和在市场上是否被接受以及其被接受的范围,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如果在较长的时间内,所贴标签与产品质量之间呈现高度相关性,则这一贴标签的机构就将被得到普遍认同,而具有权威性。从这一意义上,有必要指出,我国目前一些政府机构为各种企业或产品/服务评定优质金奖、银奖以及评定著名品牌的工作,在经济转轨时期对于引导和激励企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长期来看,必然造成市场“标签”信息的行政化,造成一定程度的信息失真。“贴标签”的信息标识是典型的市场行为,政府只可对“贴标签”的组织机构和专家进行监管,而不是直接参与。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介入“贴标签”工作将为官员的“寻租”行为创造条件,企业则可以通过收买官员或相互“串谋”,而欺骗消费者。实际上,这种廉价的“选举权”(借用张军语,这里是指“贴标签”的官员因为可几乎不花费任何成本而给出各种奖章、证书)会经常被滥用,就如同高速通货膨胀中的货币一样,会被贬值到失去本身应有意义之下。

现实中的“标签”有真伪问题,有质量优劣问题,这意味着,为区分真品和“假冒伪劣”产品的“标签”本身也有区分真伪的必要。这是因为“标签”可以被仿造或被廉价地批发,因此,国家对于签发“标签”的机构和专家有着责无旁贷的

监管责任,外部的审计、监控,最后还有法律,都是国家在这一任务中可能使用的手段。

六、简短的结论

可以将市场交易行为看成买卖双方合作博弈问题,在企业普遍存在短期化行为、市场交易伙伴数量巨大、一次性交易主导市场的情况下,厂商的不合作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就是必然的,这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目前“假冒伪劣”产品横行市场的现象。而仅靠政府和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是很不够的,必须运用市场本身的补偿机制来弥补次货市场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灵,这包括“发信号”、“贴标签”、“有形证据”以及建立现代企业组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展较大规模、较为集中化的商业连锁网点。而政府在市场标识信息中不是直接参与,而是执行对“贴标签”的机构和专家进行控制和监管。

主要参考文献:

Kreps, David M., 1990: 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 Harvester Wheatsheaf,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Sydney Tokyo.

H·范里安,1992: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出版社。

罗伯特·艾克斯罗德,1996(1984):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合作的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维迎,1995: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主流经济学的新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

肯尼思·阿罗,1989:信息经济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汪纯孝,1996:服务营销与服务质量管理,中山大学出版社。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对我国企业战略联盟与国际竞争战略的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李新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谭湛明

论中国外贸宏观结构

长期趋势与发展战略选择

□ 谢 康

面,中国外贸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内外外贸十强省市,特别是某一个或两个省市,如上海、辽宁或广东。1994年广东占全国外贸总额的42.72%。1995年,广东、北京和上海对外贸易占全国外贸总额的58.86%。1978~1995年中国外贸对其外贸十强省市的平均依存度为76.96%。这些事实表明,分析中国对外贸易现状和制定其发展战略,不能忽略中国对外贸易宏观结构的这种长期趋势。本文试图在中国外经贸部和海关统计数据基础上,对中国对外贸易双重结构的形成和特征做初步探讨。

一、外部重心:二十大贸易伙伴依存度分析

一国对其贸易伙伴的依存度,可近似地以该国与其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该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来表示。分析1978~1995年中国对其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十大贸易伙伴和二十大贸易伙伴的依存度及其贸易平衡状况及有关数据^{①②},我们获得以下六点认识:

1、除1978年日本、香港和前西德为中国最大的三个贸易伙伴外,其它年份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均为日本、香港和美国。1978~1986年日本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这个位置在1987~1992年被香港取代,1993年后日本重新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自1979年以来连续17年占据着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的位置,是期间中国众多贸易伙伴中唯一没有动摇过地位的贸易伙伴。1978~1995年中国对其三大贸易伙伴的依存度波动在42.59~61.94%,特别是50.31~61.94%之间,波动幅度19.35个百分点,平均依存度54.03%。其中,1979~1995年中国对日、港、美的贸易依存度为54.70%,显示出中国对这三个主要贸易伙伴的高需求。1978~1995年中国对其十大贸易伙伴的依存度波动在65.39~80.66%之间,波动幅度15.27个百分点,平均依存度74.68%。同期,中国对其二十大贸易伙伴的依存度波动在79.28~90.50%之间,波动幅度11.22个百分点,平均依存度85.51%。有趣的

对中国与其二十大贸易伙伴的贸易依存度,及中国国内出口地理结构进行长期趋势分析发现,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呈现双重特征,一方面,中国外贸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其十大贸易伙伴,1978~1995年中国对其十大贸易伙伴平均依存度为74.68%,其中,对其前三位贸易伙伴的平均依存度为54.03%;另一方

是,这三组数据的平均依存度几乎都位于相应波动范围内的中线偏高 10%位置上。

2、1979~1995 年中国对日、港、美三大贸易伙伴出口和进口的平均依存度分别为 58.83% 和 50.46%,前者比后者高出 8.37 个百分点。显然,中国对日、港、美的长期贸易需求主要体现在出口市场方面,其中,对美国的出口市场需求要远高于对其进口市场的需求。然而,1979~1995 年中国对其十大贸易伙伴的平均出口与进口依存度之间却相当平衡,分别为 74.84% 和 75.31%,二者相差 0.47 个百分点。同样,1978~1995 年中国对其二十大贸易伙伴的出口与进口依存度之间也保持平衡,分别为 85.13% 和 85.92%,二者相差 0.79 个百分点。这说明从长期趋势看,虽然中国对其十大贸易伙伴或二十大贸易伙伴的进口依存度稍高于出口依存度,但整体上依然在进出口上保持高度平衡,并且这种高度平衡似乎难以归咎于人为的或政府因素,只能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其原因,因为绝大多数时期中国二十大贸易伙伴除前三大贸易伙伴外,其它贸易伙伴的地位和成员各不相同。

3、长期来看,中国无论对其三大贸易伙伴的依存度,还是对其十大或二十大贸易伙伴的依存度,都存在上升趋势。1990~1995 年中国对其三大、十大和二十大贸易伙伴的依存度,分别比 1980~1989 年高 1.28、4.50 和 4.47 个百分点,即相对于三大贸易伙伴而言,中国对其十大和二十大贸易伙伴的依存度在 90 年代得到加强。1980~1991 年期间,中国对其三大和十大贸易伙伴的贸易依存度分别由 50.31% 和 70.65% 上升到 61.94% 和 80.05%,同期,对其二十大贸易伙伴的依存度从 1978 年的 79.28% 上升到 1991 年的 90.50%。但是,1992 年或 1993 年后这三个数值均有所下降,甚至下降到原水平上。这种下降似乎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开始了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其十大或二十大贸易伙伴的依存度总体上可能比 1991 年或 1992 年的依存水平有所下降,但不会下降得太大和太快。

4、1979~1995 年中国通过与日、港、美的贸易,共获得 1042.4 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平均年贸易顺差 61.32 亿美元。但是,中国在与其第四至十大贸易伙伴的同期贸易中,却出现 1045.7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平均年贸易逆差 61.51 亿美元,即同期内中国与其十大贸易伙伴的贸易整体上保持平衡,仅出现 3.3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同时,我们注意到,1978~1995 年中国与其十大贸易伙伴的贸易出现 17.3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种贸易逆差在二十大贸易伙伴范围内扩大为 184.5 亿美元,平均年贸易逆差 10.85 亿美元。我们认为,从长期趋势看,尽管不同时期中国的二十大贸易伙伴成员各不相同,或同一国家或地区处于二十大贸易伙伴内不同位置,或中国与二十大贸易伙伴内的某个成员的贸易表现为长期的顺差或逆差,但是,中国与其二十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长期来看却保持平衡,即在整体上可以认为,中国从其二十大贸易伙伴贸易中获得的贸易盈余,又基本上被用于购买它们的产品和服务。

5、1993~1995 年中国与其三大、十大和二十大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平均比重分别为 51.48%、77.18% 和 88.09%,即中国对日、港、美的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对其十大贸易伙伴的贸易占其与世界各国和地区贸易总额的 2/3 强,对其二十大贸易伙伴(占其贸易伙伴总数的约 9%)的贸易,几乎占其总贸易的九成。这充分说明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的选择狭窄,过多依赖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对外贸易的这一外部结构特征对于中国外贸的发展既存在正面影响,也存在负面影响。如果中国政府特别是外贸部门能够处理好与这些贸易伙伴的政府和外贸部门、厂商的双边经贸关系,其结果显然有利于中国政府对外贸易的宏观调控和重点管理。如何保持中国与其二十大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理应成为中国政府外贸宏观管理的重点之一。

6、中国对外贸易宏观结构的外部重心,以日本、香港和美国为核心,台湾、韩国、德国、新加坡、俄罗斯、意大利和英国等贸易伙伴为基本

范畴。该重心的形成大致经历三个阶段：(1) 1978~1986 年为重心的初步形成阶段，日本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次为香港、美国和前西德。澳大利亚、加拿大、约旦、罗马尼亚、巴西和朝鲜等国家先后列位于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之内。(2) 1986~1992 年为重心的结构形成阶段，香港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台湾、韩国陆续成为中国十大贸易伙伴，并不断加强它们在其中的地位，其中，台湾在 1992 年取代德国长达 13 年的位置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预示着中国对外贸易宏观结构外部重心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外，在这一阶段，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等中国传统的主要贸易伙伴被排挤在十大贸易伙伴之外。(3) 1993 年至今为外部重心的最终形成阶段，首先，日本重新成为中国外贸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次，十大贸易伙伴没有像以往两个阶段那样成员不断更迭，而是维持原有成员，只是成员之间的位置发生某些变化，如台湾、韩国超过德国分别成为中国第四、第五大贸易伙伴；新加坡超过俄罗斯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在二十大贸易伙伴范围内亦如此。

1995 年，在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中，亚洲成员与欧美成员各占一半，但是，中国与亚洲贸易伙伴的贸易却占其中的 2/3 强，即 67.28%；中国对亚洲成员的出口占十大贸易伙伴的 67.81%，进口占 66.66%。在中国二十大贸易伙伴中，亚洲成员占 2/5，但中国与之贸易额占其中的 62.37%，出口和进口分别占 61.83% 和 62.97%，中国从中获得 69 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占中国当年对二十大贸易伙伴贸易盈余的 51.85%。这说明中国的贸易流向依然主要是亚洲市场，而不是欧美市场。整体上，中国对欧美市场的进口依赖稍高于对亚洲市场的进口依赖，而对亚洲市场的出口依赖又稍高于对欧美市场的出口依赖。

综上所述，从长期趋势看，中国对外贸易的约 90% 依赖于占其贸易伙伴总数(1995 年达到 227 个)不到 10% 的二十大贸易伙伴，并且在进出口上基本保持平衡，由此形成中国对外贸易

宏观结构的外部重心。

二、内部重心：十强省市的依存度分析

中国对外贸易对其外贸十强省市的依存度，可近似地以中国外贸十强省市出口贸易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表示。根据 1978~1995 年中国外贸对其外贸十强省市依存度的变化分析，^③我们获得以下三点认识：

1、中国对外贸易对其国内出口市场的依赖，随其国内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而逐渐由东向北，又向南部地区转移而基本稳定下来。中国对其外贸第一大省市的依存度由 80 年代的 19.12%，上升到 90 年代前 6 年的 28.8%，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点。

1978~1980 年上海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基地，其次为辽宁、广东、山东和江苏；1981~1985 年辽宁取代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省市，其次为上海和广东；1986 年广东替代辽宁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省市，并此后连续 10 年在中国外贸中独占鳌头。1989 年广东省出口占当年全国出口的 19.32%，恢复到 1985 年辽宁省出口占全国出口 19.34% 的水平，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重心再现的标志之一，尽管当时这种重心结构并不明显。1994 年广东对外贸易占全国外贸总额的 42.72%，其中，出口占 44.01%，进口占 41.37%；同年，上海对外贸易总额为 201.54 亿美元，名列全国第二位，但与广东相比，其对外贸易绝对差距相差 809.87 亿美元，换言之，广东对外贸易额是上海的 5 倍。1995 年，广东、北京和上海三甲之间对外贸易的绝对差距分别为 668.9 亿美元和 126.8 亿美元。虽然随着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上海和北京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善，它们将会逐渐缩短与广东外贸的差距，但短期内中国对外贸易宏观结构内部重心的核心将不会发生改变。

2、1978~1995 年中国对外贸易对其外贸三强省市和十强省市的平均依存度分别为 46.22% 和 76.96%。从长期趋势看，中国外贸对其十强省市的贸易依存度经历一个由高向低，

再由低逐渐升高的过程。1978~1991年中国外贸对其十强省市的依存度由1978年的91.57%降至1991年的59.92%。1992年后,中国外贸对其十强省市的贸易依存度开始上升,1993年超过平均依存度达74.21%,1994年后稳定在86%的依存度水平上。

3、中国对外贸易对其十强贸易省市的依存度由80年代76.00%的平均水平,下降为90年代前6年73.69%的平均水平,但在90年代对其三强贸易省市的依存度却比80年代高0.4个百分点。1994年,广东、上海和江苏为中国对外贸易三甲,其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7.97%,进口占全国进口总额的55.64%,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6.83%;当年中国外贸十强省市进出口占全国的85.01%,出口占86.06%,进口占83.92%。1995年,广东、北京和上海为中国对外贸易三甲,其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的58.86%;当年中国外贸十强省市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87.83%。显然,中国外贸宏观结构的内部重心存在着向其最大的外贸省市收敛的趋势。

中国对外贸易对其前三强省市依存度,特别是对第一大外贸省市依存度的上升或收敛趋势,最终在1994年前后形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内部重心,即以东部沿海省市,特别是以广东、上海和北京为核心,以江苏、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天津和河北为纽带的国内出口重心。1995年,该重心已占全国当年出口的86.37%,其中,广东占38.03%,前三位核心省市占53.36%。统计数据亦表明:1978~1995年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对外贸易的差距获得一定程度的缩小。1978年中国东部地区外贸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9.55%,中西部地区仅占全国的9.6%,1995年这两个数值分别为86.99%和13.01%。经过18年努力,中国中西部地区在对外贸易上仅将出口份额提高3.41个百分点。

三、结论和建议

中国对外贸易宏观结构长期趋势上表现为“内外结合的双重结构”,一方面对其二十大贸易伙伴的高依存度形成外部重心,另一方面对其外贸十强省市(基本属沿海省市),特别是对第一大外贸省市依存度的收敛趋势形成内部重心,构成中国对外贸易宏观结构的双重特征。这种双重结构显示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最主要是沿海省市与二十大贸易伙伴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因此,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探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和各种战略性贸易政策,特别是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自由化规划,应建立在对这种双重结构的认识基础上。

1、从长期趋势看,尽管中国的十大贸易伙伴中成员有所变化,或在不同年份同一成员的地位得到加强或削弱,但中国与其十大、二十大贸易伙伴的出口与进口之间保持平衡,差别只是对某些成员贸易顺差,对某些贸易成员逆差。这种长期“自然”形成的贸易收支基本平衡结构,为中国在2020年前推行贸易自由化提供了重要基础。中国政府,特别是外经贸部门制定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和具体政策时,可将对十大、二十大贸易伙伴的贸易,特别是对日、港、美的贸易做为首要分析单位。1997年香港回归后,美国将从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位置上升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台湾和韩国则可能分别成为中国第三大和第四大贸易伙伴,而法国则可能重新成为中国十大贸易伙伴之一。这些变化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

2、中国对外贸易宏观结构的外部重心难以、甚至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我们在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同时,应正视中国十大、二十大贸易伙伴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强相关影响,大力维护与这些主要贸易伙伴的稳定的经贸关系。至少,加强和巩固与十大或二十大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与开拓国际市场,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之间不应相互排斥。就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环境分析,中国对外贸易应首先将重点放在加强和巩固与十大、二十大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上。市场多元化战略,应

是建立在加强和巩固与十大、二十大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基础上的市场多元化战略。

3、市场多元化战略应是一种整体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而不应理解为仅仅是开拓新的国际市场,或寻求新的贸易伙伴。诚然,市场多元化离不开寻求新的贸易伙伴,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但市场多元化战略除此内涵外,还应包括国内出口地区的多元化内容。目前我国出口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省市,1995年出口贸易十强省市均为沿海省市,其出口占全国出口86.37%。中国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在对外贸易中没有获得它们应获得,或可获得的潜在贸易份额。1995年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仅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1.33%,其中,出口占13.00%,进口占9.4%。加大中西部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市场份额,应当成为中国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基本内容之一。

总之,建立在对中国对外贸易双重结构认识基础上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应是一种含有多项行业和地区性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方位贸易战略。

①②资料来源:1978~1980年数据根据经贸部统计数据得出,其它年份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得出。

③资料来源:《对外贸易统计资料汇编(1950~1989)》,中国《海关统计》,1986~1995年。

参考文献

1、王林生《中国出口产业结构与地区分工》,《国际贸易》1994年第6期。

2、王新奎《9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方向》,《国际贸易》1994年第6期。

3、许罗丹、谢康,1995年:《中国对外贸易》,中山大学出版社。

4、吴仪《中国对外经贸形势及基本政策》,《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7期。

5、盛斌《中国贸易自由化福利效果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6、Balassa, Bela, 1982: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Semi-industrial Economies*. NY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Balassa, Bela, 1985: "Export, Policy choi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fter the 1973 oil shock".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8(2): 23~25.

8、Edwards, S., 1993: "Opennes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1(3): 1358~1393.

9、Frankenstein, John and C. N. Chao, 1988: "Decision-making in the Chinese foreign trade administration: A preliminary survey". *The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3(3): 35~40.

10、Shivakumar, Ram, 1993: "Strategic trade policy: Choosing between export subsidies and export quotas under uncertain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5(1/2): 169~183.

11、Srinivasan, T. N., 1987: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and India: Issues an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1(3): 427~437.

作者谢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贸易金融系副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谭湛明

纳粹德国为何对美国宣战

□蒋相泽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履行援助波兰的条约义务，随即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0年6月，德国打败法国，接着就发动“不列颠之战”，准备渡海入侵英国。1941年6月，德国又大举进攻苏联，但对美国却十分谨慎，不欲在征服欧洲之前惹起美国参战。可是，到1941年12月，德国并未征服全欧，却主动对美国宣战，这是什么缘故？

纳粹德国侵略扩张的总的目标是征服欧洲，进而征服世界；方法是打一系列闪电战，即迅速打败一个对象，然后再打下一个。这样打下去，自然会轮到打美国。纳粹头目也确曾有将进攻美国的设想。德国空军部1940年10月的一份文件中有这样的话：“为了将来对美国作战，元首现正考虑占领大西洋一些岛屿的问题”。①纳粹头子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也在1941年7月谈到海军军备时提到过对美国作战。②但是，他并没有视之为近期内要做的事情，也没有为此拟过具体的计划。

相反，希特勒原是想防止美国在他征服欧洲之前参战。他在1939年9月初发动战争时，即已命令纳粹报刊不要发表刺激美国的言论。两周后又向报刊和军政部门重申前令，要谨慎处理一切有关美国的问题。③此类命令，海军接到的最多，也最严厉。海军请求给予较大的行动自由，也一直被拒绝。1940年3月5日，希特勒还明令海军在任何地方都不得拦阻、捕捉、或击沉美国的船舰。④

1940年6月德国速胜法国后，希特勒满以为可以照样在短期内打垮英国或迫使它投降，

但英国坚决抵抗，拒绝妥协。这是1939年9月开战以来德军第一次受阻。希特勒知道，英国是在指望美国的援助，战争越拖长，美援的作用以及美国参战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随着战争的延长，在希特勒的战略筹划中，美国因素便日益占据重要的位置。

希特勒首先要阻止或减弱美国对他的敌人的援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坚信，英法是在守卫着美国国防的第一线，应当给予支援。在他的吁请下，美国国会在欧战爆发两个月后通过新的《中立法》，废除原《中立法》中关于禁卖武器给交战国的条款，允许交战国按“付现自运”的原则从美国购买武器和军需品。这个原则只有利于在美元储备和海上运输能力方面都优于德国的英法。1940年夏法国败亡后，英国处境危殆，美国更加紧援英，改用租借的办法向英国和被侵略的国家提供武器和军事物资。美援成了支撑英国继续抗德的“最重要的因素”。⑤德国需要用海军力量切断美英之间的大西洋供应线。但是，如果截击美船，就会与避免挑起美国直接参战的政策相抵触。既要阻遏美国援英，又要防止美国参战，必须另想他法。

希特勒把目光转向太平洋，看上了日本。1940年7月，他对他的将领们说，要使日本成为德国的反美“匕首”。⑥即是说，要联日制美，把美国的注意力引向远东，使其不能兼顾援英，也不敢参加欧战。

德日之间在1936年已订有反共协定，可以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勾结。第二次世界大战

爆发前一年，德国就曾谋求把防共协定变为反对苏英法的军事同盟。因日本不愿把协定扩大到以英法为对象，同盟没有订成。1940年夏德国征服西欧大陆、进逼英国后，日本想乘机攫取西欧国家在远东的殖民地，掠夺东南亚的资源，遂倒过来求助于作为西欧大陆占领者的德国。法国一战败，日本就请求德国支持它侵占法属印度支那。德方答称：可以让日本放手行动，但作为回报，日本应承诺，一旦美国参加欧战，日本就进攻菲律宾和夏威夷，把美国的力量束缚在太平洋地区。日方的回答是，把美国困锁在西半球，对日德两国都是很有利的。^⑦此时希特勒还想对英国实行诱降，但到7、8月间英国仍拒不妥协，战争势将延长，希特勒才决定联合日本夹击英国，牵制美国。日本方面，7月16日上台的第二届近卫内阁也决定建立“大东亚新秩序”，要防止美国干预。在共同对付美国这一目标的推动下，德日遂重开结盟谈判。

1940年9月初，德国派特使斯塔玛赴日，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会谈。德国外长约阿希姆·里宾特洛甫给斯塔玛的训令特别强调：德国并不要求日本在欧战中承担军事义务，只希望日本用一切手段阻止美国参战；日美之战终不可避免，德意日三国强硬、坚定的态度，对美国将是一个强大而有效的威慑力量。^⑧希特勒也明白告诉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与日本密切合作，是防止美国参战或使其参战归于无效的最好办法。^⑨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其第一条为：日本同德意彼此承认并尊重对方在欧洲和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条约的核心在第三条：三国承允，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第四条特别申明：条约毫不影响三缔约国各与苏联间现存的政治关系。^⑩当时不在战争中的大国只有苏联和美国。德苏之间确实曾在1939年8月订有《互不侵犯条约》，但就在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时候，德国已在拟制入侵苏联的计划。^⑪其所以加上不影响

三国各与苏联现存的政治关系这一条，显然是故意突出第三条针对的是美国。

谈判中，日方曾表示，只有在适当的国内外情势许可时，日本才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⑫德国驻日大使也在其致日本外相的密信中说，第三条中所说的“受到一国攻击”是否已经发生，要通过三缔约国共同协商来决定。^⑬德方愿意作这样的保留，表明它最重视的不是条约的军事价值，而是这样公开结盟所起到的政治作用——威慑美国。德国陆军参谋长弗里茨·哈尔德在签约当天的日记中把这个条约称为政治上的成就和对美国的警告。^⑭

可是，与德意日法西斯的愿望相反，三国结盟反而使美国的态度较前强硬。罗斯福总统在三国条约签订后的演说中称：欧洲和亚洲的独裁者们的任何结合都不能阻止美国援助正在为抗拒独裁者们而战斗的人民。^⑮12月29日罗斯福又说：9月27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结成了同盟，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存，美国必须转变成为一个以战争经济为基础的军事强国，同时必须以作战的精神提高工业生产率，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⑯接着他便向国会提出以物资供应前线国家的“租借法案”；对日本，则实行废钢铁禁运。面对三国同盟所产生的这种“效果”，德国又担心日本会被吓退而与美国妥协，使美国能把大部分力量用于欧洲。

德意日三国结盟后，日美矛盾日益尖锐化，但美国仍想避免两洋作战，日本也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迫使美国不干涉它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双方遂于1941年春开始进行外交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便从与日本结盟进而催促日本尽快采取“南进”的军事行动，希望这样既可以阻止日美妥协，又可以使美国不能兼顾欧洲战争。

1941年2月，德国开始催促日本进攻英国在远东的重镇新加坡。里宾特洛甫在2月13日会见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时和3月29日与来访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会谈时，一再催日本夺取新加坡。4月4日，希特勒还亲自向松冈

保证：如果美国因日本进攻新加坡而进行军事干涉，德国就立即与日本一起对美国作战。①7 此时德国急于要日本在远东发动战争，其目的在 3 月 5 日德国最高统帅部的 24 号命令说得很清楚：与日本合作的目的必须是诱使它在远东尽快采取积极措施，从而牵制英国的兵力，并把美国利益的重心引至太平洋；要强调作战的共同目标是迫使英国速降，从而排除美国参战的可能性。①8

为了逼迫英国屈服，防止美国参战，德国除与日本结盟和催它南进而外，还决定掉头进攻苏联。德国的长期战略目标本来就是要在苏联及其周边国家夺取更大的“生存空间”。①9 从这点来看，征服西欧，不过是为反苏战争解除后顾之忧。但在 1940 年夏秋之交，希特勒还有这样的想法：掉头攻苏，也是阻止美国参战的最有效的途径。他说：英国是寄希望于苏联和美国，如果对苏联的希望破灭，美国亦将退却，因为苏联垮台，就会增加日本在亚洲的实力。②0 接着他就在 1940 年 8 月下令拟制攻苏的计划。他在 1940 年 12 月 18 日签署的第 21 号命令中规定：要在对英战争结束之前以一次速决战打垮苏联，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以前完成。②1 在作此决定之后，他又在 1941 年 1 月 8 日对他的将领们说：摧毁苏联，将使日本能够倾其全力对付美国，这就能防止美国参战。②2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发动了侵苏战争。在此前后，他都重申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政策。在对苏战争获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他“绝对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意外事故。②3 1941 年 4 月，美国把海军巡逻范围向东延伸至格林兰。7 月 7 日，美军占领冰岛，旋即对冰岛以西航道上的美国商船实行海军护航。在此情况下，德国海军当局再三要求攻击美国军舰和商船，希特勒都一概不准。德国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曾主张先集中全力制服英国，反对在败英之前攻苏。希特勒对他说：必须先吞并欧洲大陆以作为对付英美的基地，在达到这个目标之后，才能按海军的要求办。②4

希特勒之所以要先完成对欧洲大陆的征服，原因之一是，德国军事专家估计，美国在 1941 年夏季以前还不能练成和装备 100 万陆军，但到 1942 年夏，这支大军就将建成。因此希特勒在 1940 年 12 月对他的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阿尔弗列德·约德尔说：德国不得不在下半年内解决所有欧洲大陆的问题，因为到 1942 年美国将完成参加欧战的准备。②5 言下之意是，必须赶在 1941 年征服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欧洲大陆；在这以后，即使美国仍要参战，德国也能挟胜利的威势和欧洲的资源回过头来打败英美。

但这样做，有个前提，那就是，能很快就打垮苏联。希特勒在 1941 年 6 月侵苏时正是这样高估自己的。他料定 3 个月甚至几周内就能降服苏联。殊不知 8 月以后德军推进的速度慢下来了，到 12 月，进逼莫斯科的中路德军还因苏军反攻而后退。东线战事也拖长了。

德国侵苏以后，先是怂恿日本从东面夹击苏联，立即进攻苏联在远东的重要港口海参崴，强调这不仅是对苏联致命的一击，而且还能解决美国问题。②6 1941 年 7 月 1 日，里宾特洛甫电告日本外相：如果日军从海参崴向西深入苏境，甚至在寒季来临之前就可以和东进的德军在苏联腹地会师，彻底解决苏联问题；至于美国，由于苏联被征服，德意日三个盟国的压力就足以消除美国参战的倾向。②7 此后德国还以各种说词催逼日本攻苏，要求它至少也应阻止美船运送援苏物资至海参崴。但日本有它自己的盘算。它亟需掠得战略物资，北取西伯利亚，并不能解决这个迫切的问题。此外，即使它能深入苏境，倘若那一端德军不能速胜，侵苏日军就会象侵华日军那样陷在苦战的泥淖之中。反之，倘若德军真能速胜，日本仍然可以乘机北进而与德国分赃。因此，里宾特洛甫所画的“会师”美景，没有能够打动日本。

德军没有取得速胜，而是陷入莫斯科效外真正的冰雪泥潭。于是德国又转而鼓动日本“南进”。但和以前不同，现在不是防止美国参战，而是支持日本对美国开战。

1941年8月至12月,东西方的局势都发生了变化。8月14日,美英两国政府公布了“大西洋宪章”,宣称要摧毁纳粹暴政,要采取措施推翻纳粹武力征服所造成的结果。^⑳9月4日,美国驱逐舰“格利尔号”受到德国潜艇的攻击。9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海军将俘虏或击毁驶入其防御水域的德、意潜艇和水面战船。^㉑即是说,一见敌船就打。这实际上是对德国和意大利宣布了海战。在远东,7月28日,日军在西贡登陆,占领印支南部,直接威胁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地。美国旋即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又对日本禁运一切战略物资。日本政府则于9月6日决定,日美谈判若不能在10月15日以前得到令日本满意的结果,就立即准备对美英荷开战。10月16日,近卫内阁辞职,由原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组阁。11月5日,御前会议决定,谈判若在12月1日前达不成协议,即在12月初开战。

1941年初日本在准备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时,已准备了另一手,那就是,先摧毁美国的海军力量,使其在短期内不能恢复,然后在这段空隙期间征服“大东亚”,迫使美国承认既成事实。它为此还拟订了具体计划:在开战之初用飞机编队袭击夏威夷的珍珠港,一举粉碎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但按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规定,要三国之一受到攻击时才互相援助;而且按德日之间的谅解,是否已受攻击,还得由三国共商来判断。这就不符合日本先发制人的计划。因此,东条内阁在11月5日作出开战决定后,一面命令海军准备偷袭珍珠港,一面请求德国承诺,一旦日美开战,德国决不与美国言和。11月21日,德方回答得很爽快:如果日美开战,德国参战是当然的;德美之间,或日美之间开战,不论起于何种原因,德国都不会与美国单独媾和;德国还愿意就此与日本缔结具体的书面协定。^㉒所谓“不论起于何种原因”,意思就是,即使是日本首先进攻,德国亦将给予支持,甚至可以为此起另订协定。11月29日,里宾特洛甫还特意约见大岛,催日本趁美国军力尚弱时赶快动手,切勿坐失良机。

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时间7日晨),日军轰炸机和鱼雷艇攻击机按计划袭击了珍珠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及陆上飞机场。同日,日本向美英正式宣战。11日,德、意、日签订了共同对美英作战的军事协定。同日,德意也对美国宣战。三天前,希特勒已命令潜艇向美国的船舰进攻。宣战后,他又给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颁发十字勋章,并对他说:日本的做法,正符合他希特勒惯用的方式,那就是,看到谈判不能收效,就突然出击,不浪费时间去搞什么宣而后战。^㉓

希特勒对联日攻美之所以如此热衷,如此急切,是因为,在莫斯科战役中,苏军在12月开始反攻,德军遭到了二战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失败,闪电战宣告破产。希特勒觉得,日本在这个时刻出击,正可以提高德军的士气。他自己也因日本终于动手而有如释重负之感。他叫道:“我们首次有了一个头等军事大国站在我们一边”。^㉔他当然要履行已经作过的共同对美作战的诺言。反之,倘若不立即宣战,他就会失去日本这个“头等”盟友。

从长远看,希特勒原已希图把与美国的战争引到太平洋。他一面严禁他的海军在大西洋招惹美国,一面却又怂恿日本在太平洋进攻英美,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据里宾特洛甫说,到1941年12月,希特勒已看到,美国在大西洋的行动,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德美之间的战争状态,宣战只不过是形式。^㉕此时日本既然干起来了,就应该用这种形式来支持它,让它在太平洋拖住美国。希特勒估计,哪怕只拖一年,他仍然能够在这一年内胜利结束对苏联的战争,仍然能够在胜苏后制服英美。^㉖

他这样估计,是先假定,日本攻美之后,美国必然会把大部分力量转到太平洋。但是,美国没有这样做。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国会通过对日本宣战(华盛顿时间12月8日下午)的第二天发表广播演说,特别指出,德意日是一丘之貉,过去10年间它们分别在欧、非、亚三洲进行平行的侵略,现在又从平行进而合作,把世界各大洲大洋看成一个巨大的战场;数月来德国一

直在鼓动日本进攻美国,许以将来控制整个太平洋地区;它们是按联合计划进行陆战和海战的,美国和其他被侵略的国家也只有用同样的“大战略”才能抗击它们。^⑤总之,他不是单把日本看作敌人。这时德国和意大利还没有对美国宣战,但罗斯福已经这样说了。他说的“大战略”亦已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就订下来了。1941年1至3月,美英军事代表在华盛顿会谈,拟订了一个叫做ABC—1号的联合作战计划,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即先打败德国,后对付日本。理由是,德国是主要的敌人,打败日本,并不能结束战争;打败德国,日本就会被暴露在占压倒优势的盟军面前而跟着垮台。^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美英两国首脑及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决定仍旧执行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而且还规定:其他战场若必须抽调用于对德作战的兵力,也应把数量压至最低限度。^⑦希特勒又失算了。日本参战之后,美国并没有把大部分力量送去让日本拖住,苏联也没有在一年内被他征服。

二战中纳粹德国的对美政策从防止美国参战变为怂恿日本攻美,再变为主动对美宣战,并非不可理解。它的侵略行动,必然引着它这样做。

希特勒的战略,原是一个时期只打一个对象。自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他用这个方法居然先后打败了波兰、法国等几个欧陆国家。但在“不列颠之战”中,他却受阻于英国的坚决抵抗。于是他便在1940年9月17日无限期推迟在英国登陆作战的计划,准备东侵苏联,希图在速胜苏联之后再收拾处境更加孤立的英国。殊不知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前一个敌人尚在抵抗之时又多树了一个敌人的局面。希特勒自己推翻了他逐个击破敌人的方略。

自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希特勒曾相继用严禁海军招惹美国,与日本结盟、催日本进攻新加坡、入侵苏联等办法来防止美国参战。但是,德军又遇到了苏联的坚决抵抗,速胜苏联的希望破灭。于是他又竭力支持日本南进,不惜作出共同对美作战的承诺,想借助日本来牵制英美,使自己仍能在短期内完成对欧陆的征服。为达到这个目的,在日本攻美之后,尽管彼此宣战的只是日本和美国,他却主动向美国宣战,在前两个敌人(英、苏)还在和他厮杀的时候再树一个敌人。结果却不是美国被日本绊住,而是德国在被苏联绊住的情况下又受到一个新敌的进攻。纳粹德国终于在苏美这两个后树的敌人的夹攻下灭亡。

①Office of United States Chief of Counsel For Prosecution of Axis Criminality,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Washington: 1946, Vol. III, P289.

②Ibid., vol. VI, P906.

③Norman Rich, *Hitler's War Aims*. New York: 1992, P239.

④Ibid., PP239 - 240.

⑤James Compton, *The Swastika and the Eagle*. New York: 1967, PP157 - 158.

⑥Ibid., P190.

⑦Ibid., PP188 - 189.

⑧Ibid., P193.

⑨Rich, op. cit., P227.

⑩*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Vol. V, P356.

⑪Ibid., Vol. I, P795.

⑫Compton, op. cit., P192.

⑬Rich, op. cit., P227.

⑭Ibid., P228.

⑮Shepard Jones and Denys Myers(ed.),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Boston: 1941, Vol. III, P9.

从李之芳《赋役详稿》看清代赋税征课额的构成

□何 平

清初赋税征收秩序的整顿是通过重新编纂《赋役全书》来进行的。关于赋税征收数额确定的原则，顺治十四年(1657)王宏祚主持编纂的全国性赋役全书告竣颁行时，顺治帝在上谕中指出，“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其天启崇祯时加增尽行蠲免……纲举目张，汇成一编，名曰赋役全书，颁布天下，庶使小民遵兹令式便于输将，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敛，为一代之良法，垂万世之成规。”^①钱粮征收以明万历年间则例为依据，其实际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是指纳税单位的应纳赋税数额与明万历年间保持相同的水平，抑或赋税总额与明万历年间相同，难以明了。而万历年间前后48年，其间赋额多有变动，清初赋额又以哪个具体年份为准，也很模

糊。清初应征赋额究竟是如何确定的呢？前此学者曾利用官修史籍和志书加以说明，我认为，弄清赋役全书的编纂情况是回答这一问题更为有效的途径。清朝中央政府编纂赋役全书的总精神，也体现在各直省赋役全书的编纂中，而直省赋役全书是指导各州县赋税实际征收的直接依据。现存李之芳《赋役详稿》正是反映浙江清初赋役全书编纂情况的文稿，为我们探究清初赋税征收额的构成提供了重要资料。

李之芳，字邺园，山东武定州人(今山东惠民)。清顺治四年进士，六年授浙江金华府推官，掌理刑狱。顺治九年(1652)十一月，他参与并主持了浙江省赋役全书的编纂。在纂修过程中，对有关条款和内容，他提出自己的意见，申

^①Ibid., PP17-26.

^②Ibid., Vol. IV, P522.

^③Ibid., Vol. VI, PP906-907.

^④William Carr, *Arms, Autarky and Aggression*. New York: 1972, P10.

^⑤Compton, op. cit., P190.

^⑥*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Vol. III, PP407-408.

^⑦Rich, op. cit., P242.

^⑧Rich, op. cit., P242.

^⑨Compton, op. cit., P159.

^⑩Rich, op. cit., P240.

^⑪Compton, op. cit., PP210-211.

^⑫Rich, op. cit., PP229-230.

^⑬James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 New York: 1970, PP130-131.

^⑭Ibid., PP139-140.

^⑮Compton, op. cit., P231.

^⑯*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Vol. V, P603.

^⑰Rich, op. cit., P246.

^⑱Compton, op. cit., P236.

^⑲Rich, op. cit., P246.

^⑳Leland Goodrich(ed.),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Boston: 1942, PP36-43.

^㉑Herbert Feis,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1967, PP38-39.

^㉒Ibid., P39.

作者蒋相泽，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郭秀文

详院司，以指导全书的具体编纂。这些向院司申详的文稿被编成《赋役详稿》，刊刻传世。下面我们便以《赋役详稿》提供的材料为中心，通过浙江省赋役全书编纂情况的分析，说明清初赋税征收额的构成。

一

浙江省清初赋税征收额以明万历年间未加派辽饷前的赋役册籍所载内容为基本依据。除此之外，首先是对辽饷加派的沿袭。

关于辽饷加派在浙江实际的情况，李之芳称，“辽饷一项，明季原照万历四十六七八年则例加派，田每亩九厘七毫八丝，地每亩九厘；山每亩七厘二毫二丝二忽，通省共计银四十一万九千五百两有奇。又每两加水脚七厘，以资解官路费，至今率由旧章。但查山之原征额税，初不过于三四厘，而辽饷又加至七厘有零，不几指大于臂，子过于母乎？况田则一岁数稔，山必积数年之毛而后获其微息。且其中岂无山多田少之家。一概计亩求征，甚非法之平也。”可见，浙江省在清初辽饷加派方面，首先沿袭明季辽饷原额和征派则例。其次辽饷的加派不仅限于田和地，而且对山也予以加派，使山的负税额中新摊辽饷部分远多于原征税额。关于辽饷加派的性质和实施背景，李之芳称，“辽饷系明季增派，原非正供。今军兴孔棘，即不敢议裁。应注明九厘俟底定，再请蠲豁。”^②那么，后来是否蠲豁呢？

清初对明季三饷加派曾一度下令“尽行蠲免。”^③但顺治三年（1646）后，清政府关于蠲免明末三饷加派的诏令所规定的蠲免范围，便仅限于天启、崇祯年间所新增的加派，未及万历朝。而辽饷正是在明万历末年开征的加派。这便自然排除在蠲免范围之外。留存至今的档案表明，辽饷加派在清初仍实施着。如江西巡按王志佐顺治六年（1649）奏报江西的情况称，“案查明季万历四十八年间，江西布政司奉文每田一亩加派辽饷九厘，共该银三十六万一千零三十六两一钱四分四厘……至顺治三年归附之后，据布政司通行造册奏报，谓此三项俱在蠲免之列矣。后奉部文通行省道内开，派征钱粮照

万历年间则例，其天启、崇祯年加增尽行蠲免。盖以前辽饷在万历年间加派，故复照旧派征耳。”^④湖广总督祖泽远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奏报湖广征收情形时称，“辽饷自九年（1652）起征。又奉部开，通省九厘饷银，旧额七十四万二千四百七十六两一钱六分三厘，以九厘原按亩加派，应照田地山塘等项科算，逐一厘正册报。”^⑤清初各地的赋役征派，是随着清军占领区的推进而得以实施的，在时间上各直省存在着先后的差别。随着军事占领区的扩大，清政府在各地一步步建立起赋税征收体制。就辽饷的征派而言，顺治十四年（1657）颁行全国性赋役全书时，改称九厘银，“至若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⑥成为各级赋役全书的固定征赋内容。

二

清初新增实物项目的改折是浙江清初赋税征收额中第二大加增项目。

顺治三年户部题定酌价便民折解加编的箭弦胖袄民七军器等项，都是清初所新增的，这些实物都由农民负担，奉部文改折后形成固定的赋税项目，浙江此项数额达35920余两。比如民七军器一项，按清初的惯例，浙江省军器由民众负责7分，军办3分。军办3分军器银10782两3钱6分1厘4毫，李之芳编纂赋役全书时请求于裁扣军储内留用，而民7部分30000余两，则“向派田亩。”^⑦这是浙江新增赋额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全国而言，清初修纂赋役全书时，新增的赋税征收款项虽然不具普遍性，但许多地方的赋税构成，都已包括这个内容。如福建宁化县，清初县志称，“合明与本朝观之，所损益可知矣。其损之而善者，革膳田、均粮、溢地、典铺、房号、练饷之类是也。其益之而疑于重复者，颜料、蜡、茶、弦箭、胖袄之类是也。……若夫蜡茶弦箭与颜料所列之瘠漆铜锡等，其异时已以八分折料附征于秋粮，今没其折料之名，而再征本色之料，细民得无感欤？”在杂税项目下，花布税原额12两，清初加增28两；猪牙税原额7两5钱，清初加增12两5钱；茶税原额10两，加增

5两；当税原额5两，加增5两。⑧直隶灵寿县，顺治年间每亩加增花绒4毫、裤鞋银2厘6毫。⑨成安县，顺治十四年(1657)奉旨除正供外，“每亩征停免银一分五厘五毫”。⑩部分地区新增赋税额构成应征税额的内容之一。这对全国赋税的总水平也具有提升作用。

三

实物改折及折价变动是清初浙江省赋税征收额中第三大加增内容。

李之芳《赋役详稿》称，茶叶、农桑绢折、黄白生绢丝绵折银、乌梅疹子生漆历日黄白榜纸折银等项，共加增银11714余两，此系各部会议苏民开明逐款题准改折奉文加编的。这类实物征收项目，在清初通过改折征收，便使赋税征银额加大。如果清初物价较之明代不变，那么改折的影响只是使赋税结构变动，实物减少，货币增多。而实际上，清初经过明末以来的长期战乱，经济凋敝，物资匮乏，物价上涨处于高峰期，其以时价折征的赋额必然高于明代实征赋额的价值银额。以此定立应征赋额，使其较之明朝水平有所提高。李之芳还称，清初修纂的浙江赋役全书中所载南米一项，原来额载每石7钱，今以1两5钱加增至93498余两，载入全书，此系部院陈以本色输运累民题准改折奉文加编。⑪此项明确说明南米折价较原来提高一倍多，此项应征赋额也相应增加一倍多。这是货币因素对赋额产生的影响。

关于浙江南粮一项折价和赋额变动的情形，李之芳提供的材料表明，浙江省南粮，共额291003石7斗8升51合2勺5抄，内除杭嘉湖三府全书额载本色外，如绍金衢三府水兑正米2488石2斗3升6勺1抄，每石加耗2斗5升，其正耗米3110石2斗8升8合2勺6抄2撮2圭，连耗每石折银7钱，共该银1741两7钱6分1厘4毫2丝7忽。此处所说的折价7钱，是将耗米2斗5升归并于一石之内而共得7钱。又折色米173265石8斗7升，无耗，每石亦折银7钱。通共正耗米176376石1斗5升8勺6抄2撮5圭，载在全书，此系明季节年征解旧例。自清朝建立以来，以上本折二项俱解本

色，民称苦累。随经部院陈某题明改折，内除扣留三府给驻防镇兵月粮及解省征给本色米共36289石8斗8合9勺3抄，又绍郡山会二县秋米抵会南粮解省留镇米19304石5升1合1勺6抄2撮5圭，实应改折米120782石2斗9升8合1勺7抄。每石题定折银1两5钱，解充饷用。并前每石内加2斗5升耗米，亦计石折银。“是耗米亦与正粮同科，而正粮之外，复加增一项耗米之数矣。”⑫李之芳请求减除耗米折价，得到允准。但南米折价从每石7钱提高到1两5钱，却仍被沿袭下来，构成赋税增额的重要部分。

折价提高使应征赋额增大、负担加重所表现在上供物料方面的情形，李之芳感触犹深。他在编纂浙江赋役全书过程中称，“顾犹有颯然虑之而未安者，厥有二事，角价折数太浮，物料临时估值是也。”⑬关于浙江牛角征解及改折情形，李之芳称，牛角一项，自顺治三年间，以弓张改换，每岁共该2万2千副，每副额价2钱9分，共载额银6380两。而牛角并非浙江所产，费累繁多，按院杜亦以牛角采办维艰，具题改折。遂接准工部咨开：“议将六七八年拖欠牛角，照依该按臣所请，每副折银四两解部。其九年以后牛角，仍照原额征本色起解以备兵需，俟各省全解积多之时，再行酌议可也。”所有四五两年牛角一项征解属户部管理，又户部咨开：“四五两年拖欠未完原奉恩诏蠲免，但已征在官给发在解者，岂容干没，当如该按臣所议，每副牛角俱照四两尽数折银解部可也。”⑭可见，中央工、户等部，通过牛角折价的提高，来加大赋税征收额，使人民负担成倍加重。对此，李之芳指出，“自八年以前折价四两，在承解者虽免于采买驳换之劳、独立转输之累，而较于二钱九分之原额，取诸民间已十有余倍矣。如是每亩加编，每岁应于原额六千三百八十两之外，通省加至八万一千六百二十两有奇。若四五六七八年一时并加，将至四十余万。民脂有限，何以堪此种增派乎？”有鉴于此，加上顺治九年仍征本色，李之芳称，“全书之内必须详定不易之式，方为经久。即其初议折四两者，不过因一时物价

腾踊，倘将来百货臻聚，市价齐平，则此四两岂堪示后？”“为今之计，合无比照旧额量增数倍，咨达大部，勒入成书，用示画一以便科征。即或数岁之间，贵贱不齐，尽银办解，亦为至便。”^⑮李之芳请求将牛角折价略予降低，但并未得到落实，后来浙江牛角一项折价仍为4两一副。

⑮

牛角折价太浮，远远超出了人民的承受能力。从其执行情况看，从未实现足额征收。“自奉文将六七八数年并折以来，司府州县迫于考成，催呼督责不遗余力，曾见慨然完纳者几何家、欣然掣销者几何批乎？职是以深知折价悬额徒多，终无裨于军需，莫能完解也”。折价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是征额莫能完解的基本原因。具体来说，其不能如数完解的缘由表现在三个方面。“缘其先全书旧额每副仅得二钱九分征给，非有四两输之有司而给之解户。一旦改折，骤增至十有余倍，责其悉索以从，将何措应？况其苦于完纳者，政坐额价之少。若有四两则早已输解，何至今犹瞻延乎？”这是第一。“若按亩加编，每岁应于原额六千三百八十两之外，通省加至八万一千六百二十两有奇。……今欲会计取盈，何难免竭民膏以副功令。但疆不加辟，而赋税日加。百姓岁入几何，堪此种种叠派乎？”这是第二。“迨至九年，复征本色，前之积累未清，而后之追呼复至，膏血有限，催督相仍。虽拮据于卖谷贸丝，终无补于医疮剜肉，惟有悠悠岁月而已。其不能完者三也。”^⑰这种牛角浮价形成的高赋额对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困扰。

牛角之外，本色钱粮蜡茶药材颜料诸项款目，“今昔之价不相若，真有或相倍蓰、或相什佰者。如银瘡一项，当日原价每斤止四钱六分，今且腾至六两，较之畴昔，何啻天渊？”^⑱再如黄蜡一项，“全书额价二钱，明季尚以价浮内扣银三分充饷，颜料各款额载价银九千一百九十两二钱三分九厘零，亦以价浮内扣余银四百九十七两二钱一分三厘。今较之旧额，黄蜡价倍于三而银瘡等项又价倍于十，以致解办维艰。昔以价浮而扣减于民，今以价昂则请增于官。”^⑲物价上涨，地方官只有向人民加增赋税征收数额。

编纂赋役全书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李之芳主张和处理牛角折价一样，“请行咨明比照旧额各请量加数倍编入成书以为程式，即物价间有低昂，亦可尽银办置。斯亦永久良法，官民均赖者”。^⑳

我们知道，物价是变动不居的，如果按某一时期的物价来确定赋额，自然会影 响人民的负担。然而，在李之芳看来，“今不编载成规以俟临时估价，其流弊必至不可胜言者”，主要表现是，“异日者，必致经承藉口于采办之艰难，而妄行多派；有司失权于物价之虚实，而听彼奸欺；百姓则又贸无所稽查，而任其颠倒。”为了避免这种现象，便须将改折赋额固定下来，形成定制，以便遵守。但是，这么一来，由于固定下来的折价额缺乏随物价涨落相应升降的弹性，因而对人民的实际负担量造成影响。就全国而言，清廷在顺治年间完成了各直省的赋役改折工作，除漕粮和军米仍征本色外，其余一律折银征收，折色银占主要地位。折色的标准是依照顺治年间的时价，当时各地物价的情况一如上述浙江省，处于大幅上涨的状态。改折征银便使各地应征赋额相应上升。

四

从以上对《赋役详稿》所提供材料的分析，可见清代赋税应征额的构成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万历年间未加派辽饷前的原额，一是清初新增赋额。清初新增赋额部分，又分为对辽饷加派的沿袭、部分清初新增加派的改折和因折价提高导致的赋额加增三项。李之芳在总结所主持编纂成的《浙江省赋役全书》时称，“是编于加减抵算之外，比照旧刻，共实增银五十六万四千零三两六钱八分三厘二毫九丝三忽六微三尘一渺。”^㉑所谓旧刻，系指明万历年间未加派辽饷前的赋役册籍。他并说明了在旧刻之外，新增赋额的项目和缘由，其主要内容为：（1）九厘银一项原加田地山亩并详加水脚共该银423217两余，此系明季万历四十六、七、八年则例，奉部文查明原数加编；（2）加增箭弦胖袄民七军器等项共银35920两余，此系顺治三年户部题定酌价便民折解加编者；（3）茶叶农桑绢折黄白生绢

丝绵折银乌梅疹子生漆历日黄白榜纸等项共银 11714 两余,此系各部会议苏民开明逐款题准改折奉文加编者;(4)南米额载每石 7 钱,今以 1 两 5 钱加增至 93498 两余,此系部院陈以本色输运累民题准改折奉文加编。②这样,就使得清代的赋税应征额不仅比万历年间未加派辽饷前的赋额高,而且也高于万历末年的赋税应征额。从清顺治年间全国田赋的实征情况与明万历年间比较来看,也可见赋税征收额变动的趋势。万历三十年(1602)田赋征收情况是:(1)夏税米 133403 石、麦 4534043 石;(2)秋粮米 23701801 石;(3)丝绵 314644 斤;(4)丝 224 斤;(5)绵布 362411 匹;(6)绵花绒 374878 斤;(7)绢 148129 匹;(8)阔梭布 33000 匹;(9)土苎 47774 匹。③万历三十年(1602)夏税秋粮米共 23835204 石,如一石折银按 1 两计,则为 23835204 两;麦 4534043 石。如以这两项与顺治朝地丁钱粮统计中的征银与米麦豆两项数字相较,自有统计的顺治八年(1651)始,麦石数就超过万历数额(顺治八年征银 21100142 两、米麦豆 5739424 石),而自顺治十四年(1657)始,无论征银额(与万历夏税秋粮米折银数相比)抑或麦石数均超过万历三十年的水平(顺治十四年征银 24366365 两、米麦豆 5835940 石)。④这一年正是全国性赋役全书编纂告竣颁行全国的年份,该年实征额的升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确立的赋税应征额大大超过明代万历旧额的事实(实际上,实征额低于应征额,因为有逋欠和政府临时蠲免的存在)。由此可见,清朝初年定赋时所确立的赋税征收目标通过明季部分加派的沿袭和折价提高等,在明万历年间的基础上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清初确立的高赋额,造成两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大大加重了民众的赋税负担。首先,以万历旧额为定赋依据,在清初人丁和地亩都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出现包荒包课的现象,各地将赋税原额摊派在现有人丁和地亩之上,使得纳税单位的负担更趋沉重。其次,辽饷加派的沿袭和新增加派以及因折价提高所加大的应征赋额,使得清代民众的赋税负担重上加重。另一方面,这种升高了的应征赋额为清政府提供了充足的财力保证。正是以此为基础,清政府才在康熙雍正年间得以建立起以定额化为中心内容的赋税制度。

①③⑥《清世祖实录》卷 112、卷 6、卷 112。

②①②②《赋役详稿》“总详纂修款项文”。

④⑤《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 152、154 页,中华书局,1978 年版。

⑦《赋役详稿》“详留军储各款登答文”。

⑧康熙《宁化县志》卷 5《赋役志》。

⑨康熙《灵寿县志》卷 4《赋役志》。

⑩《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真定府部·赋役考》。

⑫⑬⑭⑮《赋役详稿》“详议纂修条款文”。

⑯⑰《赋役详稿》“详议牛角并本色料价尽银办解文”。

⑱⑲⑳《赋役详稿》“条议牛角物料减定价值并尽银办解揭贴”。

㉑参见秦世桢《抚浙檄草》“驳改全书”、“驳全书摘款”条,载《清史资料》第 2 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㉒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 198—19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㉓顺治年间地丁钱粮统计参见陈振汉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第三分册(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作者何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讲师(100872)

责任编辑:郭秀文



语
言的
使用
在社
会人
际交
往中
起着
十分
重要
的作
用。
社会
上涉
及语
言使
用和
语言

交际的场合都必须讲究语用,因此语用学同社会的关系十分密切。里奇(Leech, 1983: 11)将普通语用学(general pragmatics)分为语用语言学(pragmalinguistics)和社交语用学(socio-pragmatics)两大组成部分,并指出社交语用学是语言与社会及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一门学问。法索尔德(Fasold 1990: 147-179)则直接将语用学的一些重要课题,如会话含意、言语行为、前提、指示和礼貌语等,列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认为语用学的许多课题都涉及说话人所处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他还指出,按照欧洲大陆传统,他的《语言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一书的整个内容都与语用学有关,是宏观语用学的内容。而根据梅伊(Mey, 1993)的《语用学导论》(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宏观语用学的研究课题之一正是社会语用学(societal pragmatics),着重探讨语言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关系。

语用学也研究话语理解,它涉及语言的心

理的认知,是语用学中较新的一个研究内容,但从语用学的整体研究来看,有更多的学者热衷于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对语言作动态的(dynamic)研究。要对语言作动态研究,就离不开社会。如果说,社会语言学家感兴趣的是了解语言使用中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反映社会在某一特定时期的语言状况,那是对语言作静态的(static)观察;而研究动态语言的语用学家则着重描写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如何使用语言去改变或维持某种局面。语言的动态研究涉及人们如何运用语言去适应自身和社会的需要。

社会与语用功能

人们的言语交往都是处于某个特定的社交语境(social context)中进行的。社交语境主要指说话人使用语言和听话人理解语言时客观共处的环境。言语交际双方心理上的认知环境各不相同,但他们却共处于同一的社会环境。交际双方共处的社会环境(即社交语境)直接影响双方对话语的理解和表达,如果他们对社交语境有足够的了解,并能恰当地加以利用,他们的言语交往就能获得较好的语境效果,交际也就取得成功。

析而论之,社交语境的作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变笼统为具体。人们顺应社交语境能将笼统的意义解释为具体的意义。例如:

(1)甲:怎样?

乙:老规矩。

这个对话十分笼统。但在具体的社交语境中,如果甲是早晨卖小吃的个体户,乙是老主顾,那么乙说的“老规矩”就可能是甲十分熟悉的“一碗豆浆,两根油条”;如果他们是老棋友在下象棋,乙的“老规矩”则可能是让对方先走。总之,顺应了社交语境,听话人就可以作出推理,将话语中的不确定意义给予确定。

(二)辨明话语之暗含。顺应社交语境交际,听话人能通过话语的字面意义理解话语中的“暗含”。例如:

(2)A:近来 Bob 好像没有女朋友。

B:可他每个周末都开车到 Newcastle。)

只有类似下面交际语境能越过 B 话语的字面意义,完满地解释其中的暗含意:

a. Bob 有女友在 Newcastle, Bob 每个周末都去看她;

b. Bob 在 Newcastle 公务繁忙,周末也不得休息,无暇顾及找女友;

b. Bob 周末在 Newcastle 有许多应酬或消遣,不需要找女友……等等。

(三)辨正话中之反意。顺应社交语境,听话人才能解释说话人用特定语气或特定词语说出来的反语。试比较下面的话语在两个不同语境下的相反含义:

(3)语境 a. 天气晴朗去野餐。

A:今天可是野餐的好天气。

B:(高兴地)今天确实是野餐的好天气。

(3')语境 b. 他们去野餐,可是天公要下雨。

A:今天可是野餐的好天气。

B:今天确是野餐的好天气。

(四)排除歧义。顺应社交语境能使听话人排除话语的歧义。例如:

(4)唉,我这个孩子不会讲话。

这个句子既可表示这个孩子是个哑巴,无说话能力;也可以表示他因腼腆而不会说应酬话;也可以表示他生性内向,不善言表;也可以表示他不懂礼貌,说话不知轻重,出口伤人……如此等等。只有在明确的社交语境的帮助下,听话人才会获得准确的信息。

(五)作合乎逻辑的推断。只要顺应社交语境,一些不符合逻辑的话语可以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例如:

(5)高尔夫球玩了 John 啦。

我们说这个句子的语义不通。但如果 John 在高尔夫球场上接连失误,社交语境就会越过说话人这个不合格的句子,作出合理的解释:John

可能入球洞数少,或者大大高于标准杆数,一败涂地,因此引来这样一句嘲讽的话。

社会经济与语用

社会经济环境使语言的使用具有时代特色,并能迅速而及时地反映出前进的步伐,是语言对社会的直接写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语用同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特别密切,一些与经济目的息息相关的社会用语在现实生活中逐渐被广泛使用,担负着社会交际的任务。

近年来,随着语用学,特别是社会语用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出现了语言经济学(economics of language)。这门新兴学科从经济的角度观察社会语言的现状及其历史变化,评价语言政策和提出有关建议和规划,研究语言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

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实施市场经济政策已近 20 年了,在这 20 年间,我国的语言状况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语用问题直接受到经济的影响,它与商业经济生活的联系尤为密切。因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随着对外交往日益频繁,社会语用包括汉—英双语语用,也得到了丰富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现象。

一、语言交融现象的出现

当前,社会语用表现为语言从单一向双语(甚至多语)化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大城市的经济迅猛发展,为了方便对外交往,英语作为外语在我国经济活动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国内使用汉、英双语的场合多起来了(如商品的包装、产品说明;市区内公共场所、地段;广告、标志用语等)。此外,香港、澳门地区传统使用的粤方言,随着那里的经济贸易首先进入广东,并与广东地区的粤方言结合北上,带动了北方的经济。为了同港、澳同胞和广东人民做生意,北方地区掀起了学粤语的热潮;与此同时,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那里的人民也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积极地学习普通话了。至于广东,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广大地区,随着同北

方和台湾同胞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普通话的使用更加普及了。

多少年来,我们国家的语文工作者为改变以方言为主导语言,实现民族大团结,大力提倡推广普通话。如今,由于经济交往的需要,方言的经济价值提高了,我们已不能只求实施单一化的普通话交际。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我国的语言生活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说北方仍以普通话作为主导语言,那么广东粤语区的语言现状是粤方言+普通话;客家话地区或闽南话地区,则是客家话或闽南话+普通话+粤语。总之,从总体上看,普通话和粤方言的辐射面越来越广,出现了一个粤语北上,汉民族共同语、代表汉语规范的普通话南下的局面。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国现时的语言状况多少会给我们的汉语带来负面的影响,出现汉语—英语、普通话—英语—方言的双语和多语交融现象。这些现象实际上是汉语规范受英语和方言的冲击引起的。数十年来,早已在我国报章中消失了的方言,如今在一些地方报刊中又被大量使用;在一些沿海地区,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和报刊上的语言,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英语、方言(如粤语)与规范汉语混在一起,造成语码混杂、交融,不三不四的局面。今以广东粤语区取例,即可略见一斑。

粤方言与英语组成混合语码,只有操广东方言的人才能听懂的,如:

(6)你中午 call 我,一齐去食 lunch,点啊?(你中午打电话叫我,咱们一起去吃午饭,怎么样?)

普通话与英语的交融,这在南下广东工作的北方同胞与当地广东人相互交往中极常见:

(7)我的 office 就在对面。

粤方言用汉语的标准发音说出来,这种现象在本地青年学生之间,或当地广东人与在广东生活的北方同胞之间的对话中相当普遍:

(8)你有没有搞错呀?这单生意是我跟的呀!放心吧,我会搞掂。(你怎么不知道这笔生意是我负责联系的呢?放心吧,我准能成的。)

普通话夹杂粤方言,甚至普通话、粤方言、

英语混杂在一个句子里,出现在报章上,那是过去很少见到的混乱现象:

(9)兴许那天是周末,兴许那天音乐发烧友碰巧聚到了一起,整个晚上有人点歌,更多的人走到场地中一展歌喉,其中不少衣着入时的 modern girl。(《深圳特区报》1993/8/4 第 10 版)

其中夹杂了粤方言新语“发烧友”(爱好以至入迷者),又混进了英语(意谓“摩登女郎”),这可算得上是土洋并举的杰作了!

二、对汉语规范的冲击

社会经济中的语用不但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它还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是了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同时,社会经济中的语用也反映了生活在这个社会的群体的整体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精神面貌。

市场经济大潮使汉语直接受到了冲击,词语被乱借用、乱套用、乱“创造”。

(一)乱借用。为迎合商品宣传的需要,营销策划者不惜将汉语的一些固定表达方式肆意曲解,特别是利用谐音、近义,或有意利用错别字来篡改成语。其谬种流传,误导读者,给青年学生树了一个坏榜样,已受到舆论的谴责。例如:

(10)一明(鸣)惊人(眼药广告)、咳(刻)不容缓(治咳药广告)、百衣(依)百顺(服装广告)、骑(其)乐无穷(摩托车广告)等。

(二)乱套用。为招徕顾客,促销者打起“语言使用标新立异”的主意,随意套用词语,已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乱套的结果是,与吃饭、穿衣有关的套餐、套装,在广告中被用来形容一组歌曲或音乐,说什么“音乐套餐”、“恭喜发财音乐套装”;征登电视广告也被电视台比喻为推出新年贺岁的“广告套餐”和“日夜通(即日夜播放的)广告套装”。

词语乱套还见于城市新宅的命名,如一幢或几幢多层楼房有被称作“花园”、“广场”的,经营家具的商店被称作“家私城”,提供电子游戏机、“卡拉OK”等娱乐场所的被称作“娱乐城”,分明在中国国土上,却称作“加拿大花园”、“蒙

地卡罗山庄”(Monte Carlo 在欧洲的摩纳哥公国,是世界著名的赌城!);分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里,却有“曼哈顿广场”、“华尔街金融广场”、“XX 帝国大厦”……①

(三)乱“创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创的词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但它们大部分只用在方言中,尚未完全融入汉语规范。新词语进入规范,完全是市场经济效应。它们只有在市场经济活跃的环境中才有可能被收入汉语规范之中。例如,义谓出租小汽车的英文译音词“的士”(taxi),人们为截停出租小汽车创造了“打的”一词。这个说法似乎渐渐地被接受了。北京、天津等地经营出租小面包车,还相应地制造出“面的”、“打面的”等说法。最近更听说有出租吉普车的,什么“吉的”、“打吉的”的说法也听到了。《羊城晚报》1996年8月4日第10版刊登朱朱写的《打“人的”》一文更精彩地写道:

于是有了京津及北方各大城市的打“面的”(小面包车);武汉的打“麻的”(全称“麻木的士”,人力三轮车);内蒙古的打“马的”(骑马)等等。在四川,爬山过坎可打“轿的”(两人抬的“滑竿”),平路坦途可打“板的”(人力平板车)。曾听一位四川某县城探亲回来的朋友谈起这样一件事,川人喜劝饮,一次赴宴,此君被灌得烂醉,且吐得一塌糊涂,“板的”拒载,归家不得,只好出高价雇人背了回去。朋友们戏曰:打“人的”。

人们担心,如果“打的”真的允许进入汉语规范的范围,说不定会有人如法泡制再“创造”下去,这样可能会使汉语面临污染的危险。

三、经济大潮中的社会用语

经济大潮下,语言使用中最突出的、变化发展最快的莫过于社会用语。社会用语的面很广,广告是社会用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这种影响将日益扩大。

经济大潮下刮起的洋风悄悄进入广告和产品包装的说明。人们以为有外文的包装(不管是什么外文,只求像“外文”),产品的身价就可

以提高。于是,工商企业纷纷请人为自己的产品包装和说明附上相应的英文文本,限于条件,有的厂商无法找到好的翻译,在汉语拼音文字尚未流行的时候,却用汉语拼音来代替英语,让它成了“优质产品的假冒伪劣说明”,而其汉语拼音错误也层出不穷。而那些使用汉、英对照的,不少英文拙劣,中文又有用繁体汉字的,标点符号也错误百出,同样不能容忍。据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调查(见《广州日报》1995年12月13日12版),完全没有出错的商品说明只有10%。有些洋文广告简直成了笑话。例如,有一家以生产快速方便面著称的企业推出一种“海蟹方便面”,畅销一时,但在介绍它的汤料成分时,没有见到蟹肉的字样,倒是出现了一个让顾客害怕的 Toad meat(癞蛤蟆肉)。又如,一种称作“高级异型威化饼”的包装袋上赫然印着这样一串“英文”:SENIOR WAFERS DIFFERENCE。难道这就是“高级异型威化饼”的英文译名吗?它的汉译意思可是“年长威化饼差异”啊!运到国外会有人光顾吗?会有经济效益吗?

不懂外文,但又顽固地用外文来抬高自己,结果往往弄巧成拙。最近,广州一著名厂家在当地的有线电视台发了一则广告,说它生产的酱油是高质量的“酱油 X.O.”。广告设计人以为,既然“白兰地 X.O.”是白兰地酒中最香醇的,把酱油称作“酱油 X.O.”当然是指酱油中最好的了。可是,他可能不知道 X.O.是“40年以上陈酒”的略语,专指陈年的酒。②“陈年老酒”当然是最香醇的酒,但陈年酱油是好酱油吗?

带洋文的广告如此,纯中文的广告又如何呢?应当说,大部分中文广告都是好的,健康的,而且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从社会语用策略的角度看,盲目追求“轰动效应”,有时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不是存心欺人的广告,如果不注意社会语用效果,“出口伤人”,是会惹出风波的。如,据《广州日报》1995年10月4日第12版载,河南省灵宝市电影公司所属的一家电影院做美国影片《真实的谎言》街头广告称:

聪明的人看《真实的谎言》；
有知识的人看《真实的谎言》；
傻瓜不看《真实的谎言》。

这则广告就因武断地将所有观看此影片的人说成有知识的人、聪明的人，而不看此片的则都是傻瓜，因而遭到消费者的集体抗议，以致要由法院调停。

社会语用的制约

社会语用问题，反映了人民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精神面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语言生活进入了一个异常活跃的时期，语言面貌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民族共同语对外语、方言的吸收，无论是速度还是数量，都为近几十年来所仅见，这些新鲜的词语格式，使汉语更加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对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造成了污染和损害。其中最突出的两大流弊是：语言的洋化和语言的粗俗化。对此，我们的语言文字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都要加强引导和向全民在这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制订出合乎实际的语言政策，用立法的手段维护祖国的语言。

当务之急，我们应当提倡以下几项，作为社会语用的制约。

(一)反对挟洋词、不懂装懂。我们的电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经常仿效一些不良的语言习惯，随便在汉语中加几个本可以用汉语说出来的英语，起不到示范说文明话的榜样，实在遗憾。例如，在节目最后为什么不說“再见”，而一定要来一下 Bye - bye 呢？为什么容忍广告词中说什么“keep fit 你块面”？前文提及的“酱油 X.O.”，也是不懂装懂的表现。

(二)反对带痞腔、粗鄙庸俗之语。在现时的社会交往中，有一些人的言语粗俗，往往出口成“脏”，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很有个性。尤为严重的是，这些语言垃圾已堂而皇之地进入社会精神产品领域，在某些文学和影视作品里，出现一些带“痞气”和“匪气”的语言，甚至以粗俗而费解的词语来作书名和片名。有一些社会语

用现象，虽然称不上“痞腔”，但粗鄙庸俗，比如将我们国家企业的厂长、经理称作“老板”、“波士(boss)”，甚至党的书记也一律被戴上“老板”、“波士”的头衔，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领导与群众关系变成了主仆的雇佣关系。

(三)反对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在经济大潮下的标新立异大多是在追求经济效益。不知从哪时起，文化这个令人尊重的字眼，也被标新立异者庸俗化了，前些年有“鞋文化”、“纸文化”，现在又有“药文化”、“浴文化”。标新立异的另一惯用伎俩就是讲“效应”。所谓“名人效应”中的“名人”，既有留芳百世者，也有遗臭万年者，四川大邑就利用刘文彩搞“名人效应”，推销标榜刘文彩享用过的什么“庄园老爷酒”、“地主家酒”，连当地滞销的臭豆腐也被宣传为刘文彩及其小老婆爱吃，真可谓不择手段了。

①政府有关部门(如广东省国土局)对商住楼住宅名称是有规定的，但举例中提到的“花园”、“城”等很多都不符合规定的要求。规定中还严禁使用人名、外国地名给住宅楼宇命名，但也暂未见执行。至于不是商住楼住宅区的“娱乐城”、“家私城”、“火锅城”等，还似乎未有立例查究。

②国外表示陈年白兰地的符号及略语 Vintage Symbols and Abbreviations):

3 年为☆, 4 年为☆☆, 5 年为☆☆☆, 10 - 12 年为 V.O., 12 - 17 年为 V.S.O., 18 - 25 年为 V.S.O.P., 25 - 40 年为 V.V.S.O.P., 40 年以上为 X.O.

参考书目

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论文集三), 汉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Fasold, R. (1990):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Blackwell, Oxford.

龚千炎等《北京市三条繁华大街社会用语规范调查报告》,《语言文字应用》1993 年第 1 期。

Henderson, W., Dudley - Evans, T., and Backhouse, R. (eds) (1993): Economics and Language, Routledge.

金定元《语用学——研究语境的科学》, 见西棣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年

版第 170 - 177 页。

Leech, G.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Mey, Jacob L. (1993):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毛利可信《英语の语用论》，东京大修馆书店 1980 年版。

郑达主编《南粤文化论丛》，广东高教出版社 1995 年版。

作者何自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510247)

责任编辑：陶原珂

论李商隐诗化情境的生成方式

□熊国华

由生活素材上升到诗歌艺术，从最初的审美感受到诗歌语言符号形成，这中间有一个如何筛选、提炼、整合、净化的创造性转化过程。这一过程就是“诗化”过程。其“诗化”程度决定了诗歌作品艺术上的高下与纯度，“诗化”的生成方式决定了诗的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

在李商隐之前的唐代诗歌发展史上，曾出现以李白、杜甫为标志的盛唐诗歌，和以韩愈、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诗歌两次高潮。在这种诗歌创作高峰耸立、群星灿烂、难以为继的局面下，李商隐还能创立一种“深婉精丽、富于感伤情调和象征暗示色彩的新诗风”，^①为唐诗发展增添了一片绚丽多彩的晚霞，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对“诗化情境”的创造与开拓。其“诗化情境”主要有三种生成方式。

一、高度的心灵化

诗是一种专主抒情的高级语言艺术。它用心灵化的意象语言实现对客观世界的重整,以最直观、最富于想象、哲思和美感的形式探求宇宙人生的真谛,以求得精神的超越和心灵的绝对自由。人在现实生活中,常感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和社会环境的挤压,个体生命面临各种各样的困扰而陷入某种不自由的生存状态。诗歌精神的本质,恰恰在于超越世俗的生存困扰而获得心灵的自由。其心灵化的程度越高,诗质也就越纯粹,获得的创作自由和审美快感也就越大,情感的抒发也就更加挥洒自如。李商隐的优秀诗歌,都是高度心灵化的精品,试看《锦瑟》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是李商隐最受读者喜爱,也是历来争议最大的诗作之一,迄今有几十种解释,真是“一篇锦瑟解人难”啊!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欣赏,也许会有新收获。首先,这首诗的成功,主要在于创造了一种纯粹的诗化情境。作者无意于具体事件的叙说和客观景物的描绘,“锦瑟”只是诗人用来起兴和借题发挥的“道具”。诗人在首联即以“无端”(没有来由,平白无故)的痴语形式,点出诗的主旨是“思华年”,即对已经逝去的美好年华的回忆与思念。中间一联用了四个高度浓缩凝炼,又互不相关的典故,构成了一种美丽而又感伤、蕴含着多重复杂人生感受的诗化情境。最后用“此情”总收全篇,用“惘然”表达迷惘眷恋、若有所失的心境。正因为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珍贵的,青春一去不返,李商隐这首诗对生存的迷惘、悲恸、伤感和恍惚情思,很容易在人们心中引发类似的思想感情,产生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其次,这种诗化情境是高度心灵化的,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经过心灵的熔铸改造而成的美学空间。无论“庄生晓梦迷蝴蝶”、“蓝田日暖玉生烟”,都不是现实生活的再现,也不是客观景物的模写。时间与空间、主观与客观、现实与梦幻的界限,在这里都是不存在的。诗人用心灵编织事件,用想象重整现实的映象,将自然景物与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幻想象、对“华年”的追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凄美朦胧、如梦似幻、似幻还真的诗化情境。我们很难分辨诗中的“蝴蝶”究竟是历史典故中的蝴蝶,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蝴蝶;也很难说清“蓝田日暖”是客观世界中实有的景物,还是诗人头脑想象中的景物。这种

诗化情境,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既是现实的也是想象的,既是经验性的也是超验性的。它无主客之分,心物之辨,虚实之异,内外之别。它是超越了具体事物的人的存在状态,作为人的整体存在的体验而呈现出来的诗学境界。相对于传统的囿限于具体情景事物描写的诗作,李商隐的这种写法无疑是一个新的重大突破,它使诗歌在有限的文字内,蕴含了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情感内容,超越了时空界限,极大地扩展了诗歌文体高度概括地表现生活的能力。

现实生活必须经过心灵化的处理,才能成为艺术。诗歌是人类生活和心灵的表征,相对于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来说,心灵化的处理尤其显得重要,也是创造诗化情境的重要生成方式。李商隐的优秀诗作,无不带有心灵化的印记。

二、深沉的情绪化

长于抒情是诗歌文体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诗歌能够感染人打动人的主要原因。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缘情而绮靡”、“感人心者莫先乎情”,都是强调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力量 and 作用。因此,“诗化”生活的重要一点,就是使客观景物和生活事件“情绪化”,构成某种特定的情境氛围,使读者沉浸其中而受到感染。请看他的《代赠二首》其一:

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

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这是代人写的赠别之作。诗人通过高楼、黄昏、玉梯、残月、芭蕉、丁香等景物描写,创造了一种依依惜别、愁绪满怀的诗化情境。尤其是最后两句诗,用芭蕉心卷缩未展和丛生绒结的丁香花蕾,来象征一对恋人离别时各自郁结不解的愁绪,使人感受到一种沁人心脾、无法排解的忧愁。芭蕉和丁香是大自然中的客观景物,本身无所谓悲欢忧喜,但一经诗人借其外部形状特征加以“情绪化”以后,就带上了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构成了一种情境氛围。

李商隐敏锐的感受能力和深刻的情感体验,使他诗中显现出来的情感思绪十分丰富多样,从各个不同层面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而且与其身世遭际、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有一定联系。有的诗表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奋发精神和豪迈情绪,如“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横行阔视倚公怜,狂来笔力如牛弩”。有的诗针对晚唐社会藩镇割据、宦官擅权、朋党倾轧的黑暗现实,表现出忧虑、激愤、憎恨情绪,如“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江风扬浪动云根,重碇危樯白日昏”、“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有的诗出于寄人篱下、

漂泊沉沦的不幸身世和国运衰微,表现出孤独、迷惘、感伤、颓丧的情绪,如“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弦惊破梦频”、“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前人曾用“深情绵邈”、“沉博绝丽”来评价李商隐的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李诗深沉的情绪化的特点。这在他的“无题”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第一句化用了乐府《西曲歌·作蚕丝》中“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的诗意,后出转精,“丝”与“思”谐音,是民歌常用手法;第二句中的“蜡泪”常被用来象征别离之恨,杜牧《赠别》诗就有“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之句,但不及李商隐这句精炼和沉痛。李商隐这两句诗用新颖、贴切、深刻的比喻,描写了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挚爱思念和终身不已的别离之恨,其思绪的缠绵和情感的沉郁,后人几乎无以过之。再如“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写恋爱双方远隔重山,相思无望相见,心念成灰的绝望心境,都是以爱情的残缺和悲痛感人至深的名句。

深沉的情绪化,是李商隐“诗化”生活、创造“情境”的重要方式之一。因为他在政治上抱负远大,却一生沉沦不用、穷途抑塞,在生活上追求美好的理想,却屡遭不幸、漂泊流浪,这使得他抒发的情绪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典型意义,曲折反映了封建时代被压抑的知识分子忧郁苦闷的心理和晚唐腐败黑暗的现实生活。李商隐诗中抒发的迷惘、感伤、激愤、绝望情绪,在一定程度上与晚唐社会理想幻灭、颓废没落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带有明显的晚唐特色。

三、巧妙的意象化

诗歌语言基本上是一种心灵化的意象语言。这是诗歌语言有别于散文和小说叙述语言的特征之一。诗化情境的生成,有时可以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但这必须是感情积压到相当程度,采用如火山爆发似的方式喷发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诗人不是用抽象的名词概念和直接的议论,而是藉鲜活、独特、丰满的意象来表达人生经验和情感体验。因此,如何使生活感受意象化,进而构成一种诗化情境,是对诗人创造性才华的严峻考验。

在抒情方式上,李白多直抒胸臆,以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浪漫情调感染读者,主体凌驾于客体之上,诗中的意象受主观感情的驱使,或者作为一种陪衬。杜甫则多对景物作客观冷静、真实细致的描写,寓情于景物和叙事之中,主观感情一般不作直接宣泄,而是隐藏在意象

的背后。李商隐不乏用这两种方式写出来的佳作。但晚唐衰颓腐败的社会现实,使诗人的心境更加趋于复杂,寄人篱下的悲剧身世也使他的感情更加内向化,更加如梦幻飘忽、细腻幽邃。因此,他在抒发感情的时候,更多的是以主观心象融合现实生活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中的物象,经过心灵的重铸改造,构成一种主观印象色彩很浓的意象,委婉含蓄地表达内心世界的隐秘和难以言说的衷情,增添了一层朦胧哀怨的色彩。《锦瑟》中间四句就是非常意象化的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借用了《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典故,用以表现一种人生如梦、变幻无常、不胜迷惘的心情。“望帝春心托杜鹃”用了《华阳国志》中蜀王杜宇死后化为杜鹃、口中啼血的故事,诗人将自己忧国伤时之悲、身世沉沦之痛都寄寓在这一哀怨悲恻的意象之中。“沧海月明珠有泪”,则揉合了《博物志》中鲛人泣泪成珠的故事和其它古代传说,构成沧海遗珠的意象,传达出了一种宁静深邃、纯洁孤寂、难以言说的伤感。“蓝田日暖玉生烟”则不知出处,据《长安志》载,陕西蓝田是著名的产玉之地,中唐诗人戴叔伦曾用“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来形容诗的意境,②李商隐也许是借此来表现美好理想的缥缈恍惚,可望而不可即。这些意象,都没有明确指示任何具体生命感受和情感体验的诗化情境,巧妙地概括了诗人的心灵历程。它不同于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那样洒脱,也有异于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直抒胸臆,在抒情方式上是一种新类型。

值得指出的是,李商隐诗中很多意象都是不确指的、朦胧的,很难说清楚某一句或某个字是什么意思,但从整体上又能感受到心灵的颤动和新鲜的审美快感。《锦瑟》一诗并没有描写诗人身世中的某一具体事件,只是通过一系列意象构成一种包容量极大的诗化情境,读者可以根据意象的暗示展开丰富的联想,作出多种解释,也可以将自己的人生经验移入其中,参与阅读诗歌时的再创造。这种意象的不确定性和多义性所构成的诗化情境,是一种开放式的空筐结构,它一方面包括了人生整体体验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又使这种丰富性大致限定在一个较宽泛的范围内,可供读者参与其中,充分发挥读者的审美想象力。再如他的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也完全舍弃了恋爱事件、人物、地点的具体描绘,而只是将爱情受到阻隔和相爱双方心灵的感应与沟通,借“彩凤”和“灵犀”这两个意象巧妙地表达出来。这种心理感受不仅仅是诗人个人的,也是众多类似心理感受的抽象和提纯,是能

够唤起无数读者心灵共鸣的普遍的人性感受。另外,这种感受十分微妙复杂,既有不能比翼双飞的痛苦,又有心灵沟通感应的安慰,两情相悦又不能结合,毕竟是苦闷的。然而,这种苦闷是带有欣喜的苦闷,阻隔中存在着希望。因此,“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阻隔与沟通、失望与欣慰的辩证交织,是多种复杂心象的矛盾组合,它不同于李白的“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相逢行》),也不同于杜甫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月夜》),它的诗意理会加朦胧,意象化的程度更高,能给读者带来丰富新鲜的审美感受,显示出不同于前辈诗人的独特性。

余 论

古今中外的诗歌,虽然在时间、地域、语言文化背景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在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方面却有共通之处。诗歌作为一种抒情性很强的文体,“情境”在古今中外的诗歌创作中是普遍存在的。相传为唐代诗人王昌龄所写的《诗格》,最早把诗境划分为“物境”、“情境”和“意境”。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又特别指出:“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王国维在这里明确了“物境”与“情境”的区别,肯定了有纯粹的“情境”之存在。当代学者范宁在《关于境界说》一文中主张复原王昌龄的“境界”说,不同意把“情境”与“意境”混为一谈。^③另一位学者陈良运,对“情境”更为重视,曾在《试说“情境”》一文中作了专门论述,主张把“情境”从“意境”中划出进行研究。^④

在西方,“情境”同样受到重视。歌德在谈到诗歌时甚至说:“有什么必要下那么多的定义?对情境的生动

情感加上把它表现出来的本领,这就形成诗人了。”^⑤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保尔·艾吕雅,在所写《论情境诗》中特别指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时代的诗人困扰不安的话,这无疑是情境诗的问题。”^⑥人类的情感是人性中的恒定因素,诗歌中的“情境”兼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特点。现代诗可以没有“意境”,但是不可能没有“情境”。“情境”是沟通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东方诗学与西方诗学的一个重要的“交汇点”。

李商隐诗化情境的三种主要生成方式——高度的心灵化、深沉的情绪化和巧妙的意象化,揭示了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符合诗歌的抒情本质和语言特征,对当前诗歌创作仍有值得借鉴的现代意义。

①刘学楷、余恕诚《李商隐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②司空图《与极浦书》。

③参见范宁《关于境界说》,《文学评论》1982年第1期。

④参见陈良运《试说“情境”》,《诗学·诗观·诗美》,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版。

⑤歌德《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0页。

⑥保尔·艾吕雅《论情境诗》,引自《西方现代诗论》,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467页。

作者熊国华,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510303)

责任编辑:陶原珂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梁钊、陈甲优主编,以下简称《珠论》)终于成书,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付梓问世,笔者有幸先睹为快。

读《珠论》,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其中的“流”字及其经济社会学底蕴。其缘因一方面是我国七大河流域的经济社会进步对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有重要意义,而目前我国的有关研究恰恰是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当今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困扰,很大程度上是“通道堵塞”或“流而不通”的表象。市场经济之精髓在流与通,借用中医界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真言,流与通的问题解决了,许多困扰也就迎刃而解。

沿此,我的神思自然淌回过去关于市场经济的一段思考。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当时想,按目标与路径(手段)一致原则,既然国家“要到何处去”的改革目标已经敲定,那么我们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工程就是要从理论上发现、证实既定目标的路径。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从何处来”(包括历史的源头和思想原点)而我们“现在何处”(包括现实起点及其逻辑判断与价值判断)这类问题。也就是说,对中国式市场经济的路径探

寻首先得从历史与思想两个层面厘清源头,梳理通道。后来的研究发现: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源头其实就在萌动商品交换关系,最初提出商

品经济制度的地方,具体来说,源头就在最先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在如同汪洋大海般广大的农村包围的企业。显然,我们不能离开这种源头去谈中国式市场经济,也不能离开大量小农生产方式包围这种特定的环境去谈中国式企业这一市场经济主体的制度创新。

承接这段思想,再读《珠论》,原先的市场经济理念在流域空间上得到了新的延续与扩张。如果说市场经济总得在一定的空间上运转,总得以一定的地缘关系为自然基础的话,那么在流域经济学的视野里,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商品关系源头应在中国七大河下游的沿海农村及其企业。就作为我国七大河之一的珠江(在流量上仅次于长江)而言,市场经济的源头则在地处南海前沿的下游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这里引入了“下游”的规定性,也就有了与“上游”的发展关系问题。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珠江三角洲的市场经济迅速跃居我国前列,并以“世界经济最繁荣的地带”而令世人关注”(见第30章)。然而,从市场经济的源头珠江三角洲出

发,逆流而上,直至珠江水系的源头,再顺流而下,我们发现一种“双向反差”。从珠江流域的市场经济源头出发,由东而西沿江河溯流而上,商品的可供量、市场的购买能力、产需市场的差价、供求关系、市场距离的远近、市场信息的沟通、交通运输条件的便利等因素的成熟程度逐

流域：验证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区间

——延真《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的一段思想

□郑英隆

次减弱(见第 28 章)。下游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品经济明显强于上游。以反映商品经济水平的主要指标来比较,地处珠江下游与上游的广东、广西两省区,1978 年、1990 年、1994 年三个年份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前者分别为 93.41 亿元、732.25 亿元、1851.36 亿元,后者分别是 42.34 亿元、206.45 亿元、416.50 亿元,且总量与递增速度仍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如以对外贸易指标分析,差距就更大了,趋势也更明显(见第 11 章)。而从水系源头出发,“珠江上游流域的滇、黔两省是我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之一”(见第 9 章);“中游地区承东启西,是中国大西南资源富集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珠江中上游地区同时是我国工业生产资源的富集区,云南素以铜、锡称著,号称‘有色金属王国’,贵州煤、磷居西南榜首,广西铝、锡、锰、建材和水能资源富集”(见第 10 章、第 23 章);“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然资源则相对贫乏,大部分原料及燃料,要从外地调入”(见第 23 章)。这是自然资源上的强烈反差。

还需指出两点,一、在流域下游,不同的区段亦存在着发展差异问题,有的甚至是极大的。看珠江流域下游的东江,“下游的东莞市、深圳市和宝安县,是广东省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上游的河源市则是全省经济最落后的区域,……。上游与下游形成鲜明的对照。1990 年,东江流域全区域工农业总产值为 303.06 亿元,其中仅东莞、深圳两市为 239.12 亿元,为总数的 78.8%;而上游区 6 个县(市)仅有 14.30 亿元,占总数的 5%还不到。1990 年与 1987 年比较,东莞、深圳、宝安三市县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4.08 倍,中游区 6 县(市)增长 1.22 倍,上游区 6 县(市)则只增长 30%,上、中、下三个区的发展水平,正好形成三级经济落差。……近几年来,这种落差越来越大,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见第 11 章;第 17 章)。二、反差具有多层次与综合性特征(见第 28 章)。除如上所说的差异外,还有交通电力差异(见第 17 章)、工业差异(见第 16 章)、金融差异(见第 2 章)、通信差异(见第 17 章)、人口素质差异(见第 3

章)、科技教育素质差异(见第 22 章)等。

基于这种反差,书中提出了上下游协作协调发展的思想。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其中关于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提法。如以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为龙头,拓展流域大联合,“形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大市场”(见第 30 章);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应向“中、上游地区不断转让技术,传播信息,促进整个珠江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见第 28 章)。还有就是把珠江三角洲市场经济起飞成功的原因及其以后发展方向放到整个珠江流域中去分析,这不仅打破了以往一些学者由于大大忽略了珠江三角洲地处珠江流域下游的区位优势而带来的研究局限,而且为整个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者说,“流经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广东的西江、北江、东江,奔腾而下,汇合成珠江,投向南中国海,在三江的汇合处,孕育出河网密布的、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它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见第 30 章)正是这种区位优势的来源决定了下游必需与上游协作,共同完成全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流域文明史表明,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使上游给下游带来了肥沃的土地,而生息于下游地区的人们在肥沃的土地上形成的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剩余率,正是不断扩大社会商品交换,取得市场经济进步的坚实基础。显然,地处下游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蕴涵着上游的“自然贡献”,同时也有责任维护,以至于可持续地赢得这种“自然贡献”;另一方面,中上游丰富的资源又必须取得下游的市场经济辐射,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并提高资源优势的附加值。这是珠江流域经济一体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由此,我联想到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检验性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世界各国共同探讨的全球性课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来说,更是重任在肩,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使两者相兼容。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解释,其实质在人与生态和谐共处的整体效益,它反对狭隘

的经济人本主义,要求从根本上处理好个体与整体、近期与远期、微观与宏观的关系。但还有一点必需清楚,实施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既然是可持续的,也就必须或必然是可检验的、可验证的。《珠论》给我一个启示:验证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区间应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文空间单元,并具备既是市场经济源头,又是自然关系源头的特征;流域显然是一种有效的验证区间。就说珠江,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相对完整统一的人文经济地理空间单元(见后记),从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出发,系统探讨其市场经济源头与水系源头的共生及其相互支持关系,无论对深化中国式市场经济理论,还是对制定、调整国家有关决策都有重要意义。

与上相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自然价值与市场价值的转换方式问题,这除市场对自然的交易方式外,更有现实意义的是市场交易形式与政府管理方式的协同关系问题。鉴于流域的特殊性与上下游差异的综合性、多样性,上下游经济发展的协调形式必须是多样的,可以是市场交易形式的,可以是利益同盟方式,也可以是中介组织调解,而基础性工作则要由政府协调管理。从《珠论》,我想,政府对流域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作用主要基于如下几点:(1)自然差异与市场经济差异的沟通、统一与大范围协作(见第24-25章)。(2)对关键性专有资源与市场交换方式发生冲突时的协调。(3)上游对下游发展的“自然贡献”,要通过政府管理的方式给予“价值返还”。流域的自然规定性要求下游地区的市场经济起飞与后续发展提高始终需

要上游持续的“自然贡献”,但由“自然贡献”引发的上游“自然亏损”必须得到填补,才能平衡,否则势必“竭泽而鱼”,失去上游活水。而这种自然亏损补偿是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说,必须靠政府“有形的手”来解决。(4)成本对称性与中介调理。水系依上中下游自然地理特点顺向运动,而经济价值则从市场经济源头出发,依下中上游路径作逆向价值运动,这就出现市场对自然价值的成本非对称性问题:下游对生产要素聚集的相对低成本,而上游培养与组织生产要素的相对高成本;这反过来又制约商品关系对上游生产方式的改造与发展带动,进一步强化上游生产的高成本循环。对此,政府或中介机构的调理不可少。

最后,从珠江流域看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与要求,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商品关系源头应在中国七大河下游的沿海农村及其企业。为此,中国式的市场经济要源远流长,要以特色打天下,就得研究中国这七大市场经济源头的共性与差异,就得研究七大河上中下游农村、农民的不同商品关系素质、缘由与现实,就得从七大河上中下游的不同落差与不同势能中寻求发展的动力与启示,就得从七大河上中下游的竞争性协作中拓展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而要实现流域上下游经济的一体化与协调共生,必须理顺市场经济源头与水系源头的协调关系,创新协调形式。

作者郑英隆,广东省社科联副研究员(510050)

责任编辑:谭湛明

一部大长志气的好书

——
《广东通史》古代上册

□姜伯勤

1996年4月，方志钦、蒋祖缘二先生主编，汪廷奎先生任分册主编，杨式挺、汪廷奎、李庆新、许宁英、何维鼎、陈摩人等执笔的《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了解国情乡情增长爱国主义见识的好书；是一部确立学术自尊心、自信心的佳作，读之使人志气从心底涌起。

一、以中国考古学的骄人成绩为依托写出历史新篇章

近半个世纪以来，新中国的考古学取得了举世震惊的骄人成绩，广东也不例外。

由杨式挺先生执笔的第一章《广东地区的原始社会》和第二章《不发达的奴隶制和岭南古越族》，显示了严谨的学术规范，包涵了丰厚的学术资讯。并且成功地将考古学、人类学和文献学融为一炉。

本书根据原始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推断，距今约13至14万年前的马坝人、峒中岩人、马坝

狮子岩飞鼠洞人以及8万年前的罗沙岩人等早期智人，其社会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萌芽阶段。到了距今约5万年至1至2万年前的封开罗沙岩人、广西柳江人和灵山人，封开黄岩洞、阳春独石仔等晚期智人的阶段，母系氏族公社已经形成，并且有了初步发展。

本书在论述岭南远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亲缘关系及区域文化独特风貌方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例如，指出“珠江三角洲的拔牙齿种与山东大汶口文化基本一致，应是受后者的影响”。又云：“迄今广东各地已出土10件玉石琮，一件玉石璧，我国玉琮、玉璧当是起源于江浙的良渚文化。”

德国著名东方学家艾伯汉(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年)1968年出版了《古代中国的地方文化：华南、华东》一书，研究地方区系文化的分布与关连，区别长江以南地区的火种烧耕文化与水稻耕作文化的区别。我国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也研究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并十分关注粤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硖文化。而本书则指出，江西清江樊城堆下层文化和粤北石硖文化，可能就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当中的赣江——北江区同一原始文化系统的两个类型。本书认为，在距今约4000—5000年之际，粤北石硖新石器晚期的原始居民，已与同期的湘、赣、闽、江、浙、鲁等地的原始居民发生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本书对石硖文化的关注，不仅找到研究远古华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乃至东南亚文化关连的基点，而且也从一斑而表明，《广东通史》一书是建基于我国80、90年代最新学术水平之上的一部佳作。

本书第二章论述了1990年在香港南丫岛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礼器玉牙璋，其形制无论是前端的刃或下端的阑齿，都近似偃师二里头。由此可见中原文化对环珠江三角洲的影响以及中原文化经粤北南传的痕迹。

南越王墓的发掘，也是广东省近年来名震中外的考古成绩。这些考古成就在本书第三章《秦代郡县的设立与南越国的开发》(何维鼎先生执笔)中有所体现。南越国大型墓葬提供了

大量当地铸造的青铜器。南越文王墓出土的铁鼎,说明本地熔铸技术不低,所出青铜印花凸板则表明丝织工艺技术水平不逊于楚地。

本书认为,从秦统一岭南到南越国时期的百年间,岭南设置郡县,在不发达奴隶制继续存在的同时,部分地区出现封建制并获得初步发展。两广出土南越国时期铁农具 110 件,“军垦”、“民垦”的经济活动,加速了岭南封建生产方式产生的进程。

新中国急速进行的田野考古的大面积收获,确实令人扬眉吐气。如本书所载,1989 年珠海市高栏岛宝镜湾发现的春秋——战国岩画,1972 年肇庆松山战国墓出土的错银铜奩,1983 年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全国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玉衣)、文帝行玺、龙凤涡纹玉璧以及同墓发现的波斯银盒,均为美不胜收;1955 年广东出土东汉陶船,1985 年梅县火车窑出土唐代青瓷碗、1982 年阳春出土南汉钱范、1969 年佛山出土端砚、菲律宾棉兰老岛出土北宋广州西村窑青釉刻花大瓷盆,都显示广东技术历史的进化。

本书其他各章也都十分注意以考古发现订正历史上的陈说。如第八章所论之南汉,《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谓刘岩于贞明三年八月癸己日改元乾亨,即以公元 917 年 3 月 8 日为南汉称帝之日,本书据《文物》1994 年第 8 期程存洁《新发现的后梁吴存镆墓志考释》,据该墓志铭,称帝之日为贞明三年(917)十一月一日。此为本书高度重视新的考古发见之一斑。

二、专业学术水平的新进展

本世纪上半期,日本学者中村久次郎于《史学杂志》发表《唐代的广东》一文,在漫长的岁月里,该文一直是关于唐代广东的详明研究。

今天我们读《广东通史》第七章《唐代广东经济的全面进展与社会文化的巨大改观》,深深感觉到,近半个世纪,尤其是近 10 年来,中国学者对于唐代广东的研究已“大为改观”,研究水平已有了耳目一新的进展。

第七、八章执笔者李庆新先生,于《中国史研究》1992 年第 4 期发表《论唐代广州的对外

贸易》一文,订正了坊间出版物乃至在学术界相当流行的、认为唐代已有“市舶司”的错误。在本书中进一步指出,唐市舶使的官署不是“市舶司”,而称“市舶使院”,在地方自成一系,独立于岭南当局之外,掌握着东南海外贸易的管理权与市舶之利,为中央提供丰厚的财政来源。这个发现非常重要,标志着近代唐代广州研究的新水平。

又如,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先生在《论唐代赋役令中的岭南户税米》一文中,认为岭南是一个“免收国税的特别区域”,朝廷豁免了岭南诸州的租庸调,赋税不用上缴中央,《赋役令》中的“税米”是一种地方税,即“户税”。本书经过考证,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指出“岭南正租征米”,“广州等调以癩布”,1970 年在西安市南郊出土唐开元间属县上缴的庸调银,此银可证广东有“庸”。由此证明唐前期广东存在着以租庸调为核心的财税制度,并订正了以往学者关于岭南为“免收国税的特别区域”的说法。

第八章《南汉的政治制度》也很有特色。南汉(917—971 年)是岭南历史上的第二个割据政权,是唐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与发展。本书指出,南汉前期尚能保境安民,注意民生,发展经济,以文治国,故使岭南在文学、史学、天文、历算等方面均有明显的进展,佛教理论更有新的突破,但由于奢华和暴政,国势转衰,终为宋朝所灭。本书又据《南汉金石志》等资料,对南汉制度进行了清理,指出南汉以文人和宗室诸王出任节度使,唐后期盛行的使府辟署制度和支郡制度在南汉已不复存在,节度使也不见再兼顾观察、营田、支度等使,说明节度使的行政、民政、司法权已被剥夺,而仅仅是边区要地的军事长官,与唐末和五代各国的节度使相比较,已发生质的变化,这是南汉政治的主要成就。——而以上的发见,也是本书的一项成就。

第十章中,汪廷奎先生在所执笔部分指出“宋室南渡后,两浙、福建、江西等路与广东的经济联系加强;广、潮二州文教发展较前迅速,终于遥遥超过粤北。”指出南宋广东商业的“沿海地区兴旺、东北山区萧条”的特点。又指出:“南

宋广州、潮州和其他沿海地区,人口增长,农业发展,经营米粮的商业较北宋时兴旺。同时,田赋折钱缴纳的部分又有所扩大,使投入市场的农产品更多。广东一部分盐改行客钞,由商人贩卖,遍及行钞盐的各城镇乃至墟市”。“广东不仅与两浙、福建沿海的海上贸易相当兴旺,而且与琉球(台湾)商船也有来往。”

汪廷奎先生在本书第十一章第七节论述了元代广东民间诗社的勃兴这一很有新意的论题。作者发现,广东元初首次出现了民间诗社,东莞宋遗民赵必辉,有咏梅诗五言绝句 14 首,说明与文人同立诗社,用传递、钱梅、酒边吟唱等方式唱和,至元朝末年,又有著名的“南园诗社”,并指出南园诗社的创立时期当约在至正 23 年以前。这一研究使我们注意到广东文化历史上的若干“开风气之先”的现象。

三、文献翔实与史识为重

由汪廷奎先生编制的本册《征引书目》,是一个有很好专业水平的书目,本书目可作为有志于研究广东古代史的必读书目来使用。

《书目》中列举乾隆刻本增城沙堤《陈氏族谱》等家谱 24 种。第十章第二节《两宋部分南移人口在广东的分布》一表,所征用族谱有广州中山文献馆所藏谢氏等姓族谱 100 余部。

本分册中,翔实的文献工作还表现为以唐代、元代的文集,纠正正史和方志的错误。

本书主编在《序言》中写道: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兼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以“史识”为重。

本册关于广东省历史上的奴隶制及封建化问题的讨论,体现了作者群的通盘性的史识。

本书认为,从秦统一岭南到南越国统治的 100 年间,在氏族公社加速解体的基础上,奴隶制有所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亦在“中县人”与越人杂处的地方产生,形成奴隶制、封建制和氏

族公社并存的局面。

自汉武帝平定南越至东汉末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国内外陆海交通的发展,番禺成为一大都会,广东境内大部分地区已基本完成向封建社会的过渡,进入封建社会。

广东地区的封建化问题又有两大地带的问题,东中部地区在东汉南朝时进入封建社会,西部则于南朝时进入封建社会。

广东地区开发的轨迹的研究,也显示了作者群的史识。秦的统一、南越王国的建立都促进了岭南的开发。唐代以前广州、封开、南雄等地处于领先地位。宋代岭北人口的大量南迁,加快了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南宋后期,两个三角洲的经济、文化地位超过了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粤北、广州和潮州而处于领先地位。

在民族融合的规律方面,本书认为,南朝时期,粤西俚人女首领冼夫人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又善于团结各族人民,冼夫人与高凉郡太守汉人冯宝结婚,成为古代岭南各族人民融合和团结的象征。唐宋时期,南越族已基本上与汉族融合,越、蛮、俚等古代岭南少数民族的泛称已从史籍中消失,只有少数溪洞俚人、僚人仍然保留着自身的特点,以黎、瑶、畲等族称载入史册。

总之,本书为我们讲述了早期古人马坝人以来的 13 万年的广东历史。广东,作为中华大地的临海的边陲,自古以来,一方面与中原先进地区有斩不断的交往,另一方面,则在近几千年演出赶先进、超先进的活剧。读后确实令人大长志气。

作者姜伯勤,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林有能

老树经霜志不摧

——读《卢叔度集》

□ 吴国钦

岭南古典文学学者、周易名家、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我佛山人”吴趼人作品的专家之一、中山大学中文系卢叔度教授因病于1996年10月21日逝世，终年81岁。令人不解的是卢先生竟然选择了10月21日——这也是吴趼人逝世的日子（吴于1910年病卒）。研究者和他的研究对象选择同一日西归，这是巧合，还是冥冥的故意安排，真叫人说不清楚。

先生字尚志，号征雁，1915年7月生于广东高州，194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如从1942年他任茂名师范学校文史教员算起，他已经舌耕50春秋以上！1949年至1951年，先生先后任香港高流湾渔民学校教员、香港南方学院院务委员、中文系主任、教授。1951年8月返回内地，历任广东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从就读中山大学到执教中山大学，卢先生是岭南这所著名学府半个世纪历史的见证人。

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至“文革”灾难，先生长时间被剥夺了“教”的权利，直至1977年大学恢复统考招生，才重上讲台。这时他已经62岁了！为了珍惜已经丧失多年的“教”的权利，先生意气风发，既上《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部分）的基础课，又讲《楚辞研究》等选修课，并被聘为研究生导师，教学工作十分繁忙。先生的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本来是最难学的《楚辞》，成了当时中文系学生最感兴趣的一门课程。有人说：“不少老师讲课，常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卢老师的课却一点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味道。”可见先生是“课如其人”，他的平易作风与切磋口吻，令学生如沐春风，77、78、79各级中文系学生至今谈起，依然啧啧称叹。

《卢叔度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主要选编

了先生三个方面的著述或作品，一是《先秦诸子散文讲稿》（《周易大辞典》序），二是《我佛山人文集》序文，三是诗作与书信。《先秦诸子散文讲稿》约5万字，条理清晰，要点突出，例证浅近，是这一讲稿最重要的特色。要达到这种境界，学术上非有深厚的根柢不可。先生的学术专长，他自己谑称为“专吃头尾”，意思是擅长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头”——先秦文学和“尾”——晚清文学。由于他学有专攻，攻有所得，因此《讲稿》对先秦内容丰富、色调各异、奇诡瑰丽的诸子散文精义的阐发与解读就恰到好处。

先生是《周易》名家，曾对意大利学者威士高（Cisco Coapanna）谈《周易》达七次之多，孜孜不倦介绍中华传统文化。他在《〈周易大辞典〉序》中说：“尝谓研治周易，首先要打破门户之见，象数、义理、训诂与考订并重，两派六宗合一炉而冶之，对周易的义蕴才能获得真知灼见。”对这些年来兴起的“《周易》热”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我佛山人文集〉序》是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约5万字。“我佛山人”吴趼人（1866—1910）一名沃尧，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享盛名的一位广东籍作家，著述颇丰，影响深远。除遐迹知名的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外，尚有《九命奇冤》《痛史》《情变》《最近社会齷齪史》等中长篇小说15部，短篇小说13篇，笔记小说、随笔杂录5部，笑话与寓言4部，戏曲2种（未完成），诗歌80多首，散文杂著2种，可谓著作等身。但过去对吴趼人的研究实在太少，其实何止对吴趼人，整个近代文学（或谓晚清文学）本来就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弱项，治古代文学史者常把它作为难啃的“尾巴”甩掉了，治现代文学史者又不把它作为源头因而不予理会。因此，《〈我佛山人文集〉序》首先全面向读者介

绍吴趼人著述的各种名目作品，如数家珍般将不同体裁作品发表的时间、署名、内容与有关背景材料予以推介，毕竟，这是第一次将近代中国这位杰出的文学家的著述编纂成文集，必须向读者全面介绍有关情况。《序》文另一内容是考订资料，并作一些必要的说明。如吴趼人尚有六种作品和一些诗作未入选文集，像《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一种，虽洋洋一百回，但“内容殊不足称道，是作者早期的试笔，里面原没有什么含蓄，无非游戏文章随便写写的。”（第 171 页）

《序》文对吴趼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公正客观，切中肯綮，绝没有“卖花说花香”、为研究对象护短讳过的现象。如《序》文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部吴趼人代表作品中几个正面人物的分析评价就很深刻，指出“这些正面人物形象是苍白无力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也没有出路，只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第 108 页）

《我佛山人文集》中有一部分是吴趼人发表于当时各种报刊之上未结集的散文篇什，先生说“有鉴于此，年来着意搜求，随见随录，除作者原著的自序、弁言、凡例、附识、附白外，仅得四十篇，……深恐零断散失，爰为编次，命之曰《吴沃尧散文杂著》，以飨读者”。（第 169 页）编纂者之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卢叔度集》第三方面的内容，是收录了先生部分诗作与书简，尤其是诗作，或即事名篇，或抒写情志，或喟叹人生，深沉醇厚，值得击赏。如“无题诗草”第 11 首：

俗言惨过判游刑，十载伶俜泪涕零。

梦里犹闻猩鼠号，依稀魂断斗牛亭。

这一首是写从“反左”到“文革”十年时间自身的悲惨遭际，先生“文革”时在中山大学校园内的惺亭被批斗，当时这个亭子被称为“斗牛亭”，被批斗的包括中文系大学者容庚等共 10 人之多。

有的诗作显然是写在所谓“五七”干校劳作的，如第 7 首：

老树经霜未尽摧，且将箩畚共徘徊。

斯文扫地寻常事，大雅扶轮实可哀。

第 9 首：

趁圩人散罗家渡，落日归鸦老虎亭。

嗟我龙钟迷远路，愿随岁月逐流星。

罗家渡是京广铁路上一个小站，“文革”期间中山大学五七干校就设在罗家渡小圩边的天堂山上。山名天堂，却一点也不像其名那么美妙，山路崎岖陡峭，老虎亭就是一个险要隘口。中山大学的教师、干部就在山上与箩畚为伍，诗中抒写了一个年过半百的老教师那种惆怅无奈的情怀。

改革开放后，大地复苏，先生诗歌的调子也轻快起来，如《戊辰年上之雅集》：“龙年万舞齐欢乐，盛世新声一主题。我欲狂歌惭力薄，无端老却着诗迷。”这是 1988 年元宵节老诗人们雅集时即席之作，狂歌兴会，酣畅淋漓，一扫七十老翁那种衰惫之态。尤其是《八十抒怀》《八十一抒怀》这一类诗作，精妙老辣，最堪玩赏。试看他逝世前不久所写的《八十一抒怀》——

历劫平生志未残，且将诗兴寄湖山。

当年英发腾江易，壮岁伶俜行路难。

君子安贫无大过，达人知命有余欢。

夕阳红胜中天日，老却何为物外观。

先生平生友好极多，著名学者容庚、商承祚、沈从文、启功、马采、刘逸生、李育中等与之皆有往来。已故容庚先生曾于赠画上指出：“叔度性疏狂，不拘小节，不谐于俗，与余时相过从，商榷古今，庄谐杂出”。先生说这几句话“很能道出我的个性”。（第 3 页）他又曾请人为自己刻了四方闲章，曰“吾少也狂”、“中年坎坷”、“晚而无成”、“老来学易”，说是“聊以自慰云尔”。

光阴弹指而过，岁月变动不居，转眼间先生离开我们已半年了。《卢叔度集》虽编选较为仓促，难免有遗珠之憾，但还是荟萃了先生部分讲稿、论著与诗什，这些精美的遗作将永留人间。

作者 吴国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510275）

责任编辑：童 轩